



ACADEMIC RESEARCH

5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1994

岭南文库

“八五”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地区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由叶选平、卢钟鹤、任仲夷、杨应彬、杨资元、陈越平、林若、黄文俞、黄华华、谢非（按姓氏笔画为序）任顾问，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黄浩为名誉主编，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为主编，刘斯奋、岑桑（执行）、萧如川为副主编。“岭南文库”书目为350种左右，计划在5至7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第一批书籍已于1993年出版，深获好评，第二批书籍将于今年内陆续出版。

第一批书目（已出书）

书 名	作 者	字数（万）	定价	
			平装	精装
简明广东史	蒋祖缘 方志钦主编	58	24.00 元	30.00 元
广东美术史	李公明著	40	22.00 元	28.00 元
旧中国杂记	〔美〕亨特著 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注	20.7	8.00 元	14.00 元
岭南历代诗选	陈永正选注	42	17.90 元	23.90 元
岭南历代文选	仇江选注	34	14.40 元	20.40 元
岭南历代词选	陈永正选注	26	10.00 元	16.00 元
黄节诗选	刘斯奋选注	23	9.40 元	15.40 元
羊城古钞	〔清〕仇巨川纂 陈宪猷校注	46.8	19.20 元	25.20 元
岭南古今录	徐续著	35	12.80 元	18.80 元
广东文化地理	司徒尚纪著	27.3	11.30 元	17.50 元
岭南文化	李权时主编	36	14.40 元	20.40 元
岭南民间百艺	林明体著	29	12.00 元	18.00 元
岭南思想史	李锦全等编著	27.5	12.50 元	18.50 元
排瑶历史文化	练铭志等著	42	14.00 元	19.00 元
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	谭棣华著	17.5	7.20 元	13.20 元
广东改革的经济学思考	曾牧野等著	31	12.80 元	18.80 元
广东的自然灾害	梁必骥主编	20	8.00 元	14.00 元
苏兆征	卢权等著	27.5	12.20 元	18.20 元

书 名	作 者
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史	徐德志 黄达璋等编著
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	关履权著
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罗一星著
潮汕平原经济	陈朝辉 许自策著
广东的方言	李新魁著
岭南史地与民俗	曾昭璇著
岭南书法史	陈永正著
张九龄诗文选	罗韬选注 刘斯翰审订
黄遵宪诗选	钟贤培等选注
广州城坊志	仇江等校注
洪秀全	苏双碧著
梁启超	耿云志等著
胡汉民	周聿峨 陈红民著
叶挺	卢权褊 倩红著
历代入粤名人	李小松 陈泽泓编著

此外，列入“文库”1994年发稿计划的尚有3种，书目如下：

书 名	作 者	备 考
南越国史	张荣芳 黄森章著	今年8月交稿
叶剑英	范硕著	今年8月交稿
孙中山	张磊著	今年10月交稿

“岭南文库·图册系列”的《广州历史文化图册》，亦已编辑完竣，并已发排。该图册为大16开本，收入广州地区历史文化图片800余幅，1/3为彩图，并附中英文对照说明，是一部甚具史料价值、值得保存的高质量出版物。

目

学术研究

(双月刊)

刊名题字

郭沫若

主编

梁渭雄

副主编

张硕城

刘斯翰

编务主任

黄荣显

·邓小平理论研究·

学习邓小平理论，认真总结经验，增创广东

发展新优势……………黄华华 (6)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大胆

探索勇于实践……………于幼军 (12)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

……………包心鉴 (2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

……………李全发 (26)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性与实践意义

……………陈仰贤 (30)

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伍健民 (33)

邓小平加快发展思想与汕头龙湖区的实践

……………陈兴池 (35)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色和历史地位

——“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研讨会综述……………本刊记者 冯达才 (38)

·经济·

从世界看中国经济特质……………朱伯康 (40)

经济市场化与金融改革的若干问题……………赵昌文 (44)

培育农村资金市场的障碍与出路……………崔慧霞 (48)

人力资本投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张凤林 (51)

“三资”企业发展的八个问题与对策……………赵守国 (55)

加强粤港澳经济社会研究，广东学术界责无旁贷

——本刊邀请部分学者座谈粤港澳研究问题

……………本刊记者 谭湛明 (58)

·哲学·

钱氏体系中的现代价值科学学科新体系…黄锦奎 (59)

《荀子》“制天命”新训……………李中生 (64)

·历史·

史学功能沉思录

——当代史学功能研讨笔谈…………… (65)

1994年第5期

录

史学的历史与现状(胡守为) 史学的现实性品格(陈长琦) 发挥史学功能的途径(宋德华) 力戒公式化脸谱化,真正以史为鉴(赵立人) 有用与无用(桑兵) 市场经济对史学研究有正面促进作用(颜广文) 历史学与中国现代化(严钟奎) 史学研究也是一个审美过程(陈春声) 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陈华新) 史学的学术规范与批评(贺跃夫) 史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增进(刘汉东) 从梁方仲教授的学术贡献看史学的功能(刘志伟) 历史学不要放弃研究现实(朱卫斌) 知识文化:史学的本质属性(林有能) 路是人走出来的(凌峰)

希特勒进攻英法的决策与张伯伦的对策... 蒋相泽 (78)

· 文学· 语言·

“现实主义”问题商兑..... 袁良骏 (89)

从追踪鲁迅到走向周作人

——冯文炳乡土文学的创作路向..... 杨剑龙 (92)

中国古代鉴赏心理学论纲..... 李建中 (97)

《海绡说词》研究..... 刘斯翰 (101)

小议潮汕方言的宏观研究..... 詹伯慧 (106)

《诗经》“终三十里”究竟是多少..... 张 剑 (108)

· 图书· 出版·

试论高校专业图书馆的用户研究..... 林秀玉 (109)

良好的开端

——“岭南文库”首批图书巡礼及社会反响综述

..... 杨江人 (112)

· 学者访谈录·

在科学与哲学的边缘耕耘

——访刘大椿教授..... 本刊记者 世木 (115)

· 广东新著·

《广东劳动制度改革的轨迹》评介..... 张江明 (119)

· 学术动态·

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成立..... (114)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3345916

邮码: 510050

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

排印

佳达电子公司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44 号

Making Another Developmental Superiority for Guangdong in the Light of Studying Deng's Thought and Summing up Experience Seriously	Huang Huahua (6)
Exploring and Practising Bravel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ng 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u Youjun (12)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Features, as a Materialist Historical Outlook	Bao Xinjian (21)
The Place in History: Deng Xiaoping's Theory of Constructing 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Features	Li Quanfa (26)
Th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View "Development as a Definite Principle"	Chen Yangxian (30)
Persisting in Reform, Open and Liberating as well as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Wu Jianmin (33)
The Practice of the Longhu Lake District in Shantou under the Guidance of Deng's Idea of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Chen Xingchi (35)
A Summary of the View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f Deng's Philosophic Idea and Theory of Constructing 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Features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Feng Dacai (38)
The Chines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Comparing with Those in the World	Zhu Bokang (40)
Some Problems in Economic Marketization and Financial Reform	Zhao Changwen (44)
Obstructions in Help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Money Market and Some Ways for Settling Them	Cui Huixia (48)
The Peculiariti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vestment of Manpower Capital in Chia	Zhang Fenglin (51)
Eigh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Them in Developing the Enterprises with Trinal Investment	Zhao Shouguo (55)

- Especially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Guangdong Should Make More Effort in Research upon the Economy of Guangdong, Hong Yong and Macao ——opinions summarized from a forum hel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Tan Zanming (58)
- Mr. Qian's Modern Value Theory as a New Systematic Disipline**
 Huang Jinkui (59)
- New Explanation of a Standpoint from "Xunzi" by Xun Kuang (Living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Li Zhongsheng (64)
- Passages of a Written Talk about the Funct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 (65)
- Adolf Hitler's (1889—1945) Strategic Decision of Attacking England and France, and A. N. Chamberlain's (1869—1940) Countermeasures** ... Jiang Xiangze (78)
- Deliberating with Sb. on 'Realism'** Yuan Liangjun (89)
- Feng Wenbing's (1901—1967) Creation Way of Rural Literature Changed from Lu Xun (1881—1936) to Zhou Zuoren (1886—1967)** Yang Jianlong (92)
- An Outline of Ancient Chinese Appreciational Psychology** Li Jianzhong (97)
- An Approach to "Haixiao's Criticism of 'Ci' (a kind of classical Chinese verse)"**
 Liu Sihan (101)
- A Brief Talk about the Macro—research on Chaoshan Dialect** Zhan Bohui (106)
- About the Research on the Users of a Specialized Library in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Lin Xiuyu (109)
- A Review of the First Part of "Lingnan Series of Book" Published and Their Social Repercussions** Yang Jiangren (112)
- Professor Liu Dachun: Working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Shimu (115)
- A Commnet on a book "The Trace of Labour System Reform in Guangdong"**
 Zhang Jiangming (119)

学习邓小平理论，认真总结经验，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

□黄华华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5 周年。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步伐，也走过了 15 个年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也已发表两年半了。在这有重大纪念意义的时刻，学习邓小平同志的伟大理论，回顾广东 15 年来走过的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更深切地感到，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学好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加快发展，2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的思想保证。

一、邓小平理论是广东改革开放取得瞩目成就的伟大思想武器

目成就的伟大思想武器

江泽民总书记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15 年来，正是由于我们举起这面旗帜，依靠这个精神支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稳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 本文是作者在 1994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改革开放”大型理论研讨会上的书面讲话，本刊有删节。

江泽民总书记的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同时这一理论又是指导实践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改革开放新实践的这种关系,从全国来看是这样,从广东来看,也是这样。邓小平理论对广东改革开放有着十分重要的直接的指导意义,是广东改革开放取得瞩目成就的伟大思想武器。

首先,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试验区,这一战略决策的成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实践基础。大家都记得,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根据当时广东省委的意见,批准了广东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新的体制。小平同志在当时明确地指出,希望广东在改革开放方面“杀出一条血路来”。随后,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从此,广东踏上了光荣而又艰巨的历程。15年的试验,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的试验,给广东经济带来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其发展趋势,就是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从闭关锁国过渡到全方位开放。广东的试验,无疑对我国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扩大,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实践基础。

其次,邓小平同志两次亲临广东视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从当代世界发展、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任务的高度,阐明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关键时刻为广东以及全国的改革开放指明方向。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举办经济特区,得到了党中央以及全国人民的高度关心、指导和支持。其中,邓小平同志的两次视察广东,其作用、影响尤其重大。第一次视察是在1984年春。当时,广东的试验包括特区的试验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也碰到了不少

新困难和新问题。在我们党内和社会上有人对广东的试验持怀疑的态度。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中,充分肯定了广东包括特区的试验,为广东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6月回忆这次视察时讲了一番意义深远的话,他说:“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两三年就改变了面貌。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对广东、对特区、对新生事物的关心、支持和爱护之情。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第二次视察广东。在深圳、珠海、顺德等地,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谈话。现在公开发表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大部分内容是在广东视察时谈的。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特区姓“社”不姓“资”,提出了用“三个有利于”来衡量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科学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这篇谈话的发表,犹如强大的东风,掀起了广东和全国改革开放的新一轮高潮,广东的经济发展在这篇谈话的指引下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再次,邓小平同志重视总结广东的经验,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概括,融汇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之中,作为一个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

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善于概括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创造。邓小平同志两次视察广东,就非常重视广东尤其是特区建设的经验,并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的高度上去总结。第一次视察广东,着重总结了对外开放的经验,作出了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推进沿海大开放新格局的决定。第二次视察广东,在进一步肯定特区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篇谈话,使邓小平理论走向了体系化,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邓小平理论总结概括了包括广东在内的实践经验,又是指导包括广东在内的实践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认真总结研究广东改革开放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新经验

正确、深刻、全面和及时地总结研究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推动实践的发展,是我们党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邓小平同志一贯把总结研究实践经验看成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重大事情。他反复强调:“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究竟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小平同志是善于总结研究实践经验的光辉典范。由于广东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先行性、探索性、典型性,小平同志特别重视广东经验,1984年和1992年两次深入广东等地视察后,提出了许多关于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特别是他视

察南方重要讲话中的许多精辟论断,都包含着对广东经验的总结和概括。15年来,广东人民没有辜负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和教导,我们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逐步总结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经验。主要有:

1.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不动摇。广东人民牢记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断,并以此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在风风雨雨面前,在香香臭臭的各种议论中,始终坚持团结、务实、开拓,埋头苦干,多干少说,不随意给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贴姓什么的标记。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发展经济,较好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拿事实来说话”的思想。这是我省15年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以经济特区为窗口,充分发挥特区向内向外两个方面的辐射作用。江总书记最近高度地概括了特区的成功经验,一是特区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速度快,效益好;二是特区的体制改革也走在全国前列;三是特区成为我们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最集中的地区,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桥梁与前沿阵地;四是特区对内地的辐射功能日益增强;五是特区对保持港澳的繁荣稳定和统一祖国大业都有重要贡献。

3. 大胆稳步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抓好价格机制、流通机制、投资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促进各项改革逐步推进,配套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要过价格改革这一关的教导,既大胆又慎重地采取“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方针,改革了物价管理体制,发挥了市场调节的作用。

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试行“以桥养桥”,“以路养路”,“以通讯养通讯”,“以水养水”,“以电养电”等方法,促进“谁投

资,谁得益”、“有偿使用”的投资机制的形成,大大加快了我省能源、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广东最早改革流通体制,冲破流通领域的思想禁锢,着力转换经营机制。全民、集体、个体各种所有制经济或分在流通领域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市、县、乡镇、村、户“六个轮子一齐转”,大办各类专业市场,搞好市场硬件和软件建设,初步建起了一个有活力的省内外商品大流通网络。这不但从根本上使广东最早打破商品凭票定量供应的短缺经济旧格局,而且大大拓展了“广货市场”,保证了广东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我省企业从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改革试验,逐步转换经营机制。在选择一批国有企业试点进行综合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引进新机制,促使企业增强活力,大步走向市场。我省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和股份制合作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人事劳动制度、工资分配制度、城市住房制和土地使用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4. 以扩大开放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广东人缘地缘和商品经济较发达的优势,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增强全省经济实力。我们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当今世界是开放世界的思想,在实践中最早总结和提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针,并据此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营造一个对外资有吸引力的“强磁场”。经过15年的努力,广东外向型经济开始走上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多类型、多功能转化的发展轨道。在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方面,广东取得了产品三分之一出口,三分之一销往省外的成绩。

5. 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我省明确提出第一把手要抓第一生产力,使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优势结合起来;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和科技经济一体化原则,改革科技组织体制;发展科技市场;以提供较好的工作、

生活条件,增强凝聚力为引子,吸引省外科技力量和科技开发项目落户广东,从而增强了广东科研机构的活力,大大弥补了广东高新技术力量的不足;采用“有限目标,重点突出”的科技经济发展方针,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解决广东在发展农业、调整经济结构、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在“三点(广州、深圳、中山)一线(广深珠高速公路沿线)”的地区布局中,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中、中、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路子;在构建多渠道的科技融资机制、科技开发机构的市场取向改革和服务型转轨、技工贸一体化发展方面,作出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探索;在培养人才,引进人才、重视人才、尊重知识,调动人才积极性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绩。

6. 以共同富裕为目的,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我们引导贫困山区人民解放思想,奋发图强,造林种果,成为“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这对涵养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我们还帮助贫困山区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三高”农业,开发山区资源,发展乡镇企业,发展“造血型”的工业骨干项目,增加集体积累和农民收入。特别是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教导,我们在扶贫,走共同致富道路方面大胆地试,在全国最先建立了“扶贫开发区”。通过政策倾斜,挂钩扶贫,穿针引线促成外引内联,帮助山区人民发展交通通信事业、改善投资环境等,培育出山区经济的增长点,提高山区经济发展的起动力、聚合力和辐射力,逐步走出了一条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7. 以培育“四有”新人,树立社会新风为重点,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仅仅是富裕;如果精神文明建设不上去,也不能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在抓紧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认真抓好精神

文明建设。做到有目标、有步骤、有措施，认真扎实地组织实施。我们的基本体会是：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以经济发展的物质力量为基础；一定要有全面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一定要有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一定要建立和健全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一定要充分重视硬件载体的作用。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在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不断地反复地抓思想舆论引导，抓法制建设，抓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抓扫除黄赌毒等“七害”，抓繁荣文化生活，抓发扬社会新风等，多管齐下，努力做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们素质的提高。

8. 以提高党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和加强党员防腐防变能力为中心，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我们十分注意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关系，警惕和克服淡化党的建设现象；同时采取各种措施，使党的建设真正落到实处。我们深深体会到，党的建设要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就一定要使党建工作与改革开放“两手抓”，而且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相互脱节，更不能相互排斥；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防止在认识上和工作中的忽“左”忽右；一定要使党的自身建设体现改革精神。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认真地全面地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办事，自觉地把邓小平理论与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就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三、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深入学习，开拓进取，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

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为了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蓝图，全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原来给予广东的灵活措施和优惠政策已经普遍适

应于全国各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增创新优势，跃上新台阶。

回顾过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的看法是：

第一，要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和根本的问题，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把十四大报告概括的九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真正学懂弄通。保证我们在促进广东社会主义建设跃上新台阶的实践中，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提高我们在实践中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达到进一步加快发展的目的。

第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要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要在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紧密围绕我省的任务和全局，深入研究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促使全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

第三，要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全面理解和掌握贯穿在邓小平理论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用它作为指导，不断研究新的情况，探讨和解决新的问题。在实践中我们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又要大胆解放思想，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鼓励我们广东要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最近，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广东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要求和鼓励我们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增创新优势。我们不能辜负党中央和小平同志

的期望,我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在新形势下继续先行一步。

增创新优势,首先要创立体制方面的新优势。十多年来,广东经济迅速发展,根本原因是我们率先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在一些重大领域内闯过了改革的难关,建立了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许多明确的论述。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我们必须抓住时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继续建立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系统的市场规则,建立和发展服务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种中介组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科学体系,精兵简政,搞好机构改革;继续深化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力争用三五年的时间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框架。

增创新优势,就要继续充分发挥广东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迈向国际大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小平同志对广东的具体要求。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是我省的传统优势,也是其它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它给我们创造了引进外资和发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有利条件,是我省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要继续充分发挥这一地缘人缘优势,通过外引内联,增强对内对外双向辐射能力。要下大力气开

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发展跨国经营,介入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要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的工作。

增创新优势,还要按照江总书记的指示,认真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全面提高经济素质,创造广东产业的新优势。我们要加快发展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海洋产业。在比较发达的地区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使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次向山区转移,实行梯度发展,层次推进。整个经济发展以及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都要科学地合理布局。要继续采用开发性扶贫的办法,使广大山区,东西两翼借助三角洲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契机,发展经济。要提高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保护粮田,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搞好粮食生产,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增创新优势,必须继续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发展物质文明都不应以削弱甚至牺牲精神文明建设为代价。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进步,保护生态平衡,做到经济、社会、环境和科学技术的协调发展。

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工作,指导实践,继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
责任编辑:石 成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大胆探索勇于实践

○于幼军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15 年的路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和综合改革试验区，在这 15 年里，大胆探索，积极进取，经济建设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文明全面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是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证明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科学性和巨大威力。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实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取得的成效和经验，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始终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走共同富裕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阐明的首要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科学地总结了我国 40 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高度的科学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这一科学概括，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个方面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从社会的本质属性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大大丰富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社会生产力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假社会主义。广东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广东同全国一样，改革开放以前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有片面性，不注重发展生产力，只在变革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致使经济发展缓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文革”期间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由于这样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使社会上一些人向往港澳，逃港事件时有发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

* 本文是作者在 1994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改革开放”大型理论研讨会上作的学术报告，本刊略有删节。

求是的思想路线,全省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多年来,我省各级党组织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坚信只有经济发展、民富国强才是硬道理,紧紧抓住发展经济不放松。具体表现为:

一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用足用活,不失时机地把握机遇发展经济。

二是始终坚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不陷入空洞的争论,不随意给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贴上姓什么的标记,致力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即使是在国际政治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国内出现某些不稳定因素时,全省仍党心一致,民心一致,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不动摇。

三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和本地实际,制定出全省和各地的经济发展战略及规划、对策、措施,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经济发展的路子。

四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由于坚持不懈地抓经济建设,改革开放15年来,广东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78年至1993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由184.73亿元增加到3225.3亿元,年均递增13.9%;财政收入由39.46亿元增加到346.56亿元,年均递增15.5%。这不仅改变了1978年以前广东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而且达到或超过了亚洲“四小龙”起飞时的水平。1987年,我省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2年,提前8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第二战略目标。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全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1993年与1978年相比,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由400多元增加到427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3元增加到1675元;全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17.56亿元增加到1874.5亿元。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和变化,使人民群众大大增强了对社会主义的凝聚力,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由衷地赞同

共产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我国现阶段,要加快生产力发展,除了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还必须实行适合现阶段生产力状况的方针政策。其中,以坚持公有制为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一个大政策,是小平同志的重要思想。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理论指引下,在致力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等公有制经济,保证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放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个体、私营经济和其它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1992年,其工业总值达1102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31.7%),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缩小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加快全省实现共同富裕的步子,省委省政府自1985年以来,把扶持山区脱贫致富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山区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每年召开一次全省山区工作会议,总结推广山区脱贫致富的新经验,对山区经济发展进行具体的指导;与此同时,组织全省各方面力量支持山区建设,主要是实行省、市、县三级机关的挂钩扶贫和按职能对口扶贫,组织沿海城乡对口扶持山区,以先富带后富。经过山区干部群众和全省连续多年的共同努力,使山区经济、交通、文化落后的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全省50个山区县,已脱贫或基本脱贫的达22个。山区县国内生产总值逐年上升,从1980年的62.04亿元增至1985年的117.05亿元,再增至1993年的637.42亿元;同期山区县人均收入也逐年上升,由200元增至418元,再增至1368元。

二、以市场为取向,积极推进各项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理论,对改革的性质方向、目的意义、战略部署、目标模式、判断标准等问题均作了精辟的论述,为我国改革事业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关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

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关于改革的目的和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因此,邓小平同志把改革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始终如一地高度重视,扭住不放,就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风云变幻,苏联、东欧政局剧变,我国也出现政治风波的情况下,仍然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在关键的时刻排除干扰,把稳方向。

关于改革的战略部署,邓小平同志形成了全面改革、逐步推进、积极稳妥的战略思想。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设计改革的步骤先从农村突破,再推广到城市;先搞经济体制改革,再搞政治体制改革;先搞局部试验,然后才全面推广。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一科学论断,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此外,邓小平同志还提出要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衡量其得失的标准;强调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有大胆探索、敢闯敢冒的精神,又要善于及时总结经验,纠正失误,弥补不足之处。

总之,邓小平同志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全面、科学、系统的改革理论。十多年来,广东就是在邓小平同志这套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利用进行综合改革试验的有利条件,大胆进行改革的探索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 大力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鼓励敢闯敢冒、大胆开拓进取,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既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它每前进一步,就必然伴随着与传统习惯势力和旧观念的斗争和决裂。我省在1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注意坚持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路,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各种形式的教育,帮助人们逐步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摆脱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意识和“左”的思想的禁锢,树立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新观念,诸如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开放观念、信息观念、时效观念、人才观念、消费观念、文明观念等,从而使广大干部群众不仅大大增强了对各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且提高了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积极投身改革、大胆探索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省委热情鼓励、支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改革开放中敢闯敢冒,大胆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同时,又教育和要求大家在改革探索中要有全局观念和科学态度,具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和扎实稳妥的作风,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各项改革措施。这使我省在改革开放中既能大胆探索,先走一步,又减少了不必要的失误,实现了稳步推进的战略要求。

2. 摆脱教条主义、保守僵化和计划经济思维定势的束缚,坚持采取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和战略。几届省委领导班子意识到,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才能有效地提高生产力,才是改革经济落后面貌的根本出路。因此,广东的改革,实际上比较早就采取了市场取向的目标和战略,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广东理论社科界也积极配合,进行艰苦努力的理论探索。80年代初期,卓炯同志的商品经济理论已广为人知。1988年我省开展的市场经济系列研讨会,在我国较早公开明确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模式,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这些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对我省干部和群众更新观念,坚定市场取向改革的指导思想,起到了导向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坚定,尽管一度国内一些人对广东的改革提出诸如“姓社姓资”的种种疑问和责难,我省各级领导也不为之动摇,把市场取向的改革战略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下来。

3. 以放开价格、搞活流通、培育市场

为突破口,努力探索建立新的资源配置机制。广东的价格改革起步较早,既大胆又慎重地采取了“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方针,逐步放开商品价格。与此同时,流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也逐步展开和深入。现在,广东实行计划价格的商品和物资的比例只占销售总额的5%和10%,包括粮食在内的绝大部分农副产品、生产资料和社会零售商品价格都实行市场调节。我省较早地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对基建投资体制进行改革,从试行“以桥养桥”、“以路养路”的改革,逐渐扩展到“以水养水”、“以电养电”等多种筹集资金形式,建立起“谁投资、谁得益”的集资办事、有偿使用的投资机制,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的问题。在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方面我省也起步较早,初步形成了各类配套齐全的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信息市场等,房地产市场近年来迅速形成和发展,金融市场、产权市场、期货市场也正在发育。总之,经过10多年努力,我省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的资源配置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4. 积极推进所有制改革、企业改革和培育活跃的市场竞争主体。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为了活跃这个基础,10多年来我省坚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努力塑造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多元利益主体,使非国有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与之同时,我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试验,包括引进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富有竞争力的经营机制,进行股份制改造,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活力,大步走向市场。一批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已在南粤大地崛起。

我省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进而发展到双层经营体制。

近年来,正在推广一种新型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其中有社区型的,如广州市天河区的杨箕村;有企业型的,如深圳市宝安区的万丰村;还有土地型的,如南海市顺德市。农村股份合作经济

的发育成长,给我省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5. 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开放之初,省委就根据中央授权,提出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下放权力的措施,各级政府层层放权,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同时实行“财政分级包干”,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还进行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目的的机构改革试点。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加强对整个经济运行的宏观管理,在控制投资规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建设、调控物价、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和建立对口挂钩扶贫制度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同时抓紧进行经济立法,建立了一批与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法规和条例,并依法管理经济。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正在形成。

广东在10多年改革中所取得的成效和经验有力的证明,邓小平同志的改革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广东的改革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同时广东的实践又为这一理论找到了具体的实现途径。当然,广东的改革实践还是初步的,与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我们要进一步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思想理论,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要求,继续发展敢闯、敢冒、敢于创新的精神,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争取早日在全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准确把握并创造性运用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的思想,充分发挥广东人缘地理优势,不断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只有在开放中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得到发展和完善。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只能停滞落后。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必须坚定地实行和扩大对外开

放,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并在理论上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形成一整套科学、完整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

1.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没有对外开放这一着,不可能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发展不起来的。

2.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3.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

4. 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开放,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开放;不但经济要对外开放,文化、科学、教育都要加强同外面的交流合作。策略上,实行多层次区域推进。

5.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但我们有办法克服,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和坚实的经济基础。

15年来,我国从创办经济特区开始,继而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沿江地区、沿边地方、内陆大城市,形成了从沿海、沿江、沿边向内地纵深扩展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

从广东的实践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发挥自身的人缘地理优势,创造性地运用小平同志对外开放的思想,用足用活用好中央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不断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首先,在大力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同时,提出并始终如一地坚持“有所引进、有所抵制”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原则,保证对外开放的健康发展。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省委就明确提出了“有所引进、有所抵制”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原则。一方面,坚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对外开放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积极引导和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破除闭

关自守、不敢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文化成果的思想障碍,破除把引进外资、兴办“三资”企业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旧观念的束缚,大力鼓励和支持广大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投身于对外经济、科技和思想文化交流的实践。另一方面,坚决抵制一切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针对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影响而腐化堕落,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一些地方在如何开展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偏离中央的方针政策,企图靠走私贩私、倒卖洋货投机取巧发展经济等问题,坚持不懈地抓好党员干部的经常性思想教育。同时,注意联系实际,抓住不同时期出现的突出问题,大张旗鼓地开展典型教育,严肃处理惩治违法犯罪分子,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反腐败能力。由于省委的指导思想正确,10多年来,我省对外开放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健康顺利地发展。

其次,积极办好经济特区,并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采取区域推进的发展战略,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提高引进外资的工作水平。

改革开放初期,在小平同志的倡导和党中央的支持领导下,广东省委重点抓好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创办工作,充分发挥其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建设,三个经济特区从一片荒芜之地崛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深圳特区14年来实际利用外资59.8亿元,至1993年底,已办起工业企业1万多家,工业总产值已达80.85亿元,比初创时的1979年增长了800倍,外贸出口总额已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经济实力的增强,使特区向内地的“辐射”作用愈来愈强。近年来,深圳企业大举进军内地,仅1993年就向内地投资40亿元,形成了一种“深圳接单、内地生产、产品通过深圳打入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新模式。

在积极办好三个经济特区的同时,省委立足于广东“七山一水二分田”,沿海城市、珠江三角洲与山区之间条件相差很大,全省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区域推进的开放战略,先是对海南岛(当时仍隶属于我省)实行的开放促开发的方针,享受类

似经济特区的政策待遇。随后又把广州、湛江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在两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2月至1993年5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又先后把珠江三角洲、韶关、河源、梅州、南沙等地划为开放区,使经济开放区由沿海逐步向山区腹地扩展。目前,全省已拥有三个经济特区,两个沿海开放城市、四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六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一个扶贫开发区,二十一个市都实行了沿海开放地区政策,各个不同地区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互相配合,扬长避短,发挥各自优势,从而在全省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实践证明,实行区域推进的开放战略,不是扬此抑彼,而是适应了各地对外开放条件的不同要求,有利于整体上更快、更好地推进对外开放。

再次,充分发挥人缘地理优势,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创造新优势,增强对外开放的吸引力。

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在过去30年封闭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这一特点和优势长期得不到发挥,甚至成为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如何充分发挥这一人缘地理优势,推动我省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各级党政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用足用活用好中央赋予广东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一方面,全省各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大力加强同港澳地区的联系和合作,把港澳(特别是香港)作为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桥梁”。如东莞市改革开放以来,充分发挥其毗邻香港、有65万东莞籍香港同胞的优势,大力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迄今已办起外商投资企业近万家,引进外资26.3亿美元,每天进出东莞的集装箱有3000多个,在东莞“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任职的香港或台湾人近10万。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市县的经济已经同香港以至整个国际市场联为一体。这些年来,全省各地充分利用港澳地区富有效率的贸易办事机构、广泛的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充分利用港澳雄厚的资金实力、发达的金融制度和融资渠道,解决广东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港澳的现代化的通信和运输

系统,提供与国际社会的信息联系、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便利;以及充分借鉴港澳的规范完备的市场经济管理法规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学会按国际惯例办事,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另一方面,认真贯彻落实侨务政策,切实做好侨务工作,开展侨务宣传,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的热情。这些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踊跃返乡捐款捐资,兴办各类事业。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至1992年,全省批准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约90亿元;他们还为我省对外开放,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信息、牵线搭桥,有力地促进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省委清醒地认识到,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中,要长久地保持广东对外开放的领先地位,不能光靠人缘地理等固有的优势,还需要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创造对外开放的新优势。为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花大力气、下大本钱搞好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使投资“硬”环境日臻完善。在这方面,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市县尤为突出。珠海特区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超前的目光和宏大的气魄,科学合理地搞好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的规划建设,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珠海已成为一个现代化花园式海滨城市,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一个“热点”。在抓好硬环境建设的同时,省委还要求各地要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建立和完善各种涉外法规和政策,简化审批手段,提高办事效率,增创体制新优势,努力为外商营造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大大地增强了我省对外开放的吸引力。最近3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几乎每年增长1倍,1991年为25.8亿美元,1992年为48.6亿美元,1993年增加到96.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26%。

最后,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探索对外开放的新形式、新途径,提高引进外资工作的水平。

在开放初期,根据建设缺资金、生产缺技术、出口缺市场、开放缺人才的实际情况,我省引进外资较多地选择了投资少、风险

小、带设备、带市场、上马快、见效快的“三来一补”方式。随着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和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逐步积累,广东利用外资从早期的“三来一补”为主,向兴办较大规模的“三资”企业为主转变;从早期的一般加工工业、劳动密集型为主,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转变。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我省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更高水平阶段,引进外资从以港澳地区为主,向北美、欧洲、日本、南韩、台湾多元转变;把引进外资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结合起来,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结合起来,与加快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改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全省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近一个时期来,适应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向外商出让国有和集体企业部分股权,正成为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的一种崭新的尝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粤东、粤西一些地区试行。

此外,广东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不但请进来,还大胆地走出去,到海外创办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竞争,为下一步大踏步走进国际市场开拓了渠道、积累了经验。

四、坚持“两手抓”方针,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地发展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与精神关系基本原理和辩证法的融会贯通和创造性运用,正确反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

广东15年来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物质文明建设,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实践和经验,进一步验证了邓小平同志“两手抓”思想的正确性,同时,也使“两手抓”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

1. 坚持服务和促进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新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

围绕新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坚持服务和促进经济建设,这是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特点和首要经验。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两个文明建设的结合点,一是在活动主体上。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也是人。搞现代化建设,需要有较高的素质和能力的人,而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塑造人。这些年来,我省始终把提高人的思想品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四有”新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许多地区、单位还结合自身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而且为广大群众乐于接受的具体标准。如深圳市提出了要塑造“团结、奉献、开拓、创新”的特区人精神,广州市南华西街提出了“团结、理想、热爱、拼搏、开拓、超越自我”的十四字南华西人精神,南海市把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量化为评选文明村、文明户的“七化”、“八风”、“十标准”,等等。围绕着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和标准,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干部群众广泛认真地学习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大力开展各种创建精神文明活动,从而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二是在活动形式上。运用各种传统节日、庆典、民间艺术活动等形式,举办“文化搭台、经贸唱戏”,集文化、经贸、旅游于一体的活动,既繁荣了地方文化,又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的发展。三是在社会环境上,始终把扫除黄、赌、毒等“七害”和嫖娼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维护社会治安、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坚持反腐倡廉、加强法制建设等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坚持服务和促进经济建设,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好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所处的时代背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经历一样,我们的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也会伴随出现某些混乱、丑恶和腐败现象,但这绝不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改革开放不彻底、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完善的表现。因此,新时期的精神文

明建设,从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到目标策略、措施方法等,都必须以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原则,精神文明建设自身也要体现改革开放的精神,要有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路、新对策、新措施,而不能游离于时代大环境,脱离实际搞“两张皮”,或仍然简单沿袭过去在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所形成的思路 and 办法。这些年来,我省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积极探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路子,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总结提高和推广。

2. 坚持以立为本、虚功实做的原则,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虚功实做是一条重要的原则。结合广东的实际,这些年来,我们主要通过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来贯彻落实这一原则,扎扎实实地推进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是“立”与“破”的关系。坚持以立为主,破、立结合。立,就是树立一系列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培养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倡导和发展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破,就是破除各种僵化落后的思想观念和陈规陋习,坚决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和腐败现象。

二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坚持弘扬主旋律,大力扶持体现时代精神、健康向上、水平较高的精品力作。与此同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各种流派风格和表现形式并存共长,积极推动各种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和通俗文化的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是搞活、繁荣与严格管理、净化社会风气的关系。坚持一手抓搞活、抓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一手抓严格管理,抓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针对改革开放以来黄、赌、毒等“七害”屡禁不止、屡扫不绝,不断有所蔓

延、泛滥的突出问题,省委一直把扫黄、除“七害”作为加强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下大决心,花大力气,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标本兼治,进行综合治理,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研究和采取新的对策和措施。如实行经常性的治理和突击行动相结合、专门力量和群众路线相结合、严厉打击和教育引导相结合、办案查漏和建立制度相结合等。在最近开展的扫除黄、赌、毒统一行动中,省委又提出要重点抓好提高各级党政干部的思想认识,建立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有关部门的工作责任制;要重点打击策划者、保护伞、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和为首分子;要大造扫除黄、赌、毒的社会舆论;加强有效的监督,坚决铲除滋生黄、赌、毒的条件和市场等。

四是“虚”与“实”的关系。坚持虚功实做,变软为硬。与经济建设相比较,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务虚”的工作,工作内容、特点有“软”的一面。但就其在社会文明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精神文明建设是很实在、很硬的任务。而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好,需要在指导思想和对策措施上虚功实做,变软为硬。包括要抓好机构、队伍和经费的落实;要把精神文明建设规划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计划当中;要把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关心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相结合等。特别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法规、制度建设,把比较“虚”的思想认识、道德规范变为实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法规和制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艺等事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市场管理,均需要建立完善配套的法规,并严格依法管理。这样,把精神文明建设的诸方面同法制建设、制度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由虚变实、由软变硬。

3. 探索运用新的机制和载体,大力开展各种群众广泛参与的创建活动,不断拓展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子。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需求向多层次发展,这就要求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不能沿袭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简单地搬用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时期的方式方法,而必须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和特点,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艺术,建立新的机制,运用新的载

体,不断开拓新路子。在邓小平同志“两手抓”思想的指导下,经过15年的探索实践,我省已初步探索出一条搞好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子。

第一,逐步建立健全了育、导、建、管有机结合的新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省委十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在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谢非同志提出了要在全省建立、形成并不断完善“育、导、建、管”的新机制。“育”就是培育,包括学校教育、理论学习、思想政治工作等,通过抓好这几项工作,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培育“四有”新人。“导”就是引导、疏导、排解,通过各种活动和渠道,疏通民气,理顺民心,化解消极因素,引导群众积极向上。“建”,就是建设,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阵地建设,包括学校、思想文化阵地和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的“硬件”建设。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至1992年,我省各级政府对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达63.6亿元;在我省特别是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最漂亮的建筑往往就是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设施。南海市从1990年以来,投入兴建教学的资金达4亿元。“管”,就是管理,通过建立健全各种管理法规和制度,综合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纪的管理手段,加强思想文化阵地和社会文化市场的管理,做到活中有管、管而不死,管中求活、活而不乱,从而促进群众文化活动和文化市场的活跃与繁荣。

第二,探索、营造多种形式的新载体,使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内容有机地融合,渗透到人们的生产、管理、学习、生活、娱乐等方面中去。包括以活动为载体,开展各种群众性的创建精神文明、弘扬新风尚的活动;以文化为载体,积极发展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等,把精神文明建设渗透于文化娱乐之中;以管理为载体,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到各种管理制度之中;以现代化的大众传媒为载体,使精神文明建设走上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以各种群众性的自律组织为载体,促进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等等。

第三,广泛深入地开展以创建文明村、街、户和文明城镇为重点的群众性创建活动,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城乡基层和千家万户。创建文明村、文明户、文明城镇和文明街道,是南海市和南华西街干部群众首创的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好经验、好形式。省委及时发现,加以总结、推广,在全省城乡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两南”、创文明街、镇、村、户的活动,并在实践中使创建文明村、街、户和文明城镇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充实、完善和提高,有效地在城乡基层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社会风气、社会治安的好转和经济建设发展。

第四,在对外开放中大胆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成果。对于外来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有选择、有批判地进行研究和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成份,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具有自信心和生命力的表现。基于这种共识,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广东始终保持开放的姿态,坚持“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实行“扶持有益的,允许无害的,抵制有害的,打击犯罪的”的原则,对外来的思想文化和世界各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进行鉴别、选择、吸收、消化、创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兼容并收,从而使广东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地吸取新的养分,受到新的激发,增添新的活力。这也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广东的干部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得风气之先,视野比较开阔,善于学习和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广东15年走过的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累累硕果值得自豪和骄傲。展望未来,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蓝图十分诱人,任重道远。江泽民总书记最近要求广东要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我们要振奋精神,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继续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开拓前进,用我们认真、勤奋、扎实的工作,让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南粤大地变成辉煌壮丽的现实!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
责任编辑:石 成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

○包心鉴

唯物史观是“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①它不仅启示人们如何遵从历史发展逻辑去打碎旧制度，创立新制度；而且引导人们如何循着社会历史轨迹去建设新社会，奔向新未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样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入揭示中国社会乃至当代世界发展规律，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逻辑地发展的伟大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唯物史观创造性地依托和运用，内涵极为丰富，其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则在四个方面。

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根本任务的社会发展中心论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合乎规律地运动发展的过程。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即一定性质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归根到底由一定程度和形式的生产力所决定。因而，“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②才有可能有序而能动地改造社会，推动历史。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规性。

依据唯物史观这一根本的也是首要的基本原理，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必然引伸出两大科学结论：其一，关于社会主义发生、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

找。”^③这也就是说，不能把社会主义仅仅看成是一种抽象的真理和正义，而必须把生产力引入社会主义本质范畴，把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变革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和根本标准。其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社会发展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努力建设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不仅如此，而且“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削弱以至最终葬送社会主义制度。^④这两点科学结论，是支撑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实践的最重要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石。这种理论基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产生，而又面临世界范围科学技术革命严峻挑战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就具有更加迫切的奠基意义。

正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上，深入总结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把生产力问题提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地位和首要地位上来，构筑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社会发展中心论。这一理论包括以下内涵：（1）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使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社会主义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2）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而消灭贫穷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3）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

力。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4) 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判断一切方针政策好坏的根本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5)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抓住这一生产力迎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绝非历史唯心主义论者所歪曲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唯物史观同时揭示:任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表现为两种情形: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和发展要求时,生产关系就能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供有利的组织形式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状况和发展要求时,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时社会就提出了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变革旧生产关系,寻求新生产关系的历史任务。无论是部分地抑或是全部地变革生产关系,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既是生产关系变革的深层动因,又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终极目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一元论。邓小平 1992 年巡视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最新概括,其深刻的理论内涵,正是在于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力为中心,诸项社会因素能动交互作用的发展规律。

首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突出强调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首要任务。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其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鲜明强调生产关系改革对于生产力的能动促进作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面前冠以“解放”和“发展”,这不是一般语辞修饰,而是具有深刻内涵。它表明:(1)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生来具有的,而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尤其需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2)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除了具有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功能外,还面

临着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某些陈旧僵化的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政治体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任务。

二、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色的社会发展动力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辩证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改革的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确认。但是改革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改革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这些重大问题在很长时间并没有成功地解决,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错误地把阶级斗争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手段,企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就是通过深入总结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反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找到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包括:第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这种改革,不是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一种革命性变革。因此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二,社会主义所以面临着从根本上改革旧体制的历史性任务,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提出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要通过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不完全,社会主义还面临着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性任务。第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坚持改革,就没有出路。第四,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不仅包括经济改革,而且包括政治改革,还有相应的其他领域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利
于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巩固和发
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改革与政治改
革必须相互配合,协调发展。第五,改革必
然引起开放,要求开放。开放也是一种改革。
社会主义是开放的社会,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
发展的一个本质要求。社会主义要赢得与
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
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
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
方式和管理方法。

把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
动力,深刻体现、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
会发展动力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主义社
会的发展动力,是一种综合性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人主观能动作用的
协调和利用,形成一种强大合力,推动社会
前进。“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
力”,“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人的利益需求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这些正确判断,从不同层次,不同
角度理解和界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在
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中,有没有一种根
本性动力?我国持久全面的改革开放推动社
会飞跃式前进的伟大实践深刻说明,社会主
义发展动力系统中存在着一种根本性动力,
这就是改革开放。

强调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抓住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系统中的根本之
点,找到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调动
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正确途径。人民
群众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从历史唯物主
义一般原理说,这是真理。但是人民群众推
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作用的实现,从来离不开
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实现手段。即使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
用,也不是自发的、必然的,而是受到一系
列管理体制、组织形式、领导制度以至某些
根本制度的影响和制约。高度集中的传统计
划经济体制以及某些官僚主义式的管理体制
和领导作风,严重压抑、阻碍以至损伤人
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社会主义历
史与现实曾经发生的现象。只有从根本上
改革那些严重束缚生产力活力的体制和制
度,创造真正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主人翁积

极性的体制和制度,人民群众推动社会主义
发展的巨大动力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并
获得巨大效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日
益增长的利益需求和社会对这种利益需求
的满足,是一种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
推动社会进步,也离不开一系列体制和制
度的变革。只有改革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陈旧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
物质财富,并为社会文化建设创造充裕的物
质条件,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才
能不断得到满足,由此推动社会协调前进。

三、以三大文明建设同时并举、增强综 合国力为战略的社会发展合力论

在马克思主义创建早期,马克思恩格斯
特别着重强调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原始发
动机,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随
着历史的发展,随着对历史规律愈益深入的
认识,他们愈来愈全面地强调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因素与政
治因素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恩
格斯在后期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中,对社会
发展的这种辩证关系从哲学上进行理论概
括,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发展“合力论”。“历
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
个的意志和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
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
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
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
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
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
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
产物。”历史发展不是生产力单一因素所决
定的,而是各种因素“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
数,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
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⑤

历史发展“合力论”,不仅揭示了无产
阶级革命的历史规律,而且也指明了社会主
义建设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
程,同人类社会总的历史进程相同,“决定
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
产。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
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
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⑥对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来说,生产力发
展是基础,但是对社会主义命运发生影响并
在一定情况下也起决定作用的,还有生产关

系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各种政治形式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适应现代趋势地发展,从而对生产力发展发挥巨大的保护、促进作用。只有把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因素“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社会主义才能在现代文明轨道上疾步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战略构想,极其深刻地体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合力论”。邓小平关于通过多种因素的作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包括: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把物质文明搞上去,是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的发展战略。第二,社会主义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此,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第三,没有高度民主和健全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与经济改革和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上三个基本方面,可以称之为三大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同时并举,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遵循这个总体战略,就可以形成启动当代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现代化道路上疾跑的“总的合力”,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构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战略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综合国力。他深刻指出:判断各项政策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这里,邓小平显然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意义、根本意义上引入“综合国力”这个概念的。当代国际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依托某一种优势,则很难在剧烈竞争中取胜。现代综合国力,不仅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基础,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高度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民主,在综合国力中具有不可忽缺的凝聚力量、动员力量、鼓舞力量、推动力量。

如何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十

几年来,邓小平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和理论概括,其中突出强调:(1)必须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这对我们既是严峻挑战,又是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2)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靠科学才有希望。“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⑧(3)必须努力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⑨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高瞻远瞩,表现了对当代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对于当代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全面发展,具有极其深刻、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以实现共同富裕为起点、造就“四有”新人为任务的人的全面发展论

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人是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目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和手段,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⑩这样一种境界,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变革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邓小平既依据于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总趋势,又依据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全面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实

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二是大力造就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可以说，前者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起点，后者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任务。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只能是一种过程。在经济还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保证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假如人们处于贫困状态，不得不为生计而奔忙，那还怎么谈得上自身的全面发展？既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又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立足于这一社会发展要求，邓小平设计了通过让一部份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

物质生活的提高，共同富裕的实现，仅仅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而绝不等于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使社会成员成为自由的人、自主的人、自觉的人，在保证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大力加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的思想、文化、道德素质。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人，“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①造就“四有”新人，是造就自由的人、自主的人和自觉的人的具体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人向全面发展的最直接任务。

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和造就“四有”新人的思想，生动体现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解放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发展也就是人的逐步解放。人的解放，就其一般意义说，包括从自然力和从社

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自然发展无止境，社会发展无止境，因此人的解放也是无止境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解放包括三个层次意义：一是从被自然界支配状态中解放出来，运用、创造现代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界，驾驭自然界，能动地挖掘、利用自然资源潜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步伐。二是从某些陈旧的体制和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改革，创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三是从某些陈腐观念桎梏中解放出来，消灭异化残余，回归人的本质。异化是私有制社会的普遍规律。在我国现阶段，异化虽然不可能成为普遍现象，但异化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例如货币拜物教，人被金钱奴役，从而扭曲了人的本质，泯灭了人的本性，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绝非个别现象。这样与社会主义本质相悖离的腐朽现象，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因此说，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面临着消灭“异化”现象，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任务。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归根到底是人的不断解放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只有实现了全方位意义上的自我解放，才能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①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第1卷8第页。

③④⑤⑥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页，第1卷第39页，第4卷第478、479页，第477页，第1卷第273页，第3卷第441页。

⑦⑧⑨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第377—378页，第143页，第28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冯 生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

□李全发

一、正本清源，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重 放真理光辉

要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①邓小平同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哪些是真社会主义，哪些是假社会主义，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1. 抛弃本本主义和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僵化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创立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上，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②列宁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正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管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我国，都在不同程度地以“左”的形式出现，以本本为依据，以苏联模式为样板，使社会主义建设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航向，出现了僵化，停滞的状态。邓小平

同志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③邓小平同志正是坚持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开拓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领导我们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 “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便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便向全党提出，我们在接收城市的第一天开始“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而其他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可是在我国到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导致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使我国经济

陷于崩溃边缘的状态。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⑤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就强调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⑥以后他又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3.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⑦“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⑧因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真正显示出来，社会主义才能最后战胜资本主义。

二、突破创新，使科学社会主义洋溢着时代的特征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容进行了突破性的创新，大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使科学社会主义洋溢着时代的特征，体现着时代的价值。邓小平同志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

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⑨

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一个突破性的创新。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⑩正是由于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纳入生产力要素的范畴去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看到了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而现代新科技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说，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⑪邓小平同志正是看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决定的主导作用，对经济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于是他便及时地向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只有掌握科学技术，才能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因此，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

2.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重大突破创新。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⑫从这段精辟论述中可以看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和直接动力，这就突破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所有制改造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直接动力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要解放生产力的新思想，突破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讲发展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存在着阻碍生产发展的政

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要克服这种阻碍只能采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因为只有改革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正确途径。“改革的性质同过去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⑬

3. 确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处于初级阶段。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新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设想。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这就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而在我国,1958年便提出,我国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形式。而“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959年毛泽东同志发现这种提法不科学。于是便提出,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发展阶段。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把我国看成仍然处于过渡时期的历史阶段,因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⑭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一个立足点,并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找到了客观依据。

4. 邓小平同志阐明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性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容。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⑮“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

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⑯这一论述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不仅使我们冲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从姓“社”姓“资”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我们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中去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们找到一条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能够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荟萃升华,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更高更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既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又吸收了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成为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更高更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恩格斯曾揭示,理论是历史运动发展的表现。一切划时代的思想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产生这些思想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和发展,正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表现,是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需要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个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伟大飞跃。

第一次,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这次飞跃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把这种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成为无产阶级谋求解放运动的强大思想武器,使社会主义思想发生质的飞跃,从空想变为科学。

第二次,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这次飞跃的主要标志是,列宁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阐明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并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社会主义思想发生质的飞跃,从理论变为现实。二次大战后,东欧、亚洲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

国实践。社会主义这种渐进式的质的扩张发展总趋势是不可抗拒的,但它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艰难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在当前“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①⑦}

第三次,社会主义由单一模式,单一道路走向各个国家都要“走自己的路”的多种模式,多条道路的发展。这次飞跃的主要标志是,邓小平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次大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均以苏联为样板,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统一的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使社会主义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然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这种模式已越来越成为束缚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成为扼杀社会主义运动的危险因素,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社会主义就有可能自己葬送自己。这就迫使社会主义各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问题。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邓小平同志领导我国人民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找到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

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回顾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的时候,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①⑨}他在谈到个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作用时说:“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是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②⑩}正是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透视事物发展的现象,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并吸收和借鉴别国经验进行去伪存真的科学概括,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和主要内容在党的十四大报告概括为九个方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这个理论充实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容,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更高更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且它像盏明灯照亮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正在前进着!发展着!

①③⑤⑦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118页,141页,195页,274页,270页,135页,252页,148—149页,373页,383页,3页,234页,272页

⑥⑧⑨⑪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48—149页,151页,165页,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3页

作者单位:肇庆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冯 生

邓小平同志在文选第三卷终篇作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著名的科学论断，这是他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核心。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辩证地把握稳定、协调和发展的相互关系，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下面，我就学习这一科学论断，谈点体会。

发展问题仍是当前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

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发展问题实质是生存问题。经济不发展，或者发展得太慢，无论自我感觉多么良好，到头来都免不了被动挨打的命运。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硝烟的记忆犹新；当今，一个“超级大国”解体的严酷现实更令人惊醒；不发展，就是死路一条。发展问题，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的课题。

发展问题是个大局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把经济搞上去，把生产力搞上去，是全党的中心，是个大局问题。因此，我们在国际上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在国内要排除一切干扰，加速发展自己。全党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大局，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只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

发展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体现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起点低、基础差、底子薄，时至今日，我们才解决 11 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整体经济水平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即使与亚洲中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也不少。小平同志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要优越、战胜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质极大丰富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得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就大大增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

发展问题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这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过多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才能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创造雄厚的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圆满解决国际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性与实践意义

○陈仰贤

国内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保持社会的稳定；才能建设和发展精神文明，推进社会进步。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可以搞上去”。

发展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一个国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份量，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上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如果我们发展得快，实力强大，在国际上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政治大国，而且又是一个经济大国，那么，我们在世界上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在国际事务中就有更多的发言权，也就更能够维护国家的独立，巩固国家的政权。

深化改革是加快发展的巨大动力

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胆识，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告诉我们，改革与发展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以改革求发展，发展才有后劲，才有希望。只有通过改革，废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建立新经济体制，才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的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改革问题。只有抓住了改革的机遇，才是抓住发展的机遇。不改革，就没有发展；不深化改革，也就不能更好地发展。小平同志提出用不断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从而为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动力问题找到了答案。正是在小平同志改革思想的指导下，十多年来，我们坚持改革，致力于改革，在改革中求发展，才迎来了经济、社会巨大变化的新局面。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丰顺县的每一步前进发展都是改革的结果。就农

村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丰顺县各级党政部门勇敢地冲破“一大二公”的思想禁锢，迅速在全县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使农村的经济面貌和自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几年，我们又针对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不很合理、影响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大胆而又稳妥地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同时，大力加强农村二、三产业和搞好小城镇建设，尤其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一个战略重点来抓，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引导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破除小农经济思想，树立大农业和商品农业观念，大胆引进外资投入搞好农业综合开发，发展“三高”农业。在组织农业开发过程中，大胆改革传统的开发方式和粗放的经营模式，制定并实施了“统一规划、山权不变、连片开发、分户承包、双层经营、共同致富”的开发原则以及“三高四化”（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区域化、集约化、基地化、良种化）、“三通四大”（通路、通水、通电，开大带、挖大穴、施大肥、种大苗）的质量标准。这些原则、措施不但深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而且加快了开发进度，并开始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5年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证明，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哪些地方改革搞得好，那里的发展就快；哪个时期改革抓得紧，那个时期发展就好。同时也深深地告诉我们，无论形势怎样变化，对改革要毫不动摇，尤其像丰顺这样一个经济不甚发达的贫困山区，失去一次机遇，就会带来以后若干年的落后和被动。但改革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我们的经济基础、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对改革的承受能力等，既要加快步伐，又要注意稳妥。就今后我县改革来说，在坚持整体推进的同时，必须在重点上有所突破。

首先，要推进企业改革。把企业改革作为重点，分别采取扶持扩大生产、兼并、租

赁、承包、转产、拍卖或依法破产等措施,逐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使企业经营机制有个根本性的转变,加快产品质量、会计制度、产品成本、竞争机制与国内外市场接轨。其次,要深化农村改革。正确处理增产粮食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在保持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大力发展开放式外向型“三高”农业和乡镇企业,建立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搞活农产品流通,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第三,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强化财税工作的领导,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积极培育财税源,加强税收征管,确保国家税收增长、地方财政增收、职工收入增加。第四,要努力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主要职能转到统筹规划、掌握政策、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以及预测市场、引导市场、培育市场、开发市场上来。

解放思想是加快发展的关键所在

回顾我国十多年改革开放经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的不断解放,必然带来改革开放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从拨乱反正清“左”到真理标准和生产力标准讨论,每一个思想认识上的新突破,都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发展。

近几年来,丰顺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都是与广大干部群众勇于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敢想敢闯敢干紧密联系着的。如果没有思想上的大解放,观念上的大更新,就根本不可能有作风上的大转变,改革上的大动作,引进上的大突破,发展上的大步伐。如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这一问题上,起初,社会上议论诸多,甚至有的部门和领导同志也心存疑虑,怕被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怕冲击了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因而不敢积极扶持发展。对此,我们遵照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时提出的“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要求,冲破求稳怕冒的观念和因循守旧的作风,精心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从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树

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标准,明确提出“三大产业一齐上,多种经济齐发展”的经济发展方针,全方位推进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各种成份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还大胆制定并实施了《关于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政治上鼓励,政策上扶持,法律上保护,方向上引导。由于大开了“绿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如虎添翼,并且产生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去年个体私营企业交税占全县税收的43.6%。

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新一轮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转换脑筋。思想解放的程度直接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广度、深度和经济建设的速度。要加大改革力度,扩大开放程度,加快发展速度,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六种新意识:一是机遇意识。机遇稍纵即逝。因此,邓小平同志谆谆告诫我们:“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时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二是速度意识。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尤其是基础较差、起点较低的山区贫困县,如果不能高速发展,不要说学“虎”赶“龙”会落空,甚至会被淘汰。三是效益意识。要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一切按价值规律办事,以发展为前提,以速度为保证,以效益为目的。四是竞争意识。牢固树立市场经济观念,强化市场竞争意识和竞争手段,积极大胆地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五是自强意识。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怨天尤人、自卑无力的情绪,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创造条件大干快上。六是人才意识。要重才、引才、用才、护才,最大限度地调动各路人才的积极性。要特别敢于启用即使有某些缺点、毛病,但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和求实创新作风的人才。

作者是中共丰顺县委书记

责任编辑:林有能

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伍健民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必将为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和锐利的思想武器。通过学习，深深感到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观点博大精深，非常科学、全面、精辟，也非常朴实，《邓小平文选》是我们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宝库。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最大的要求，也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邓小平文选》内容极其丰富。我认为，最重要，或者说统管全局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任务的论述，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因此，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吸取我国40余年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针对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而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下面，结合端州区的实际，谈一谈这方面的学习体会：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切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文选》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社会，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从这些理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象一条主线一样，把共产党人的全部实践活动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历史地联系、贯穿、统一

起来了。这应该说是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贡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转折，也说明了我党打开了一条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新路。

回顾国家建设的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沿着邓小平同志所指明的这条路子，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进行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树立了新的国际形象，整个国家踏上了富强之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内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切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子是对的，它得到了全国人民拥护和赞成。

“发展才是硬道理”，也是小平同志洞察国际风云，立足于增强社会主义优势这一战略角度而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还提到：当代世界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主题：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但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使各国人民明白，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总结端州经济建设的历程，我们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认识更为深切。1988年市政区以后，我区的经济实力弱小，当时，镇以上工业年产值只有1.6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财政收入也只有1800多万元。经

过五年的艰苦拼搏,到1993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已达13.52亿元,比改区之初(按可比价)增长4.8倍,翻了两番多;财政收入达7088万元,增长近3倍,其他各项工作都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些成绩的取得,靠的是什么?除了靠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靠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更重要是以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切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指导方针,统领各项工作。一是区委区政府重视理论学习,不断提高班子成员的思想认识水平,从思想上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区几套班子成员自觉参与经济建设,每个成员都分管一个以上的外资、合资企业或经济项目,从计划、引进、筹建到投产都责任到人;三是机关转变职能,参与经济建设。多年来我们建立和坚持了机关干部轮流到基层、农村挂职制度。几年来,各部门先后抽出270多名干部办实业。区委先后从机关各部门和单位抽调8批169名干部,到镇办事处和企业挂职。选送了5批22名副局级以上干部到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和乡镇对口挂职,这既能使干部经受过锻炼,又能促进经济发展,使全区党员干部不单从口头上,而且从行动上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国内外以及我区经济建设的大量事实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千真万确的。邓小平同志这个精辟论断告诉我们,要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过去还是将来,只有坚持发展,才能促进端州繁荣,使各项工作走上新台阶,这也是一个硬道理。

二、“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求我们:树立全新观念和坚持不断改革

唯物论告诉我们,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不断发展中前进,中国也不例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折的变革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任务。在这个时期,必然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级党委和各级干部必须适应这个变革的新环境,必须在经济建设中逐步培养自己的新思路,研究出新对策、新办法。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文选》中谈到:我们现

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全新的事业需要我们必须具备全新的思想、大胆改革和善于改革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在《文选》中又谈到: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干部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大胆探索、大胆实践,解放思想,克服旧的传统观念和做法,树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思想、新观念。只有坚持全新的思想,超前的意识,才能使我们在变革时期立于不败之地,取得经济建设的一个又一个突破,把经济建设推上新台阶。

近年来,我区的改革工作,尤其是企业在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扩大企业自主权、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营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主要有:一是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采用的办法是:先搞各种类型的试点,然后逐步推开,使这方面的工作初见成效;二是商业小门店推行“国有民营”和“公有私营”的改革;1993年,我区商业系统有192个企业门店推行“国有民营”、“公有私营”和卖、租、包等办法,使这些门店增强了活力。去年南方商业集团公司、端州大酒店集团公司创税利分别增长65.4%和27%;三是对连年亏损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或拍卖。如对原来的市塑料二厂、第二纺织品公司等9间企业进行了拍卖兼并,用收回的1.4亿元资金清还债务,并比较妥善地安置了这些企业的职工;四是农村推行了股份合作制,目前已有17个管理区117个经济社实行了合作经济股份制或办起了股份合作制企业,既大大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又较好地解决了统征土地后的农民的生活出路问题;五是对两个镇、城区四个办事处实行财政包干的新体制,既调动了基层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区财政有一定的收入,促进了全区的经济发展。

我区的改革虽然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国有和二轻街道集体企业活动不足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显露出来,主要体现在:现在办企业继续沿袭计划经济的模式,企业产权关系不明确,组织制度不合理,管理制度不科学等等。

另外,由于改革没有触及到产权这个根本问题,企业经营自主权难以落实,不能以独立的法人,对企业的财产和经济活动负责,有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因而,企业亏损负债最终由政府去负担。要解决这一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必须深化改革。针对上述情况,根据上级有关改革的指示精神和结合我区的实际,区委区府提出:1994年是改革之年,必须加大力度,加深层次,速度进一步加快。为了把全区经济建设推向新台阶,全区改革工作的重点有四个:一是从理顺产权入手,加大改革力度,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二是工建商企业必须按区委区府制定的“关于加快工商企业改革的暂行规定”中提到的六种转换经营机制的模式去选择好企业今后发展的路子;三是农村继续推行股份合作制,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四是抓好明、后年的承包方案的落实,做好分税制与包干制的各项衔接工作。

今年,中央决定实行分税制。这既是一个新的机遇,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去适应这个新环境,各级党委、各级干部必须更新观念,更新思想,在工作中研究新对策、新办法,逐步解决在实施分税制中的新问题。区委区府结合我区的实际,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效益为目标,进一步扩大开放,集优成势,发展壮大规模工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搞好个体和私营企业,努力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新对策。要求全区上下在大好时机面前,珍惜机遇,用好机遇,争分夺秒,加快发展;同时,要求大家都要振奋精神,迎难而上,把困难化作动力,勇于改革、大胆改革,开拓创新,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两手抓”和“三个有利于”,逐项抓落实,赢取时间,千方百计地保持国民经济在“快车道”上继续前进!

**作者是中共肇庆市端州区委书记
责任编辑:林有能**

邓小平加快发展思想 与汕头龙湖区的实践

□陈兴池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观念的突破,为社会主义国家确立经济建设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龙湖区是汕头经济特区的发祥地,有十多年对外开放的历史。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挥优势,加快发展,是龙湖工作的主题。

加快发展,就必须有强烈的机遇意识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加快发展的时

候,总是以抓住机遇为前提的。他一再告诫我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我们必须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龙湖区经过十年轰轰烈烈的特区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1年扩大特区成立龙湖区后,龙湖区委区政府及时抓住一些人认为“现在特区不特了,优势没有了,发展困难了”的思想,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特区的地位、作用以及党中央关于办特区的方针政策,领会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认真总结特区的经验,分析了龙湖区具有加速发展的独特优势:

特区优势——龙湖区是原汕头特区的所在地。汕头特区扩大范围后,这里还是目前汕头经济最活跃的一个新区。

外向型优势——龙湖区目前同世界上3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贸易合作关系;利用外资兴办“三资”企业1050家;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来这里投资设厂。

投资环境优势——龙湖区目前已累计投入基本建设资金47.57亿元。海陆空运输方便。汕头深水港码头、汕头海湾大桥、广梅汕铁路汕头客货运站、汕头海关以及汕头的大部分金融机构都设在龙湖区内,还有优质高效的服务“软”环境。

人才优势——十多年特区建设实践,吸收和培养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才。龙湖区的干部队伍文化素质高,在全区4313名干部中,中专以上学历的有3759名,约占87%。

此外,还有“侨乡优势”、“管理优势”等等,这些独特优势,构成了龙湖区独特的发展机遇,这也是龙湖区可以“搞快点”的最有利的条件。通过学习,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及时抓住机遇,加快发展。1991年以来,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开发建设了龙湖工业区、下蓬工业区、珠津工业区、台商投资区、金融商业区、旅游住宅区等一批专业小区,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比较配套,管理和服务机构精简高效,已成为一个以工业、外贸为主,商业、旅游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和房地产业各业并举的综合性外向型经济新区,是海内外投资者比较理想的地方。

加快发展,就必须瞄准高新技术目标

邓小平同志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出发,

认真考察和分析了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指出“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这是对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南巡讲话时他又再一次强调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邓小平同志主张依靠科技进步来发展经济,除了要改革科学技术的体制外,就是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他说“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龙湖区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客商前来投资,截止目前,已累计批准利用外资合同1846宗,协议外商投资总额12.93亿美元。直接利用外资签约1098项,协议外商投资总额11.59亿美元。已有港、澳、台、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区内投资设厂,投资范围包括电子、通讯器材、建材、陶瓷、纺织服装、医疗等20多个行业。全区已有“三资”内联和自办企业2000多家。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速发展龙湖区的经济,我们结合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召开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作了充分的论证,确定了以信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发展战略。为了完成上述战略目标,我们已制订了龙湖区信息产业发展规划,并通过外引内联,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制订了措施和优惠政策,鼓励区内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科技人才要靠教育来培养。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汕头市委在第六次党代会上提出科教兴市的战略方针,为我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已制订了全区教育发展规划。这个规划的资金投入是:至1995年投入资金1.45亿元,至1997年再投入资金9000多万元,至2000年需要再投入资金2.95亿元。今年内,我们已办起了林百欣科技中专并开始招生,尽快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养一批有文化技术素质的合格人才。

加快发展,就必须推进市场体系建设

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使中国的深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市场作用发挥得越充分的地方,经济发展就越快。目前龙湖区已同世界上3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贸易合作关系,形成了直接贸易与间接贸易结合、转口贸易与远洋贸易结合、“三来一补”与一般贸易结合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外贸格局。主要出口商品有20大类,近1000多个品种。十多年特区建设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用邓小平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就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给社会主义带来生机与活力。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作为一个经济小区域的龙湖区,我们首先必须有计划地加快各种要素市场的建设。龙湖区政府已成立了市场建设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我们计划三年内建设农副产品市场、综合性市场、批发市场和专业市场等各类市场30个,其中今年内完成7个。并采取政府统一规划,依靠社会力量,放开搞活,多渠道,多形式,多元化进行开发建设。在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的同时,重点发展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人才劳动力市场、技术信息市场和产权市场等。尽快形成辐射面广,能衔接国内外市场的营销网络,以促进大商业,大流通的格局的形成,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加快发展,就必须“两手都要硬”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同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出来,并反复强调而且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江泽民同志指出,这应该成为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and 领导方法、领导艺术。

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同步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硬任务。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特别明确提出来,只有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近,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广东时又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发展物质文明都不应该以削弱甚至牺牲精神

文明建设作为代价。”党中央一再强调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要把它当作硬任务,要求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龙湖区在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坚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并作为硬任务来完成,不断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我们根据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形势,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和明确的要求,尤其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龙湖区直属机关和事业单位党员占干部职工总数60%多,这是一支很大的队伍。这支队伍能否教育好,直接关系到党风建设问题。我们要从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入手,从领导干部抓起,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抓好机关的廉政建设,坚决制止腐败现象,狠刹几股群众反映强烈的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树立良好的机关作风,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赖,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

第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四有”新人。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是人。”一方面,我们要把领导班子建设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带领群众一心一意搞建设。另方面我们利用党校、培训中心等,多渠道多形式,分期分批培训干部职工队伍;在全民中开展普法教育,开展文明家庭、文明楼院、文明村(居)的活动等,使广大干部群众成为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的一句名言。发展是历史的潮流,是时代的召唤。“加快发展”这个思想贯穿在文选的全卷之中。龙湖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作为一个站在前沿阵地的领导者,我们有责任牢记小平同志的那些谆谆嘱托,勇敢地挑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在任何时候都把加快发展作为我们工作的主题。

**作者是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政府区长
责任编辑:林有能**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色和历史地位

——“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综述

○本刊记者 冯达才

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专业分会、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省委党校、深圳大学、深圳社科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的“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暨全国第九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讨会”于7月20—24日在广州召开。会议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围绕着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与会者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且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辩证法大师。邓小平同志深悟哲学的真谛,把握哲学的精神实质,精通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将其熟练地渗透贯穿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他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决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新矛盾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他的讲话、报告和批示中,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光辉,形成总体的辩证思维方法和工作方式,表现于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之中。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哲学总结和辩证概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哲学基础和活的灵魂。这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哲学,是有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哲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因此,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而且还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新水平,推进到新阶段。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发展问题

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发展,有几种表现:一是全新的创造,即过去马克思、毛泽东未讲过,邓小平首次提出来的。例如通过“一国两制”的构想体现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述等;二是作出新的概括,赋予新的涵义。例如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新概括的内容、定义,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地统一起来;又如四项基本原则是在原有基础上概括起来,成为立国之本和必须掌握的基本原则;三是重新强调、加以突出,并注入新内容的,例如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邓小平十分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把它作为根本任务放到第一位的位置,提出“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对生产关系的改革,突出地具体化为“制度”与“体制”的矛盾,通过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持其青春活力和蓬勃生机。四是纠正错误观点,恢复或提出正确观点,例如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和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把它纳入到党的基本路线中。

三、邓小平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于: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有利”标准的统一;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坚持主体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的统一。

第二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体系基本框架的内涵极为丰富,其中带有根本性的,则有四个方面: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社会发展中心论;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色的社会发展动力论;以三大文明建设同时并举,增强综合国力为战略的社会发

展合力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起点，造就“四有”新人为任务的人的全面发展论。

第三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是以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意志和愿望为出发点，以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为逻辑起点，以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为基本原则，因而既反映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及其规律，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合于目的性”和“合于规律性”的高度统一。

四、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与会代表各抒己见，提出了四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邓小平的哲学，事实上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实事求是的哲学。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109页）这就把实事求是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从而把它提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地位。

二是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因而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基石，同时也成为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其根据在于：它在突出生产力首要地位的基础上，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即社会生产方式为基本依据来考察和界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充分体现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彻底科学性；它显示了社会主义途径（手段）与社会主义目的的辩证统一，从而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完整性；它显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动态性，破除了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绝对化和凝固性，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根本上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最为重大的问题。

三是认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其根本的依据在于：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

的，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体现并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展生产力，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富强，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是认为实践的观点、实践的标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也是邓小平哲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坚决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不但反复申明毛泽东所说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它“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的道理，而且进一步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2、123页）进而提出“三有利”准则，把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辩证地统一起来。

五、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色问题

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它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行动的哲学，其功重在运用，是作为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科学方法；并且又把运用哲学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既有融汇贯通，乳水交融的宜人境界，又富有生动、亲切而精辟的感人魅力，因此邓小平哲学思想最主要的特色，是“行动的哲学”、“现实的哲学”（恩格斯）、“当前实际问题的辩证法”（毛泽东）、“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邓小平）。

有些同志把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特色概述为“务实”、“求是”、“致用”、“创新”、“为人民”11个字。还有些同志认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色是高度重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它通过以下几个理论观点表现出来：“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改革是经济发展强大动力的观点；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的观点；经济发展需要精神动力和良好的社会环境的观点。

从世界看中国经济特质

○朱伯康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Georg W. F. Hegel) 在其所著“历史哲学讲义”中说:世界历史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也犹如宇宙运行规律,及生物由成长到衰老的规律一样。太阳从东方升起到西方降落;人类从出生到老死,有儿童时代,有青少年时代,有成年时代和晚年时代。世界史上的古代东方:埃及、巴比伦两河流域、中国、印度、波斯,是世界史的儿童时代;中古希腊、罗马,是世界史的青少年时代;近代欧洲各国,是世界史的成年时代。黑格尔说:古代东方的历史,是自然支配人类的历史,人依自然

而生存和生活,顺乎自然,是东方古代哲学的主流。希腊、罗马的历史,是与自然斗争的历史,但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尚未出现,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尚十分稚弱,不能战胜,往往产生悲剧。因为希腊、罗马尚在人类青少年时代,有独立精神产生,但尚未成熟,不能完全征服自然。至于到了近代欧洲,历史发展到成年时代,经过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斯)文艺复兴,由文艺复兴引发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卡尔文新教的产生和发展,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进入近代物质文明时代,人类精神有巨大发展,有征服自然的能力,人类真正成为世界的主人。黑格尔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德国正处在拿破仑武力征服欧洲失败,普鲁士由强盛而统一德国的时代,虽然提到世界史有晚年时代,但很少谈到西方的晚年和没落阶段。20世纪出现资本主义腐朽现象,出现两次世界大战。

依照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法,发展是循着正、反、合三个阶段而相反相成、由低级而高级、由简单而复杂向前发展的。古代东方是正,希腊、罗马是反(也即是“否定”),近代现代欧洲是合(也即是“否定的否定”)。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两者微有不同。希腊是城邦国,社会经济重心在商业、手工业,在海上贸易和城市贸易。罗马帝国的经济重心是军事武力统治下庞大领土中的剥削体系,虽然同样有农业、商业、手工业和海上贸易,但财政来源主要靠征服,靠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剥削。罗马帝国的奴隶主要来源,是被征服民族和地区的人民。虽然有共和时代,但军事独裁多于共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统一了意大利,灭了迦太基,希腊本土成为罗马属地,相当于我国西汉末,罗马进入帝国时代,相继统治了欧、亚、非三洲大部分地区,称罗马城为“永久之城。”由贵族议会进入帝政时代,就此变为军阀军事独裁,罗马成为最强大帝国。476年前后,相当于我国南北朝时代、北魏延兴六年,南朝宋元徽三年,奥多亚克王国(476—493年)国王的儿子克洛维继承其

父为萨利克法兰克人之王，向着高卢发展。时代就此进入欧洲的中世纪。

欧洲中世纪时代，实则是历史的倒退。西方由古代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无论从生产力，生产规模，从文化，从思想、学术、艺术，都是退化，而非进步。只有从蛮族本身历史来看，是进步。

西方的近代史，有的画线始于1453年东罗马灭亡之时，但大多数均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年为开始。西方近代史是由意大利城市威尼斯和佛罗伦斯等城市开始的。哥伦布、物理学家伽利略、无数杰出而辉煌的画家、雕塑家、艺术家、文学家是意大利人。威尼斯、佛罗伦斯等城市的兴起，与商业、金融业、海上贸易、城市自治，与自由环境，有直接关系。

威尼斯，在十字军东征时，因地处欧亚之间，又处海边，首先发展商业，金钱兑换业、手工业、玻璃业和纺织业比较发达，最早出现银行业，较早结束了封建制度。这是一个水上城市小国，由亚得利亚海湾的一百个小岛组成。最早只有渔民，后来，有许多逃难的难民移来，盖起房屋，逐渐繁荣，到7世纪有自治组织管理城市，由有钱的大族选举长官。到11世纪扩张势力到黑海，到叙利亚沿海和君士坦丁，成立了共和国。自此成为海上强国，特别发展了绘画艺术、雕塑艺术，招来了无数学者艺术家，成为文艺复兴的名城。

佛罗伦斯，开始是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争权的地方，也是因教皇或因外国联盟关系而发生战争的地方。因为有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到15世纪，城市发展和商人势力发展以后，管理城市的权力，逐渐转入麦地齐（Medicis）家族之手。Medicis家族是由农民经营毛纺织业和银行业而逐渐成为当地的大财团的。有了财富，凭借其财力，很容易当选为行政长官。麦地齐家族不用武力，只靠金钱和教育，罗致了人才，控制了佛罗伦斯达三个世纪之久，选出三位教皇，好几位执政主教，嫁出两位法国皇后，发展了城市经济和文学艺术，开展了欧洲资本主义早期文明的新风气，出现了先驱人物诗人

但丁，使佛罗伦斯成为又一座文艺复兴光辉城市。

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随着地理大发现，海上贸易的发展，在海岸线及主要河道出现了许多新兴繁荣的工商业及海军商船城市，如里斯本、马赛、利物浦、普利茅斯、伦敦、汉堡、阿姆斯特丹、安达卫普、鹿丹坦等。由于海上贸易发展，殖民运动和殖民地掠夺，出现了重商主义时代，继之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扩展，欧洲出现了很多新兴的民族国家，王权政治。可以说：15世纪是意大利时代，16世纪是西班牙时代，17世纪是荷兰、英、法争雄时代，18世纪是法国路易十四到拿破仑称雄时代，19世纪是英国时代，20世纪是美国时代。德国在欧洲是一强，但是由于军事侵略，专制命运不长，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从世界史看，凡是和平民主、重视文明和文化，不侵略别人的国家，寿命都比较长些。

从世界史看，立国靠经济发展，靠文化发达。文化不是抽象的东西，它靠经济为基础；政治以及政权，也以经济为基础。政治可以反作用于经济，能促进经济发展而富强或阻碍经济发展而使其衰落或崩溃。但最后决定胜负，及兴衰或兴亡的力量，是经济。

经济发展，有阶段性。划分经济发展的阶段，可以有各种标准。例如，从生产本身看，以生产工具为标准，可以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子自动化时代、原子能时代或信息时代等等。以经济部门为标准划分：有采集经济、狩猎经济、畜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化经济等阶段。从社会经济形态来看，以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为标准，有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个阶段。此五分法，必须以世界史为对象，若以个别民族、个别国家来看，五个阶段发展齐全的很少。如德、法，未经过奴隶社会阶段。如中国，奴隶社会阶段不明显，封建阶段特别完整特别长，而资本主义阶段不明显，只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

为了通俗易懂，我赞成用德国历史学派Karl Bucher的分法，他用交换方式、流通

过程,以产(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流通区域之大小及远近为标准而区分。分为闭锁的自给自足的氏族经济和家庭经济;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区域经济;国民经济;世界经济四个阶段。市场经济,是商品流通比较发达的经济。

中国经济特质,从历史来看,奴隶社会不如希腊罗马发达,封建社会是在中国特别发展,其时间之长,居世界之冠,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可以与中国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中国是扭曲变形,没有民族资本主义的统治阶段,只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这两个阶段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质。若从“国民经济阶段”来看,中国进入这个阶段最早。在两汉时代,相当于西欧罗马帝国时期,长安和洛阳两地已有全国规模的大市场,唐代的扬州,北宋汴梁、南宋杭州,都是商业繁荣城市。自春秋、战国以后,经秦、汉封建统一帝国建立后,相当于西方希腊、罗马时期以来,一直到16世纪资本主义时期,包含整个欧洲中世纪时期,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一直领先。在农业发展和农业文化方面,对世界有突出贡献。中国人最早知道种植水稻(浙江河姆渡遗址是有力证明),北方黄河流域最早发展黍、稷、稻、粱、麦、菽(豆类)等作物。中国精制及精细的手工业品很多居世界之“最”。汉代的丝织品使罗马(大秦)人惊奇,呼中国为“丝国”,当年罗马贵族之珍品,大都来自中国。宋元时代,中国瓷器与绘画,使整个欧洲为之倾倒。贵族家庭以有中国瓷器、绘画、手工艺品为荣。中国殷周时代的青铜器,更是博物馆中陈列的珍宝。中国建筑艺术,各国宫殿和寺庙皆有仿造,终不及中华本土之宏伟华丽。近代印刷术、活字版排字,在欧洲始于德国人戈登堡(Gutenberg, 1394—1468年),而中国在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经布衣毕昇已发明应用,较欧洲早四百年。中国最早知道造指南针,汉代张衡、马钧、祖冲之等发明在前,宋代已利用磁针(指南针)用于航海。隋唐时代已有火药用为霹雳炮,南宋时已利用火药制火炮对付金人。民间所用之爆竹和高升,其原理

和后世喷气火箭相似。地理大发现时,中国的指南针(罗盘针)和火药,帮助西欧的冒险家和殖民主义者远航海洋,征服殖民地土著居民的反抗。明初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到达印度洋沿岸各国、非洲东海岸、红海各国及麦加(Mecca,即天方国),其所率船队之大,人数之多,规模之雄壮,为50年后(1492年)哥伦布航海至东印度发现新大陆时船队不可比拟。可惜那时中国封建王朝没有新时代思想概念,让大好的机遇从手中溜走。

中国在世界古代史上的领先地位,在16世纪以后全部丧失。从此中国的国际地位下降,落后挨打,1840年沦入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地位。追究原因,可列出很多,主要原因是抱住原来的封建老古董一套不放,闭关锁国,不肯开放改革,经济仍是农业经济、小农封建经济,手工业仍停留在原有规模上,没有海外贸易,没有远航船队和海军,没有保护海外华侨在外经商谋生的政策。更重要的,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化,没有科学、民主与法治。从此,中国与西方拉开差距。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发达,经过宗教改革,卡尔文新教普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资产阶级革命,励行民主和法治,强国勃兴,西方文化鼎盛,处在世界史的领先地位。而中国则处处落在后面。

人类文化,人类经济发展,好比运动场上的竞赛。时有先后,时有胜负。中国有过光荣历史,有过领先于世界历史达2000年之久的经历,证明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有创造性,爱和平,不侵略他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过去能做到的,今后也能做到。

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中,英国是典型。英国的近代文化,就是工业化的社会文化,它的经济体系也是以工业化为中心的海外贸易、海上和国内商业发达、金融业和农业并存的全面国民经济发展的体系,不像我国过去只限于农业、手工业,未曾工业化的落后经济。英国在13世纪初(1213年)已有大宪章,诺尔曼人征服了英国人后,诺尔曼

贵族与英伦贵族合作,要求约翰王承认贵族权利,国王也要遵守宪法,这便是大宪章的由来。1295—1303年召开了模范会议,由英王、主教、贵族共同组成咨询机关,同时加入商人和骑士的代表参加,共同组成。国家大事,以及向人民征税等事,须有议会同意,方能实行。有了国会,大事方能集思广益,防止失错和失误,方能稳妥。有了国会,国内各阶层有矛盾,有斗争,有争执,均可移到国会内论争,变为口舌论争和文字论争,纳入文明轨道,避免动武,避免杀人和内战,避免不文明的野蛮举动,我国在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直至1949年,在袁世凯、北洋军阀、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缺乏这样的文明轨道,内战不断发生,弄得民穷国弱,招致日本侵略,正是这个原因造成。英国在资本主义初期,曾发生“羊吃人”,土地所有者因追求更大利润,驱逐农人离开耕地,让耕地变为牧场,长草牧羊,让羊毛供应国内外市场,以获得较好收入。又曾发生谷物出口、入口和谷价高低之争。1864年英国谷物条例废止,适应了经济发展形势,自由贸易派获得胜利,避免了社会矛盾激化。英国的知识分子,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像培根、洛克、休谟、边沁、斯密,著书立说,为国家安定、人民幸福,创立了许多有益的制度和法规,如“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奉公守法、科学务实、认真沉毅“约翰牛”精神,“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使英国人受益几个世纪,美国人两个世纪以来都受益。只有落后贫弱的清皇朝中国受害,其他弱小民族受害。

现在是进入世界经济时代。一切科学成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不可能限于国界以内,垄断自私。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特别是航天技术、通信技术、卫星传递、遥控测试、电子计算机网络等;电视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庭,世界已经缩小,住在地球村上人与人关系,愈来愈密切。上半世

纪跨国公司还是屈指可数,大财团独占组织,今天,跨国公司多如牛毛;过去商品生产的规模、分工和社会化,还不是那么多那么大,今天,仿佛大多数先进名牌产品,其原料、原材料来源不止限于一国,而其零部件的生产也不限于一厂、一地和一国,而是国际化分工和专业化组合的产品。过去商品的销售范围并不大,行销的路途并不远;今天,大多数产品不限于国内,而是远销国外,成为国际间竞争销售的商品。商品市场远远扩大了,市场更大了,已不是一国内的国民经济市场,而已成为国际市场了。现在,任何一国要想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只有走出国界,参加国际竞争,锻炼自己,增强能力,才有发展前途。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吸收引进各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和文化长处及优良部分,以充实自己,发展经济和文化。

我国现在的经济实质,正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开放、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道路走对了;伟大的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功在千秋,历史会有公正的记载和颂扬。但是这条道路很长,需要智慧、毅力、勤劳。尤其在国际间,在这个缩小了的但关系更为紧密的地球村上,要拼搏,是需要实力,需要实际沉毅工作的,一点都不能主观、自作聪明、自高自大。绝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那样不虚心,不听群言,那样狂妄所能成功的。

工业化、现代化、市场经济,在发展中需要配套,需要平衡,需要稳定,需要长治久安。其中需要做的事很多,尤其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民主与法治,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更密不可分。当务之急,是教育,教育可改进国民素质,提高科学技术和实际工作能力。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责任编辑:郑英隆

经济市场化与金融改革的若干问题

□赵昌文

金融业的市场化是现代金融制度建立的前提；没有现代的金融制度，就不会有现代的市场经济。

依据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推进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核心在于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金融体制的转变，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来发展。通过实行包括利率、汇率在内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强化实际利率，增加国内储蓄，把闲散的、潜在的资本变为现实的投资；通过弱化本币高估，促进出口增加和外汇收入增加；通过重视金融体系的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作用，加速金融业的扩张，提高金融相关率（金融资产额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和融资效率，增强其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新的金融体系的目标是：以完善中央银行领导（调控主体），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经营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金融组织体系；发展公平、高效开放、统一的金融市场体系；建立法律化、规范化、现代化的金融管理体系。

（一）分离和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造就真正的中央银行

各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的启示是，中央银行能否有效的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中央银行独立地位的法律保障而论，目前世界上主要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是美国、德国等中央银行在法律上独立于政府，直接向最高权力机构国会负责；第二种是丹麦等国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平行，分别对政府负责；第三种是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等中央银行名义上隶属于财政部，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大；第四种是意大利、韩国等中央银行隶属于财政部，独立性较小。从理论上讲，中国人民银

行属于第二种模式，其主要职能是根据政府决策的需要，制定国家金融政策，通过信用的扩张或紧缩，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为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政府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如办理货币发行、代理财政金库、对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放款等；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对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然而，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尚不能真正作为中央银行独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缺乏制定和运用货币政策的自然独立性，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难以有效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从而使“稳定货币”与“发展经济”的矛盾经历着周期性的反复；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仍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如办理经济技术开发、扶持贫困地区、黄金生产等专项贷款，难以从一般货币信贷事务中解脱出来；财政与银行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中央财政经常无约束地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和借款，造成“财政资金信用化”与“信用资金财政化”交织，而财政对人民银行实行利润留成制，考核盈利指标，又使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具有了强烈的利益驱动，失去了超然地位。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央银行的性质相违背的。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基本方向就在于分离和强化其作为中央银行应有的独立性，这也是大多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的根本特征。如美国的中央银行即联邦储备银行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政府官员委员会，另一部分是12个联邦储备大区银行和它的分行。政府官员委员会的7人委员中，除被委任为中央银行主席的一位任期为4年外，

其他委员的任期长达 14 年,其目的正在于不受现在政府和国会当前利益的影响而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至于联邦储备大区银行及其会员银行,主要是通过对股票的控制和选举来改变政策。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不强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从其本身讲,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的着力点在于: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应该独立于政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作为“央行”,它必须具有制定货币政策、制定信贷计划、控制货币发行、调节利率、管理金融机构和调控金融市场等权力。中国准备设立具有决策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由货币政策委员会自主制定和决策有关货币政策问题,既是中央银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向此方向作出的重大努力。不过,要防止新瓶装旧酒或政府权力的“复归”。第二,中国人民银行相对于财政部门的独立性。由于中央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特殊功能,长期以来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大都通过中央银行的融资来弥补。中国人民银行从 1948 年成立到 1993 年的 45 年中,一直未能割断与财政的直接融资关系。中国人民银行向财政部的透支与借款金额到 1992 年末达 1242 亿元,占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的 12.2%。除此之外,中国人民银行每年的贷款也有相当部分投向本应由财政支出负担的项目。为保持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必须彻底割断财政赤字与货币发行之间的联系,建立起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之间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机制。鉴此,财政部门要停止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财政短期资金缺口和长期赤字均应利用发行国债弥补。实行独立的预算制度对保障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经济的独立是政策独立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财政透支和借款,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不得为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提供贷款或担保等还应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加以规定。最后,国有企业产权和经营制度的改革、专业银行的企业化经营都有利于分离和强化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央行”的独立性。

(二) 逐步实现政策性职能与商业性职能的分解,推进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
专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

地位,它是联结中央银行与工商企业的纽带。中国原有的专业银行主要是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四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虽然以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总体上仍处于落后的境地。金融改革滞后使各专业银行与交通银行、发展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较,在资产质量、服务水平、内部管理等方面,明显处于竞争劣势。集中表现在:1. 现有的专业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它使各级专业银行与相应层次的政府结合在一起,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在某种程度上行使着政府的职能。如国有企业的亏损要由银行垫补,为保证一些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工人的基本生活,银行要提供相应的贷款等。2. 由于资产的国家所有,专业银行不能与一般的商业银行一样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标,特别是象支持某些特殊产业、行业发展的优惠贷款(优先贷款或低于基准利率)和扶持贫困地区开发等社会救济性贷款(不仅利息常常难以收回甚至贷款本身也是有去无回)这类政策性业务与银行本身的经营业务混在一起,既使专业银行不能真正成为商业银行,也容易造成银行管理的弊端。3. 专业银行在各自业务领域范围内的垄断性,限制了竞争和银行业的发展。近年来,虽然专业银行的业务相互之间有些交叉,如中国银行可以办理人民币的储蓄业务,中国工商银行可以办理外币储蓄,也可以从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长期投资贷款,但其业务范围仍有较严格的划分。经营业务范围的相对垄断,极不利于改善专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由此可见,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推进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已成为现实的必然要求。

首先要改革专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专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一样,无论前面已经有了多少种方案,迟早都必须走这一步。其方向是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专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使国家的资产终极所有权与银行的法人财产占有权相分离,并按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惯例,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组织机构。这样,银行必须首先对股东负责,

有助于实现与政府的分离和改善经营管理。鉴于中国现有的国有专业银行数量众多,规模庞大,故专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可以借鉴一般国有企业的改造办法,选择试点进行。至于实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专业银行总行与下属各分支行的关系如何处理,仍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其次,组建政策性银行,加速专业银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分离。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是专业银行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政策,配合产业结构调整、地区协调和生产开发等,在信贷活动中对有关产业、地区、行业和项目优先,优惠给予信贷支持的业务活动。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客观存在的经济差距,政策性的金融扶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应该加强。况且,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亦不鲜见,如美国和欧共体长期以来对其农产品提供的巨额生产补贴和进出口补贴绝大部分是依靠优惠的信贷措施实施的。问题在于,这种政策性业务更多的属于一种社会性的政府职能,至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被称为“公共品”的生产和服务,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相反,这种生产和服务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如投资规模大、投资效益低、回收周期长、消费的非排它性、个别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等,若由追求盈利的商业性行为主体来承担,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可是,根据全国的资料统计,政策性贷款在专业银行贷款总量中的比重是:中国工商银行占20%,中国农业银行占30%,中国银行占15%,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占45%,若再加上一些隐性的政策性贷款,其比重将会更高。因此,应尽快界定专业银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范围,逐步实行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的分离。日前,中国已经宣布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正是为此目标做出的重大举措,它们分别承担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重大项目和成套设备进出口的买方卖方信贷。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体制转轨时期所面临的一些新的困难及问题讲,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也应早日组建。需要指出的是,推进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并不是马上甩掉“包袱”,虽然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

入资本金和发行金融债券,但政策性银行的经营原则仍是自担风险(世界银行可算是最典型的政策性银行,其贷款须经充分详实的论证),只是不与商业银行竞争,而且筹资成本与部分优惠贷款之间的利率差额不再由商业银行负担而由财政贴息补偿。在政策性银行尚未组建和开始运行的过渡时期,如果能够较好地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专业银行同样要担负起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这一点我们已经从国合商业、粮食部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可见一斑。

再次,创造外部压力,促使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中国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有着与其它行业绝然不同的现实特点,它没有时刻感受到外部环境造成的压力,其中既有银行业只能由国家垄断的传统观念,也因为银行业本身的“进入成本”太高。所以,银行业比其它大中型国有企业存在着更加严重的垄断和经营机制上的缺陷。要改变这种状况,除我们已经指出的方向外,创造适度的外部压力也许是另一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此而论,十多年的改革已经有了不少可资利用的素材。我们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从数量上看,整个经济中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国民收入已超过了国民总收入的50%。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国有企业如果不再切实地转换经营机制,“老乡”兼并“老大”的事例将会更多。与此相对的是,由于限制非国有金融机构包括合作、私有或股份制银行、信用社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非国有金融业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已极不适应,国有专业银行的大部分金融资产配置到国有企业(据报道,目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有1/3明亏,1/3暗亏)既不符合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规律,也不利于提高金融资产的效率。由此可见,发展非国有金融,培育经济运行的新增长点,对促进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无疑有重要作用。发展非国有金融,还应适度放宽外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中国及所从事的业务范围,以保持较为充分的竞争。

(三) 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提高金融

资产的配置效率

金融市场是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在内的综合性的市场体系。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就是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形成公平竞争和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金融市场正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对于资金的需求将不再是以内源性融资为主,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源融资方式解决,资金的配置将由政府主导型变为金融主导型。显然,这种转变必须借助于金融市场来完成。金融市场作为资金配置市场化的有效机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它不仅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和短期融资工具实现短期资金的市场化配置,通过长期信用实现资本增量的市场化配置,而且可以通过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买卖实现资本存量和企业产权的重新改造。回顾历史,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从1981年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到1983年一些企业开始发行债券和股票;从1985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到1986年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形成;从1989年票据承兑和贴现市场的发展、外汇留成制度的实施和外汇调剂市场的开放到1991年以后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国债的自由交易、中国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华晨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和一些发行H股的企业在香港证交所上市交易。所有这一切,无不反映着金融市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但是,就中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而言,仍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如金融市场的结构尚不配套、完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还没有真正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证券市场、票据市场发育程度不高,等等。而且,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1993年初开始,随着整个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金融领域出现了诸多问题,计划外集资失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银行经营业务;专业银行之间违章拆借,把短期拆借资金用来进行高风险的投资;银行清算系统运作不力,联行清算成了资金滞留的“防空洞”,压汇现象时

有发生(盛行一时的“绿条子”现象根源之一);证券交易市场人为的欺诈对广大中小股民利益的损害等。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原因既在于中国金融体制从利率非市场化、银行业垄断经营向市场化的转变,也在于金融业法制管理的力度不够。因此,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主要应解决好如下方面:第一,从利率市场化入手规范金融秩序。计划经济下通过控制贷款规模就可以控制货币供给总量,可是市场经济中的贷款规模限制却不一定能控制货币供给,其一是直接的行政办法已无法约束货币需求量的迅速增长,其二是相当部分的货币供给是由不受贷款规模控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反,实行利率的市场化,使其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资金这一重要的经济资源就会有效地配置在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和部门,利率“双轨制”的消除就会促使居民金融资产的合理分流及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的协调,也将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和金融领域的“寻租”活动。第二,改革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关系应从行政管理转向经济调控,即主要利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的供求量。目前,在全国6大区域性同业拆借市场已经开办的人民银行短期融资债券的买卖业务,对于调节地区间、行业间的资金余缺,探索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办法是很好的起步。第三,加强金融市场的法制监督和管理,建立法律化、规范化、现代化的金融管理体系。应尽快出台《银行法》、《票据法》、《信托法》、《证券法》等有关法规,以规范商业银行和其他投资者的行为,保证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序运行。加快银行结算制度的改革,逐步实现结算工具票据化、扩大支票、信用卡等支付工具的使用对象和范围,增强票据的灵活性、流动性与安全性。完善联行清算制度,建立以人民银行为枢纽的清算中心。第四,加快全国统一外汇市场的建设并采取市场化、国际化的手段调控外汇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农经系
责任编辑:谭湛明

培育农村资金市场的障碍与出路

崔慧霞

一、培育农村资金市场的障碍

1. 农业银行既执行产业政策又要增殖的双重职能,制约了农业银行的发展。

在我国,作为农业金融机构主体的农业银行,既要充当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又要作为一般性金融企业,将本求利,这两种职能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明显的。要求农业银行身兼二任的改革目标缺乏现实性,也就注定以银行企业化为核心的金融体制改革左右为难,最终结果只能在两者间摇摆,而不能求得真正的统一,这是长期以来农业银行企业化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焦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双重身份与其作为市场化金融体制的微观基础和调控对象极不相称。

2. 农业银行及信用社缺乏经营自主权。表现在,第一,缺乏信贷资金使用自主权。这里的信贷资金使用权,是指农业银行等专业银行在“实借实存,资金自求平衡”体制下自主使用资金和规模的权力。这种权力受到中央银行“资金与规模双向控制”的限制。使得在这种体制下,(1)容易造成贷款规模扩大化的浪费。按照国家控制货币发行的要求,专业银行资金营运调控目标应当是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信贷差额。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行资金与规模“双控”办法,必然会出现各专业银行之间信贷规模划地为牢,互不调节,有的行有资金来源而无贷款规

模,或有贷款规模而无资金来源的情况,由于资金与规模不配套,结果浪费了部分规模,积压相当的资金。(2)有碍于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资金与规模脱节,人为地制约着信贷资金自身运行规模,最终造成社会资金供求的更大差额,影响了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的积极性。(3)造成资金运行低效率。现行贷款规模管理,在资金的分配、使用和考核中存在诸多问题。把由于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增长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率,反过来又作为进一步超量供应货币的根据,以上年末贷款余额为基础,按照平均主义,大致统一的比例下达信贷规模增量,这样,一方面引导银行尽力扩大和用尽年末的规模,以提高基数,另一方面又难以适应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规模层次过多,内密过细,极大地限制了资金的调剂作用,使得钱到地头死,缺乏流动性;浪费和闲置大量资金。第二,缺乏信贷项目决定自主权。信贷项目决定自主权,是指专业银行在信贷活动中决定对具体项目贷款的权力。长期以来,农业银行是国家的信用分配机构,始终未能成为真正的经营货币商品的企业,承担的政策性业务过多,还经常受到外界尤其是地方党政部门的干扰。直接导致了大量的贷款丧失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严重削弱了信贷资金的增殖能力,影响了农业银行的正常经营。

3. 金融系统本身缺乏内在的利益制约

机制。正因为此,使得直接金融过小,投资者和经营者没有融资的灵活性,整个金融系统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水平大大低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据研究,在经济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金融系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张的,并且扩张的速度甚至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而金融抑制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金融中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使金融中介具有存在和发展的能力,即不让利率成为负数。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当实际利率为正值时,其金融系统的实际规模便得到稳定增长。实际上,保持正的实际利率来发展金融中介是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对利率的要求相一致的。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农业银行的利率运行要具有充分的市场供需弹性。当信贷资金来源宽松,供给充足时,利率下降,银根松动,当信贷资金来源紧张,供给不足时,利率上升,银根收缩,这实际上也就是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功能的实现过程。只有当商业银行的经营具有充足的市场经营基础上,中央银行才能真正利用准备金、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这“三大法宝”控制货币供应量,实施宏观调控。

4. 农业金融机构单一,缺乏竞争。

一般来说,缺少非银行金融结构的发展,是不健全的金融发展。当前,以农业银行为主导、合作金融为基础、民间借贷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实际上仍是一个封闭的低效率的金融体系,缺点较多。表现在:农行具有垄断性;信用社脱离社员,农民贷款困难;民间信贷中高利贷普遍存在;对城市资金的吸引力不强;贫困地区和低利产业得不到合理支持;新创业农民的长期贷款需求难以满足;农民创业艰难;农村社区建设的信贷投资几乎还是空白;农业基础设施贷款严重不足。有鉴于此,要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很好地贯彻政府的农业政策,满足农民各个方面的信贷资金需要,切实为广大农民服务,就必须发展多渠道的农业金融,这是政府应充分重视的战略问题。

二、解除上述障碍的思路

1. 改革和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积极创造条件把政策性和商业性的银

行业务分开。

组建政策性银行,承担政策性业务,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变农业银行机制,使其逐步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并作为改变农业银行双重职能的重要前提条件。在政策性银行还未建立之前,我们要妥善处理好政策性贷款业务问题。农业银行可先实行“一行两制”,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开,然后对不同业务采取不同办法进行核算与管理。政策性业务专户核算,对政策性信贷所需的资金及利息补贴,通过财政拨款、利润留成及发行政策性融资债券来弥补。为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过渡创造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农业银行本身要制订科学的比例,健全自我约束机制。

2. 改变农村信用社对农业银行的行政隶属关系,完善以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农村合作基金会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

首先,把农业银行办成国有商业银行,其业务活动范围不受城乡区域和行业的局限,它既可以把农村资金调剂投向城市,也可以把城市资金投向农村,不再承担目前的政策性业务。农业银行本身按资金投放规律管理,盈亏自负。

其次,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社新体制。今后信用社发展的关键在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重塑信用社市场机制,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改革现有机制和重点突破并存的办法,以强化服务为手段,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属于农民的金融企业。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股份制应是合作金融比较理想的体制模式。信用社脱离农业银行领导,由人行直接监督和管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社员,即社员贷款应优先满足,条件应优惠,否则就没有合作社的优越性。

再次,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基金会。1992年,全国已有1.3万个乡镇,3.6万个村,建立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它已覆盖1/3的乡和1/10的村,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管理和融通集体资金的自我服务组织,是

管好用活集体资金的一种好形式。当前在办好农村合作基金会时,要注意协调农村合作基金会与农业银行、信用社的关系。一方面它为农行、信用社拾遗补缺,充当配角,把筹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农村经济,弥补了农行、信用社贷款的不足。另一方面,它扮演了农行、信用社竞争对手的角色,促使农行、信用社转变工作作风,改革内部经营机制。

最后,引导民间信用的发展。由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手续繁琐、服务方式单一,不能适应具有强烈的时间性的市场经济的资金需求。而民间借贷手续简单,不受时间、地点、现金、转帐等方面的约束,正好适应这种需求。另外,正规金融机构受国家的宏观调控,在投向、投量和用途上都受国家政策和计划的约束,而民间信贷则不受任何框架约束,因此不少单位和个人都转向民间借贷。

3. 进一步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逐步推行市场利率。

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必须要转变到间接调控为主,农村各金融机构也要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资金平衡并承担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的金融企业。与此相适应的,农村利率也要逐步变为市场利率。尤其是把经营性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决定,使市场利率成为反映资金市场供求的信号。中央银行对各银行可通过调整再贴现率或再贷款率和其他货币政策手段来调节和引导市场利率,从而取代对利率进行直接、人为决定的做法。金融市场的发育成熟、金融机构经营机制的转变和金融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善为实行市场利率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此外,农村利率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农

村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出现了巨大变化,乡镇企业发展迅猛。1992年,全国乡镇企业共有职工1.05亿人,产值达到17.584亿元,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乡镇企业除了在起步时需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外,完全有能力与城市大工业相竞争,但农、林、牧业发展由于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生产周期长,经营风险大,加上价格政策和流通政策对农产品不利,完全靠市场利率调节难以实现。因此,今后农村应形成以市场利率为主体,以产业利率为辅助的利率体系。

4. 转变思想观念,开拓服务领域,为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首先要转变观念,牢固树立经营意识。农业银行可从经营货币资金的特点出发,利用银行信息灵、占据着点多面广,接触农民多的优势,为乡镇企业和农民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多一些“支、帮、促”,少一些“管、限、禁”,设身处地地从改善投资环境着想,造就银行资金投入的良性载体。其次,广开信托业务,兴办与金融业相关的各种业务。建立介于企业性的金融机构与政府财政机构之间的“财政投、融资”——政策性信贷投资机构——地方股份信托投资公司,恢复和拓宽委托代理、融资租赁等信托业务,开办具有信托特点的证券交易业务;运用多边信用等灵活多样的信托方式,广泛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再次,介入证券市场,开辟“第二战场”。为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的发展拓展一条新路子。可以预见,以传统业务与新兴代理业务、证券业务并举的银行发展新格局,将是充满活力的。

**作者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系
责任编辑: 谭湛明**

人力资本投资特点 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张凤林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特点及其形式

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进行投资形成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意味着将当前的经济资源的一部分用于积累,以便形成未来更高的生产能力。然而,在某些具体方面,人力投资也有着不同于物质资本投资的若干特点。其中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人力资本的形成不像物质资本那样完全依赖于物质生产过程。它既可以与物质生产过程相结合,例如通过在职培训或“边干边学”形式进行人力投资的场合;也可以与物质生产过程相脱离,单纯表现为独立的人类智力与体力生长的精神与自然的过程。由此导致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时间过程通常要比物质资本更长,可能要伴随人的终生,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正是反映了这一道理。由于这一特点,在人力资本从开始投资到获取未来预期收益之间的时间间隔也就相应延长,收益与投资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就不像物质资本场合那样直接和明显了,以至于如果不深入分析往往会将某些人力投资的收益看成意外所得。

人力资本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力投资支出有时往往与人的正常消费支出相交织,以致于难以准确地计量某一种人力投资支出量。通常,发生在人身上的支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纯粹的消费支出,它们丝毫也不改变人的知识含量与生产能力;二是纯粹的投资支出,它们的功能主要在于

提高人的知识含量与生产能力,但却并不直接满足人的正常消费欲望,像上大学等;第三类是最复杂的,它们部分地可以视为消费,部分地又可以视为投资,例如某些医疗保健服务。这种复杂情况为有关人力资本的定量分析设置了一定的障碍。

现实中,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相当广泛,择其要者,至少应包括下述三个方面。第一,保健投资。所谓保健投资是指通过对医疗、卫生、营养、保健等服务进行投资来维持和改善人的健康水平,进而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第二,正规教育投资。正规教育是指在正式的全日制学校里系统地接受初等、中等、高等文化知识这样一种智力活动,它是整个人力投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人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知识完全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并且教育还具有陶冶人的品格、驯化道德、更新观念的社会功能,所以教育越发达,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与道德品格便越高,生产能力就越大。第三,人力迁移投资。人力资源也好,物质资源也好,其经济合理的配置都不是一次性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经历调整或重新配置的动态过程。所谓人力迁移投资就是指通过花费一定的成本支出来实现人口与劳动力在区域间或产业间的迁移与流动,变更就业环境与条件,以便更好地满足人们自身的偏好,创造更高的收入。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迁移的正常发展要有良好的体制来保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力流

动基本上是自由的,藉此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中国人力资本发展的若干问题与未来思路

建国 40 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我国人力资本的开发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我们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着重大差距。由于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特别是体制的等方面原因,中国的人力资本发展从总体上看水平还比较低,结构上也很不平衡,“人口数量多、质量差”这一人力资源的基本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进程所产生的严重负面效应正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极小(见下面表三)的局面,正是人力资本这种低水平状况的真实反映,它彻底打破了过去我们曾经一度信奉的“人口优势”的神话。

中国人力资本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口数量的过度膨胀限制和影响了人口质量的改善与提高。至 90 年代初,总人口逼近 12 亿大关,比建国之初净增 6 个多亿!人口的过度增长对于人力资本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形成了数量对质量的劣性替代。一方面,人口数量的超比例增长加重了经济资源耗用的负担,从而导致社会日益缺乏进行人力投资、提高人口素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在人口素质不高的条件下,社会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又不得不依靠人力数量投入的增加,这无形中又会引发人口数量扩张的冲动,从而形成一种人口数量替代质量的恶性循环。我国改革开放前近 30 年的人口发展基本上遵循着这一逻辑。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使我国人均 GNP 长期徘徊在低于 300 美元的水平上,即使消费水平不提高,用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部分也所剩寥寥,这既拖累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步伐,又制约了医疗卫生、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从而使总人口的身体与文化素质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人力资本发展存在的另一个严重

薄弱环节是教育仍相当落后。尽管建国以来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与发达国家横向比较,其差距和落后便十分明显了。首先,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往往受到政治运行的强烈影响,其发展变化有时难以依照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比如,在过去“左”的思想占支配地位的长时期中,由于片面强调政治教育而贬低了科学知识教育的主要地位,知识与知识分子得不到尊重,许多学科及专业的设置是基于政治功利,这自然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教育的功能及其经济与社会效益。尤其严重的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整个教育体系遭到破坏,中小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高等教育先是关闭,随后虽然开办但又是根据政治标准而不是学术资格录取学生,因而实际上等于被取消和中断。这种破坏给中国教育事业和人力资本发展带来的损失是相当巨大的,其隐含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计量的。其次,中国的教育发展还受到资源投入不足的严重困扰。长期以来,教育的供给基本上由政府所控制和垄断,由于国家财力匮乏,教育投入虽然逐年增长但仍长期限于较低水平,人均教育经费、教育经费占 GNP 比例以及教育经费支出增长率等项指标,均处于世界落后水平(见下面表一、表二)。投入的不足导致教育供给的短缺,教学设施紧张,陈旧老化的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新,教师收入及生活条件相当低下,这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教育规模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最后,中国的教育体系过去长时期里基本上是在计划体制的框架内运行,投资收益率法则被排斥在外,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是教育供给很难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相适应。一方面,教育与企业实践相脱离,据统计,中国 80% 的科技人员集中在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而远离企业和产业发展实践,这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教育结构又与经济对人才需求结构相失调,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学非所用现象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二是受教育者个人收入与其教育成本支出(在传统体制下主要是间接成

本)不挂钩,导致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关系扭曲,这种扭曲将会抑制人们对于教育需求的经济动机。在传统的单一收入分配格局下,它的负效应被隐含着。一旦分配格局出现多样化,社会的价值取向逐渐转向经济功利时,它的作用便显现出来了,最终导致

人们对于教育和人力投资需求的疲软,甚至可能诱发教育的危机。近几年来,由于收入分配中的“脑体倒挂”而出现的高校人才流失、中小学生辍学严重等等现象已经显示了这种征兆。

(表一) 公共教育经费占 GNP 比重 (%)

中国 (1991)	美国 (1989)	日本 (1988)	德国 (1989)	英国 (1988)	法国 (1989)	意大利 (1985)	加拿大 (1990)	韩国 (1985)	台湾 (1990)
2.7	5.3	4.7	4.1	4.7	5.5	5.0	7.4	4.5	4.8

(表二) 受过高等教育者占人口比例 (%)

中国 (1990)	美国 (1981)	日本 (1990)	德国 (1981)	英国 (1976)	意大利 (1981)	加拿大 (1981)	韩国 (1990)	香港 (1991)
1.39	18.5	13.8	11.3	11	2.6	21.3	5.6	5.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 年)。

(表三) 全要素生产率对比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美国 (1948~1969)	日本 (1953~1971)	西德 (1950~1962)	法国 (1950~1962)	英国 (1950~1962)	意大利 (1950~1962)	加拿大 (1950~1967)	韩国 (1953~1971)	中国 (1953~1979~1988)	
47.75	55.16	70.35	73.61	53.36	70.35	39.59	38.79	8.8	28.0

资料来源:关于发达国家的数据,来自索洛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199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 226~227 页;中国与韩国的数据,取自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 年第 4 期。

最后,中国人力资本发展还面临着一大困难,这就是人口与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如前所述,通过劳动力流动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重组本是人力投资的重要形式。然而在我国,这一人力资本发展渠道却基本上被堵死了。在传统体制下,人口与劳动力在城乡各地区、产业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完全呈刚性状态,无任何流动性可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这种刚性状态开始松动,但由于受到各方面多种因素制约,人口及劳动力流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仍处于较低水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的就业结构转换严重地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乡经济仍呈现明显的

二元特征。导致我国劳动力缺乏流动性的原因,从技术层面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过度的人口增长严重影响了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使就业条件的增长大大落后于剩余劳力的增长;二是技术选择日益向资本密集型倾斜,进一步降低了资本的积累的就业弹性。这两者从根本上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从制度层面来说,则主要是在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关于就业的行政管理制度(诸如城乡差别的户口制度、招工提干制度、工业企业统包统配就业制度等等),这种制度既阻止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也限制了城市内部各企业之间劳动

力的重组,使中国的劳动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现了“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局面。尽管这种制度确立的初衷是旨在通过设置国民择业的行政壁垒来维持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情况下的经济稳定运行,但它同时却使经济蒙受了资源配置严重低效率的沉重代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影响和制约中国人力资本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人口过度增长的沉重负担;其二,教育体制与教育水平的落后;其三,就业体制的僵化与人力流动机制的缺乏。如果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么我们据此可以提出关于中国人力资本未来发展的若干思路。

第一,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率,坚持少生优生,从而为我国人口素质的改善和质量的提高创造良好的数量前提。我国学者曾提出过几种可供选择的人口控制方案,我们认为,其中“一对夫妇一个孩”的方案仍是控制人口数量的最佳方案,必须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宏观政策指导上应当始终如一,对于人口爆炸的危险时刻警钟长鸣,绝对不能有丝毫放松和摇摆不定,以至于出现所谓“开口子”的现象。同时要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对于计划生育的物质投入和精神投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人口发展逐步走上健康和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教育作为一种人才生产过程,其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就在于能够充分地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对各种人力资本的经常不断的需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进行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所谓教育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改变教育原先按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模式,而代之以市场运行模式,从而理顺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关系,使人力投资的收益与其成本相挂钩,让投资收益率法则真正成为调节教育供求总量与结构平衡的杠杆。这意味着,从需求方面看,受教育者本人或其家庭将逐渐成

为投资主体,由于这种投资是以受教育者未来预期收益为基础,故而它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对教育需求的准确信号。从供给方面看,则要求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局面,实行教育供给的竞争化和多元化。国家除了继续在普及初等教育、发展基础学科以及具有明显外部性的领域增加教育投入以外,应当允许和提倡民办教育与私立学校的发展,以增加教育的有效供给。这样将会使中国的教育事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局面,促进中国人力资本的快速生长与更新,推动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合理转移,其二是非农产业内部劳动力的优化重组。无论哪一方面的问题,其最终的解决都将有赖于经济本身的发展与体制的创新。经济的发展将通过增加积累、调整技术类型与产业结构为劳动力流动提供客观的物质条件,而体制创新则通过确立一种不同于原先计划控制模式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来为劳动力合理流动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要加大力度推进劳动就业制度与人事管理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方面的改革,向就业市场化目标迈进,真正使人力因素与物质要素的结合受制于市场价格机制。无论这一改革的难度有多大,它都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最终能否成功,从而使经济真正焕发生机与活力,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顺利而彻底地走出传统就业体制的困境。因此,只有完成就业体制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疏通人力资源连同全部经济资源流动的渠道,使各种要素在追逐收益的过程中实现最佳配置,那时,中国经济运行的面貌将会完全改观。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三资”企业发展的八个问题与对策

□赵守国

我国三资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八大问题

1. 三资企业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目前,我国的三资企业较多地以短期利润为目标,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行业和项目上,这虽然在短期内会带来显著的成效,但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势必造成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据了解,外商投资中,一般加工企业占绝大多数,“高科技”企业较少;生产低档产品的企业较多,生产“高精尖”产品的企业较少。因此,三资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面临规模与结构的平衡和选择问题。因为我国劳动力密集的加工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吸引外资、扩大三资企业规模的优势所在,但由于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较低,加工工业的扩大势必引致国内资源的稀缺约束;如果采取依靠国际市场配置资源的战略,势必加剧外汇需要的紧张,作为我国出口主要力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附加值较低,出口替代也会遇到许多困难。

2. 外商控制“三权”现象比较突出。

这是目前三资企业存在较为普遍且又十分棘手的问题,也是造成三资企业亏损面较大(在30%左右)的一个重要成因。所谓“三权”,即设备购进权、原材料采购权和产品外销权。外商往往利用所掌握的这三种权力,将国外取得的设备、原材料、元器件等高价转给合资或合作企业,再以远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取走产品,从而获得大量利润,这种手段即国际上通常所说的“转移价格”。具体体现在:(1)一些外商借合资名义向中方推销设备,利用当前内地缺乏经验,将国外的旧设备或二手设备运往内地,有的甚至用本地制造的出口后使用过的旧设备冒充国外先进设备进行投资。此外,引进设备也存在结构不合理和设备不配套等

问题。(2)引进设备和原材料作价偏高,而外销产品压价较大。(3)一些地方求“外”心切,饥不择食,顾不上对项目考察论证,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外向型经济指标,对外商良莠不分,重数量、轻质量,可行性论证流于形式,设备引进把关不严,引进的项目以规模小的劳力型项目居多,而高科技的智力型项目偏少,许多项目属于重复引进,造成产品大量积压,销路不畅。有些地方还引进了一些能耗高、污染大的项目。

3. 外商出资方式 and 履约情况欠佳。首先,从外商出资方式上看,目前主要有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以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或以技术转让、提供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作为出资方式的外商较多,而以现汇出资的较少,因而导致实物作价偏高,引进设备不够先进,技术转让费不合理等问题。另一方面,外商出资多为固定资产投资。而对构成投资总额重要组成部分的流动资金投资投入较少,甚至没有流动资金投入,由此导致企业不得不依赖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来解决流动资金问题,这不仅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提高了经营风险,而且也占用大量国家资金,也使外商对企业的经营关切度降低,这是造成三资企业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从外商履约情况来看,目前主要问题是:(1)外商出资不到位或逾期到位,即不按合同规定期限及时出资或将一次性出资变成分次到位。(2)资金认缴不足,即不按合同规定缴足应承担的数额。(3)有些外商搞假“合资”,即通常由中方企业找一外商为合作伙伴,订一份假“协议”,再把内地资金通过外方汇入,从而使企业享受三资企业待遇,而外商一次性收取“服务费”或定期提取“合作费”。更有少数不法分子

在国外一无资金二无企业,打着合资旗号,采取不法手段,骗到我方资金后逃之夭夭。(4) 合资企业注册资金比例,按规定中方不大于 75%,外方不少于 25%。但事实上外方往往欠负。

4. 产品外销比例偏低,一些三资企业经济效益不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合资企业所签合同中,外销比例不能低于 50%,多数三资企业合同规定外商对外包销的比率大都在 50%以上,有的高达 100%。但目前有不少三资企业中,销售大权大都落入外商手中,真正达到合同规定比例的寥寥无几。上述问题的出现,不仅严重降低了三资企业的创汇能力,而且也使三资企业与其他企业争夺国内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中小企业已被三资企业挤垮。

5. 三资企业偷税漏税情况严重。

我国三资企业所得税减免的规定,采取的是“从开始获利年度”后一定期限的“两免三减”政策,这无形之中为外商逃税漏税留了空子可钻,导致许多外商采用种种手段,虚列成本,形成企业表面亏损,从而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

6. 外商投资规模偏小。

这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外商投资数额较小;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较小。这不仅造成了企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不经济,而且也导致了投资的过度分散。

7. 外商单方承包企业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一些地方的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实行了外商单方承包经营的企业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对部分企业扭亏为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完善而规范的法规,中方无法通过正当手段对其经营行为加以正当干预,导致一些外商在包的三资企业管理不善。部分外商以“包”的形式独揽企业所有大权,挖走企业所得,逃避税收,转移利润,使中方在收到一点承包费的同时导致国家所得税大量流失。

8. 三资企业政策还存在不完善不配套

等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一些地方制订出许多超常规的优惠政策,在土地出让,银行贷款、产品价格、税收减免等方面竟开“绿灯”,结果不仅减少了财政收入,增大了银行风险,削弱了吸引外资的整体实力,而且使个别外商产生了利用优惠政策捞一把的短期投资行为。第二,目前我国《破产法》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三资企业尚无破产法规出台,这使一些接近破产的三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有机可乘,他们仅采取解散形式遣散员工,我方不能依法索还债权,致使我方经济损失严重。第三,我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完善,使相当多的外商投资范围有限,限制了投资意愿,直接影响到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长远发展。第四,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尚未形成统一的市场规则,使外商投资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经常会遇到不同的市场规则,增加了外商经营的难度,甚至导致有些外商利用不规范的市场规则进行投机盈利。

关于我国三资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现阶段,大力扶持和促进三资企业的发展,对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十分有利的。针对我国三资企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认为:

(一)面对三资企业迅猛发展的态势,应加强三资企业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强化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外商投资的流向,克服单纯追求规模、盲目扩大的倾向,通过产业政策的倾斜,使外商的投入结构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保持一致,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角度把握三资企业的发展方向。在具体操作上,应明确规定外商投资的产业序列,通过对外商投资产业的限定,使众多规模较小的投资在某一个或某几个产业达到适当的规模,提高产业规模效益。

(二)提高三资企业的国际经营水平和管理水平,克服外商控制“三权”所引发的一系列弊端。三资企业“三权”受控于外方以及造成的企业亏损等问题,说明我国缺少涉外经济活动的专门人才,与国际社会的联

系与交往不够密切,对国际市场价格缺乏了解。因此,应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1) 加快涉外经济活动人才的培养,扩大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交往,及时掌握国际市场行情,全面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2) 有关银行和中介机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协助中方企业寻求资信高、经营作风好的合作合资伙伴,积极配合企业和有关部门做好可行性研究。(3) 外经、工商、外管、计委等有关部门在三资企业的审批、管理上要严把资金、技术、设备关,防止外商非股权盈利。同时做好设备的咨询工作,控制外方陈旧、一般以及二手设备出口,以保证设备的技术先进性和价格的合理性。(4) 有关商检部门应成立涉外资产价值评估鉴定小组。利用全国商检系统信息网络,详细占有所需设备的历史资料、原始资料和现行市场资料等,积极与地方财政、会计事务所等部门加强联系与协作,公正严谨地开展外商出资引进设备的价值评估,维护国家和合资中方的合法权益。(5) 有关银行、商检部门和会计事务所要互相协调,积极配合,规定三资企业凡无商检检验书或资产评估报告的,会计事务所不予验资,有关银行不予贷款,从而减少中国有关银行的贷款风险,避免三资企业“假亏损”现象,提高引进设备的质量。

(三) 规范外商出资方式,加强三资企业合同的严肃性。在外商出资方式上,应尽量要求其以现汇投入,对外商流动资金投入也应有一定的规定,既可以把流动资金的投入作为项目论证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可以要求外商投资中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流动资金,其数额至少应达到企业自备铺底流动资金的一个适当比例;为防止外资不到位或逾期到位,应完善合同内容,合资合作双方所订合同的条款中必须明确规定投资逾期处罚的有关条款,对认缴投资不足的外商,除按不足金额扣减其相应利润分成外,还应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为保护产品的外销率,在合同中应明确确定外商对产品的包销比例、外销产品限价范围、质量标准、外销货款结算方式、汇回时间及违约责任等等,以保证产品外销的顺利完成。

(四) 加强对外商单方承包企业的管理。要切实贯彻经贸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承包经营中外合资企业的规定》,对承包经营企业实行规范化管理。对外商单方申请承包合营企业,要严格进行审批,认真审查承包者资格和承包经营合同,对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予批准。对已实行单方承包的合营企业,应进行清理整顿、重新审查,如不合乎规定,应解除承包合同。要健全外商承包企业的管理机制,堵塞外商单方承包企业管理上的漏洞,以确保国家利益不受侵害。

(五) 随着中国“复关”的进程加快,进一步提高市场开放程度,统一市场规则,消除三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利益差别,并逐渐使各类企业向着规则同一,充分竞争,都享有“国民待遇”的方向过渡,进而为三资企业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其中包括:进一步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对高技术的外国投资企业产品开放国内市场,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外商可在国内商业、金融、外贸、航运、航空等领域投资,允许外商以工业产权(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为资本投资等。

(六) 鼓励吸引外贸与发展跨国经营并重,以“引进来”为起点,以“走出去”为目标,逐步将我国的对外开放从贸易平衡阶段转向要素平衡阶段,在国际大市场的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取转移效果与创造效果的双重利益。

(七) 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加快新旧体制的转轨,按国际经济惯例进一步完善三资企业的政策,并逐步使之配套,加快有关三资企业的立法工作。按照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在全国大市场范围内统一三资企业政策,避免在土地转让、银行贷款、税收减免方面的各地“土”政策的不规范,切实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加强粤港澳经济社会研究， 广东学术界责无旁贷

——本刊邀请部分学者座谈粤港澳研究问题

□本刊记者 谭湛明

再过三年，中国即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6月30日《学术研究》杂志社召集广东学术理论界的部分学者、专家就加强粤港澳研究，迎接“九七”香港回归进行座谈。李华杰、周维平、雷强、郑天祥、许隆、张仲深、周毅、龚唯平、吕沛、戈晓宇等港澳问题研究专家出席并作了发言，现摘要概述如下：

一、关于九七前后粤港经济体制“对接”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广东与香港在经济体制上的“衔接”应是指广东的经济体制和香港的经济体制在最大可能上趋于一致，相互协调，彼此兼容，促进双方经济交流、合作互补和互利。从目前和未来半个世纪来看，广东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这只是社会形态不同，经济运行的规律是一样的。随着广东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地缘特点，粤港经济运行机制上的共同点会越来越多。香港的市场运行方式主要遵循国际惯例，而广东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日益向国际惯例靠拢，很多市场运作规则与香港十分接近，有的甚至从香港借鉴过来；粤港市场的联系也已十分密切。广东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不断创造条件与香港在经济运作和市场方面衔接的过程。

一些学者指出：粤港在经济体制上实行

衔接，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战略工程，必须精心设计和周密部署。总的来说应遵循以下原则：（1）要符合党中央的统一部署；（2）要符合“一国两制”的构想，保证香港的稳定繁荣；（3）要符合广东的具体情况和发展目标，要积极创造与香港经济体制衔接的条件；同时加快对广东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

还有学者认为：广东要创造与香港经济体制衔接的条件，需要中央给予更大的政策上的支持。十多年来，中央给予广东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广东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基础；毗邻香港，更是广东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地缘优势。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广东要继续“先走一步”的话，除广东自身的努力外，还必须给予广东更多的新的政策和更大的改革试验权，那么，广东将很可能为促进香港“九七”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关于粤港澳经济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广东是全国最早开展港澳研究的地区，80年代初广东港澳研究会成立，接着又建立了港澳研究中心，它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今广东港澳问题研究工作者已发展到400多人，专门的研究刊物近10种。但总的来说，人力、研究经费等的投入还是很不够的，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均存在很多薄弱点。专家学者认为，随着“九七”香港回归的临近，目

现代价值科学学科新体系 钱氏体系中的

● 黄锦奎

前的研究不能再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基础上,而要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深入。既要作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也要加强应用研究。与会者建议:(1)由政府部门或广东省社科联成立一个研究小组,从宏观上探讨粤港澳经济的衔接与共同发展,拟定一批研究课题,组织攻关,为省政府甚至中央有关决策部门提供更有操作意义的方案;(2)应开展一系列关于粤港经济对接的专题研讨活动,拿出有价值的综合研究报告;(3)当前理论研究工作与政府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员联系太少,互相脱离,今后应加强合作,协同开展研究;(4)要更新研究方法和视角,既要站在内地研究港澳,也要“站在海外的角度”研究广东和内地。应加强与港、澳学术机构的交流合作。

三、关于粤港澳经济关系研究的新课题。座谈会上,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21世纪粤港澳经贸合作的走向;粤港澳经济体制对接的研究;粤港澳金融、证券市场接轨问题的研究;粤港澳科技、人才交流问题的研究;粤港澳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和产业结构接轨问题;粤港澳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与衔接;粤港澳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方式的协调与衔接;区域发展与粤港澳经济互补;粤港澳海关、口岸管理的衔接;粤港澳会计体制的衔接;粤港澳经济贸易关系的衔接等。

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就《学术研究》拟开辟粤港澳研究专栏提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有的学者指出:《学术研究》开辟粤港澳经济研究专栏要有特色,应将编辑取向定位在理论层次上,同港澳经济的专门刊物有所区别和分工。有学者认为,对于粤港澳经济研究的专题报告,尽管理论层次不是很高,但因为是综合性的,所以也应适当发表。

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创造性地构筑了一个庞大丰富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即“钱氏体系”。这个体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在联系,吸收提炼凝聚了现代科学文明成果与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对于指导推动当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功能,从而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科学技术体系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钱学森把这个知识体系分为十个大部门: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文艺理论、思维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每一个科学部门又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并认为“这个科学技术体系是个开放的系统,不断演化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内容会发展变化,会有新的大部门出现。”这些富于创造性的构想与论断,有效地指导着我们对于新的学科与新的大部门的研究与探索。

为什么一小块薄如纸、重量不到一克的硅片,经加入信息后会变成价值连城?为什么价值百万的股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而一块光秃秃的黄土地转眼间价值千金?一个正确的决策可以振兴一个国家和民族,而一个企业决策的失误会使前景看好的一种产品乃至一个企业的老本蚀尽、满盘皆输?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玄机和规律,而科学地揭示这种玄机和规律,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前景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若干年前,我带着这些疑惑,开始对这些现象进行探索。

实质上,上述现象是一个价值与价值转化的问题。价值问题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问题,价值原则与真理原则一直是人类有目的地从事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所依循的两个基本原则。然而人类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至今却是极其肤浅的。“价值”这个词无论在西方或东方,在远古的时候,就存在了。虽然经济学从劳动价值论开始对商品的价值进行了研究,但在人类文明史上真正对价值进行系统研究而形成哲学价值论,却仅有100年左右的时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才开始使用“价值学”这个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获得迅速的发展。我国学者对价值问题的系统研究,则是80年代以后的事,实际上目前的所谓价值学研究主要是价值哲学的研究。

根据钱学森所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创造性的论断,我认为真正意义的价值学,不只是研究价值哲学问题与对商品的价

值进行个别的经济学研究,而更主要的是要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价值变化规律,尤其是对价值转化规律进行全面的研究,并由此形成一个既具有理论学术意义,又具有操作性实践意义的包括价值哲学、价值学、价值转化学、价值转化工程四个层次在内的价值科学新体系。我的这些不成熟的构思得到了钱学森教授的鼓励与肯定。他认为“提出将价值科学作为一大部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还有地理科学并列,成为11个大部门的体系。这是一个新思想”。

一、价值与价值学新概念

(一)“价值”的概念。“价值”本是一个古典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至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价值论学派以至萨缪尔森的经济科学,均对商品的价值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19世纪被德国学者引入哲学,现已成为现代科学文化领域中一个具有广泛重要意义的范畴。但要对“价值”下一个明确而被普遍接受的定义,目前却很困难。因为不同领域及不同角度对其有着不同的表述。就“价值的界定”来说,目前学术界给价值下的定义就有几十种,如“需要”、“意义”、“属性”、“劳动”、“关系”、“效用”等。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与观点,我认为“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表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效用过程的性质与程度。也可以说,“价值”就是财富。所以我提出的价值学新体系所指的“价值”概念是一个广义的价值概念。

(二)价值学新概念。目前我国学术界所称的“价值学”实质上就是价值哲学,而作为真正意义的价值学不仅要研究哲学问题,而且要研究人类各个领域的各种各样的价值问题,并对其提供统一的综合研究。西方有的学者认为,价值学相当于社会科学中的数学,R. S. 哈特曼说:“价值学是一种形式学科,它应用于伦理学、美学、经济学及其他哲学的社会学科,但并不等同于任何一种这些学科,正如几何学应用于但并不等于物理学”。我认为,应当把价值学看成一门形式学科或社会科学的数学;它应当象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系统科学那样,成

为一门横断综合大学科,应当在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开放系统中找到应有的地位,成为第11个新的大部门。这就是价值学的新概念。在“钱氏体系”中,价值科学是一门研究价值产生、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的学问,是一门研究人类以最小代价充分地利用价值资源、最佳地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大学问。

二、价值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作为“钱氏体系”第11个大部门的价值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一) 价值学基础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下,深化马克思主义价值研究,包括价值的概念、本质、价值变化的一般形式与特征,以及价值的组成要素、特征、结构与价值系统的分析、价值的形成、影响因素及其过程分析等,价值学研究方法,价值学研究内容的拓展,价值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价值学的意义等等。

(二) 价值的类型性质与关系。主要指物质价值、精神价值、人的价值与综合价值的特征与它们的相互关系等。(三) 价值资源学。包括价值资源的分布,价值资源类型,价值资源调查与分析,价值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及其方法等。(四) 影响价值形成、发展变化的主客观因素与条件及其作用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五) 价值形成、发展变化过程中各种复杂价值关系的特点与形式、各种复杂价值关系的有机构成,价值关系结构与层次及关系转化规律与方法等价值关系的研究。(六) 价值变化规律研究。主要研究价值变化起因、价值变化范围、价值变化特点、价值变化方式、价值变化内容、方向程度、价值变化时效和价值变化的一般规律及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阶段的价值变化特点规律等。(七) 价值转化学。研究价值转化的特点与价值转化的一般规律,包括价值转化一般规律、软价值转化规律及其在各个领域里的应用等。(八) 价值认识与识别研究。包括价值认识的过程,价值认识的方式方法,价值认识工具,价值认识范围与领域,价值认识的意义等。(九) 价值创造研究。运用现代价值创造学的新思想新成果新方法研究如何进行价值创造的途径与方法及工艺技术等。(十) 价值开发学研究。开发一切可以利用的价值资源,探索与探寻出

新的价值资源,创造性地开发软价值资源及其开发技术方法研究。(十一) 分类价值学研究。如经济价值学,军事价值学,科技价值学等研究以及宏观价值学、软价值学研究等。(十二) 价值学规律在人类各个活动领域的实践活动中的应用研究。价值学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与广泛,由于新价值学学科体系仍在探索的萌芽状态中,上述提出的十二个方面,仅是限于作者的视角所及一些新价值学研究的方向性课题。从这些方面的内容与课题可以看出,价值学是一门内容极其丰富且具有极其重要实践意义、与各学科有广泛联系和发展前途的崭新的大学科。

三、价值转化学是价值学的核心学科

价值转化学是价值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价值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价值学的两个主要核心问题是价值资源与价值转化问题。价值转化作为价值运动发展变化的主要内容与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研究价值转化的特点与变化规律的学问就是价值转化学。

价值转化学是整个价值学学科体系中的核心学科。价值学的研究核心是价值的运动变化规律,而价值运动变化规律的核心是价值转化规律。从广义上讲,人类一切有目的地从事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活动,其重要目的是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创造价值创造财富的实质是使价值由负向价值向正向价值、由小价值向大价值、由零价值向正向大价值的转化。研究掌握价值转化的规律并运用它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为人类更快地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在价值转化学研究中处于中心位置,是价值学学科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价值转化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一) 价值转化的理论基础,包括价值转化的概念、价值转化可能性、价值转化代价、价值转化方式方法等。(二) 价值转化要素与价值转化过程的研究。(三) 影响价值转化的若干主要因素研究。如影响价值转化的主体因素、主体价值转化意识、主体价值转化认识能力、主体实践活动工具与技术手段、主体实践活动能力与影响价值转化的客观因素、自然因素、空间因素、资源因素、自然条件、社会因素、客体自身因素等。(四) 价值转

化类型研究。包括自然价值转化类型如时间价值转化类型、空间价值转化类型、时空整合价值转化类型、信息价值转化类型、资源价值转化类型与人工价值转化类型、综合价值转化类型等。(五) 价值转化关系的研究。包括宏观价值与微观价值转化关系,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转化关系,显价值与潜价值转化关系等。(六) 价值转化一般规律研究。笔者在《现代点石成金术——价值转化工程》一书中提出了十二条价值转化规律,即价值转化能力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规律(能力律),价值转化最小量规律(最小量律),价值转化最大量规律(最大量律),价值转化时态规律(时态律),稀有价值转化规律(稀有价值律),风险价值转化规律(风险价值律),空间价值转化规律(空间价值律),价值转化相关效应规律(相关效应律),价值转化滚动增殖律(滚动增殖律),价值转化良性循环规律(良性循环律),信息价值转化规律(信息律),系统价值转化规律(系统律)等。(七) 宏观价值转化规律研究。主要包括宏观价值转化非平衡规律,宏观价值转化稳态规律,宏观价值转化协调规律,宏观价值转化结构规律,宏观价值转化速度规律,宏观价值转化区域规律,宏观价值转化周期规律,宏观价值转化系统开放规律与大循环规律等。(八) 微观价值转化规律与特殊规律研究。包括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专业在微观层次的价值转化规律与特殊的价值规律及其应用的研究。(九) 软价值转化规律的研究。包括软价值转化的无限化规律,软价值转化非等价规律,软价值转化流变规律,软价值转化取向倍增规律,软价值超额转化规律,软价值垄断性转化规律,软价值中介规律,软价值转化潜移规律,软价值转化泛化规律与软价值转化统摄转化规律等。(十) 价值转化规律的应用研究。

四、价值转化工程

西方有一位学者说过,纯科学研究所带来的每一次理论进步的浪潮,总要激起一次工程技术的飞跃,因为这样的进步,总使一种崭新的技术成为可能,同时,这种崭新技术自身又进一步派生出其他新技术。笔者冒昧认为,价值学研究带来的“理论进步的浪潮”将激起一次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具有极其

重要实践意义的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工程技术的飞跃,那就是“价值转化工程”。

了解价值转化工程,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工程”的概念。工程(engineering)是应用科学知识使自然等资源最佳地为人类服务的一种专门技术。工程问题有明确的目的性,并综合考虑其主观目的及其客观实现问题,创造性地进行设计,提出最佳解决方案,兼顾多方面的因素,采取最可靠和最经济的方法。而“价值转化工程”——现代“点石成金术”就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价值转化的特点与规律,并应用这些特点与规律,有效地改造客观事物,以最小的代价促进客观事物的价值转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的价值资源,提高客观事物的价值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一门现代综合软技术。从广义上讲,人类有目的地从事改造客观世界以适应人类主体需要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可以说是价值转化工程(包括软工程与硬工程)。价值转化工程就是从价值哲学、价值学与价值转化化学的角度,研究人类如何有目的地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综合性横断学科。它的重点是从价值哲学、经济学、文化学、技术学等方面统一的角度探讨价值与价值转化的问题。价值转化工程是人类智力大开发工程,它是通过开发人的思想与智力,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与聪明才智,为人类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现代重要智力工具。

价值转化学中的价值转化规律是价值转化工程的理论基础。价值转化工程自始至终,从选择价值转化对象,确定价值转化目标,到制订价值转化方案与方案的组织实施,都离不开价值转化规律的指导。特别是在价值转化工程中,必须创造性地运用价值转化规律,开发创造各种各样的价值转化工程方案,离开了运用价值转化规律,价值转化工程方案就无从谈起。因此可以说价值转化学是价值转化工程的基础学科。

运用掌握好价值转化工程,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综合知识,除了需要掌握价值学、价值转化学等知识外还要具有通晓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特别需要系统工程、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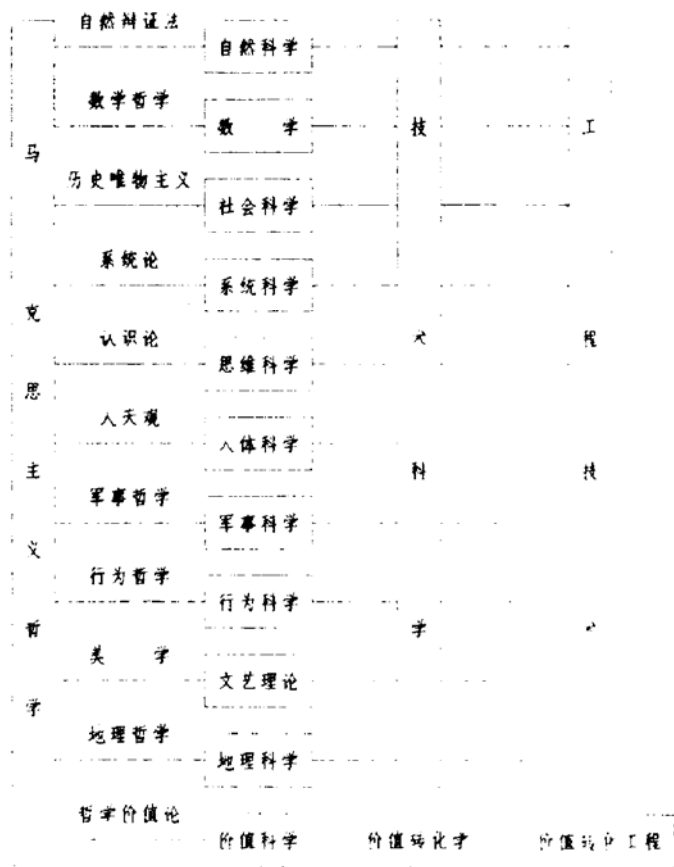
源学、经济学、投资学、时空学、决策学、智囊技术与物元分析,思维科学与思维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五、一个崭新庞大的价值学学科体系

一个完整的价值学学科体系,应当由价值哲学、价值学、价值转化学及价值转化工程组成的庞大学科体系。这是与钱学森关于人类科学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四个层次相吻合的。价值学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应用,其核心是价值转

化规律。研究价值转化的规律与方法的价值转化学属于技术科学层次,它不仅要研究价值转化变化规律,而且要研究如何实现价值转化,研究实现价值转化的方式、方法与途径。价值转化工程则是一门实施价值转化的综合性软技术。

价值科学在整个钱氏人类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学学科体系,见下图所示:



价值科学、价值转化学、价值转化工程在《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中的地位



价值学学科体系图

作者单位: 深圳市卫生局
责任编辑: 冯达才

《荀子》“制天命”新训

□李中生

《荀子·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多年来，不少人认为：这段议论表现的是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思想。甚至有人认为“仅仅强调征服自然，而不注意顺应自然，不注意与自然相协调，是片面的观点”。①其主要根据是将“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理解为：与其推崇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来畜养而控制（或驯服、制服）它？其实，这并非荀子的本意。唐人杨倞对此话的解释是：“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丰富，孰与使物畜积，而我裁制之也。”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说：“‘物畜而制之’之‘制’，当为‘裁’。思、裁为韵，颂、用为韵，待、使为韵，多、化为韵。思裁二字于古音并属之部。制字于古音属祭部，不得与思为韵也。……（杨）注言‘制裁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义耳。今正文作‘制之’，即因注内‘制之’而误。”今人高亨《荀子新笺》又说：“‘物畜’当作‘畜物’，转写误倒。裁字无由误为制，疑本作‘财’或‘材’，‘财’‘制’谐字相似，‘材’‘制’篆文相似，故误。《非十二子》、《儒效》、《王制》诸篇并云‘财万物’，杨注‘财与裁同’；《富国》篇‘材万物’，杨注‘材与裁同’；此文亦同。思与财或材谐韵。”

王、高二说皆言之有据，只是《荀子》鲜用裁字，而常用其借字材，而材制篆文极相似。材（或裁、财）在《荀子》的常用义为：因人之能而任用之，或因物之宜而使用之。《君道》篇“材人”，卢文弨释为：“谓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此说颇得荀子之旨。《荀子》中官字也可表示因人之能或因物之宜而安排、使用。如《君道》：“是官人使吏之材也。”梁启雄《简释》引梁启超说：“因材器使各当其用如五官然，谓之官人。”《富国》：“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王先谦注：“官，谓不失其任，各当其任无差错也。”因此，材官二字常连文或对文。《解蔽》篇说：“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所谓“材官万物”，意为“依照着各物之宜来酌量处置，使人都称其任，物都适其用”。（梁启雄《简释》注语）上引“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材）之”，其材字用的也应是因物之宜而用之的意思。此外，

物畜二字，不能理解为“把天当作物来畜养”的偏正结构。因为，这段用作比较的“孰与”，其前后语句的语法结构都是对称的，首句的“大天而思之”与“物畜而制（材）之”，语法结构也应对称。高亨认为“物畜”当作“畜物”，甚当，这样“畜物”与上文“大天”的动宾结构便对称了。总之，“物畜而制之”，当作“畜物而材之”，“材”的对象是物而非天。杨倞对“大天而思之，孰与畜物而材之”这句话的解释基本上是可取的，义为与其尊崇天而想象着能象它那样拥有丰富的物产，不如将物产畜积起来，根据各物的所宜来酌量使用它们。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一些学者把“制天命”笼统地解作“制裁天命”或“控制天命”；②另有一些学者把“天命”释为自然规律，“制天命”即“制裁自然规律”。③实际上，荀子说的“天命”，既与孔子所说“畏天命”的“天命”含义不同，又不指自然规律。杨倞将此句释为“颂者，美盛德也。从天而美其盛德，岂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按，制裁，其义当为安排、规划）。谓若曲者为轮，直者为桷，任材而用也。”杨倞此解在今天同样被忽略了。《礼记·祭法》：“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论衡·骨相》：“命谓初所禀得而生也。”荀子与先秦不少思想家一样，把天看作造物主。如《荣辱》篇说：“天生蒸民。”《赋》篇说：“皇天隆物，以示下民。”因此，荀子说的“天命”，即天所生之万物。“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意思就是：与其跟在天的后面赞颂皇天隆物的功德，不如将天所生之万物合理地安排规划而加以利用。

弄清楚开头两句，接下来的四句也就好理解了：与其仰望天时而等待它的恩赐，不如因时制宜地利用天时；与其听任物类自然增多，不如施展人的才能去促进物类的化育繁殖；与其想象着让万物为自己使用，不如治理万物而使万物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与其指望物类自然增长，不如根据它的生长规律去促进它的成长。很明显，这段议论反复申说的都是协调自然的思想，其中虽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其侧重点是让人们去辅助天地，治理万物。“天能生物，不能辨（治）物。”（《礼论》）治理万物的责任在于人。

①见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109页。

②如王忠林《新译荀子读本》（台北三民书局1977年再版）注：“制天命而用之，言制裁天命而利用它。”杨柳桥《荀子诂译》将“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译为：“哪如控制天命而利用它呢？”

③如梁启雄《荀子简释》认为，《天论》篇“天行有常”的“天行”指大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又说“制天命指制裁天道。”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史学功能沉思录

——当代史学功能研讨笔谈

编者按：史学的功能是什么？过去似乎解决了，结果回头一看，其实并未解决。今天是否解决了？回答恐怕也是人言人殊。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无疑给史学研究领域注入了许多新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在一种新的历史起点和参照系中，去回答和把握“史学功能”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命题，从而推进史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仍是一个有待致力的问题。最近，本刊与广东历史学会邀请了我省史学界部分同志举行座谈。现将座谈内容以笔谈形式发表，以飨读者。我们恳切盼望史学界的学者同仁都来思考，以期自觉地把握和顺应时代的导向，开拓史学的新境界。

史学的历史与现状

胡守为

(中山大学历史系)

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长期以来有争论，由于时和地的不同，争论的内容可能不一样。当欧洲大陆处于神学统治的年代，一切都出于神的意志，历史学自然不会被视为科学。从神学解放出来的史学家觉得历史需要通过人的意识反映出来，往往为史学家个人意志所左右，对其所写的历史的真实性亦即科学性抱怀疑的态度，历史学似乎难以纳入科学的范畴。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朗克提出：“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在于如实地说明历史”，历史学家做到尊重事实，不偏不倚，历史学仍可成为科学。故朗克被誉为“近代历史科学之父”。但历史学家又认为事实固

然是历史研究的依据，而历史学家的任务绝不限于求证事实，因此有人主张历史学应赋予哲学内容，使之能从事实中求得结论。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家要弄清事实，需要把事实背后的各种思想也确定，才能对事实有更深入的理解。这样，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若赋予哲学内容，而哲学有各种流派，各行其是，也难取得统一的客观标准，只能在哲学观念上纠缠不休。有的历史学家超脱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片面性，把历史学的主旨提出来，作为史学研究的准绳，如英国史学家称：“历史学家的作用是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既然历史对现实有指导作用，就不能没有客观的标准，于是如何认识这个客观标准，便成为历史学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从最简单的事实道出不破的真理，他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

等等,生产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决定社会诸形态。“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如果用哲学来概括,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道理连西方不带成见的历史学家也接受了。人们可以准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容怀疑。

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完全相同。中国的史学很早就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和借鉴作用,但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支配下,在实践中往往走样。袁宏在《后汉纪》序中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是其代表。及至近代,西方史学传入我国,使我国史学发生巨大变化。直至60年代初,史学界有各种争论,却未有否定历史学的作用者。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检讨这场浩劫时,对一些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幻而擅意修改史实和史论的现象不满,便有人说,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或者说历史学无甚价值。由此引发了历史学界关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讨论。尽管讨论中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有一个共识,即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社会科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今天高谈历史学不是科学似不多见,但在潜意识中恐怕也非个别人如此认识,甚至直认为历史学无用。近年来高校历史专业报考的情景以及毕业生分配的状况,便可体会到。其原因与当前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有关。

既然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学的研究就不能与市场商品等量齐观。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发展来龙去脉,不从中国的历史中认识中国的国情,而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主观一套便是空谈。即以广东来谈,广东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特点,这些特点影响着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能正确地掌握这些特点,对制订当前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政策,肯定会大有帮助。如果要衡量历史学的经济效益,这应是重要的经济效益,不过往往不是立竿见影而已。理解这一点,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历史研究应给予支持和帮助。

史学的现实性品格

陈长琦

(暨南大学历史系)

史学有一基本品格,就是它的现实性。

历史与现实相对立而存在,同时又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人们的知识,基本由历史知识所构成,人不可能抛弃历史所提供的知识,而在空中构筑楼阁。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缘由所在。现实依赖于历史。同时,人们在创造、发展的社会活动中,也不断会提出新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人们回首思索,去探讨历史,从而,给历史研究提出任务,因此,历史研究的动力也往往来自现实。

史学的现实性,史学为现实服务,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种是直接地、将史学研究的成果为现实服务,例如,围绕现实的需要去确定研究的课题、开辟研究领域,近年来蓬勃展开的经济史、文化史研究即属于此。再如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发挥历史学的资治与鉴世功能。江泽民同志提倡的“二史一情”研究,及文化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史的研究,属于此。又再如宣传与普及历史知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中小学历史教育属此。

史学现实性的第二个层面,是间接地、通过史学家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通过整理,弘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从而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水平而实现的。这种为现实服务的方式,是深层次的,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例如石器时代考古,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其它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诚然,这些研究,如同某些自然科学门类的基础研究一样,为现实服务的功能,难以立竿见影,但它在总结、保存民族乃至人类文化遗产方面,却功在千秋,难以一时得失来

衡量。它的现实性不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的,而是芳馥久远的。

史学的现实性品格,规定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基本属性。直接性与间接性是史学为现实服务的不同形式,二者都有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因此,史学研究提倡“古为今用”,但不宜提倡“厚今薄古”。对史学的现实性品格的理解,不能从表面层次去体认,不能以实用主义,以眼前利益为准则;而应该从深层次,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长远与整体利益去认识。实践证明,浅层次的、直接为现实服务的史学成果,虽有立竿见影之功用,但亦有随着社会的变迁,现实需要的转移而失去其功效之危险;而那些深层次的、高水平的史学精品,却能长久保持其为现实服务的生命力。如千古绝唱——《史记》,千百年来“服务”着一代又一代人,它那博大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减,反而历久弥新。正确地认识史学的现实性品格,正确地处理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关系,是推动史学走向繁荣的基本条件。

发挥史学功能的途径

宋德华

(华南师大历史系)

史学研究的内容涵盖面之广,恐怕很少有其他学科能够相比。由此,史学功能多元化的特点非常突出。它在使人们了解历史的知识、真相及规律,日益变得睿智和完善方面功德无量,但有时也因为被曲解或滥用而误人非浅甚至助纣为虐。要充分发挥史学的正面功能而避免其负面效应,不可不注意研究发挥史学功能的途径。

首先必须尊重史学的科学性。史学的科学性有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特点。联系史学研究的现状,我认为有必要加强三种意识。一是对研究对象的旁观意识。换句话说,这就是要将研究对象如实

地当作一个客体,尽量减少研究者主观好恶因素的左右。一切过去的事物(人物、事件、制度、思想等等)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意义等无疑是有差别的,甚且判若霄壤,但一旦作为研究对象,它们就需要以同样严格的客观态度来对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切感情纠葛(不论这种纠葛的根源何在)都应尽可能完全地斩断。不如此,实事求是是很难贯彻到底的。二是研究者的独立意识。史学研究像其他科学研究一样以追求真理为最高准则是大家都承认的,而研究者若是没有或缺乏独立意识,追求真理便是一句空话。这里的独立意识,是指研究者用自己的头脑,以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而不是屈从于科学研究之外的其他因素作盲从之论或违心之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者没有理由不作出更大的努力,来更好地发扬史学研究的科学精神,克服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的“婢女”观念的残余。三是学术意识。史学研究自身有一套科学规范,不能混同于搞宣传,写时文,编故事。其中很重要的是要有科学创新精神,最忌套话旧话、照抄照搬。创新是科学的生命,没有创新,史学研究就没有生命力,更谈不上功能的发挥。

关注现实是发挥史学功能的又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史学研究有些非常专门的领域可能与现实永远没有什么联系,但就史学的总体而言,则非与现实保持密切的关系不可。如若不然,史学就真的会变成“死学”。史学研究关注现实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一)要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领域。研究者应敏锐地发现和准确地把握现实发展已经或将要提出的课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其解答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内在的动力,从而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日益丰富,并保持旺盛的活力。(二)要站在现实的高度,深入进行历史的反思。人们常说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现实感受深刻的研究者才会使“镜子”的称号名符其实而不至于使之变成一面哈哈镜。这也是要求史学研究决不要满足于或停留在前人的水平。

(三) 要用史学研究的成果影响于现实。尽管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但作为研究者应有此自觉的意识,并作出积极的不懈的努力。

力戒公式化脸谱化 真正以史为鉴

赵立人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从古到今,人们都经常说要“以史为鉴”,这大概要算是史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了。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口号年年讲、反复讲的情况下,中国大地出现了两次和平时期最大的人为浩劫(“大跃进”和“文革”),主要根源当然不在史学方面,但无可讳言,由“四人帮”及其同伙导演,打着“古为今用”旗号的“批海瑞”、“评法批儒”等闹剧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为了使“以史为鉴”真正起到有益的作用,必须首先检查一下“镜子”(史书及其他史学论著)本身。

如果这面镜子被人为地涂上油彩,或者本身就是一面哈哈镜,就会误导照镜者,参照它来制订政策,必然误国误民。因此,谈到史学功能,前提是要有实事求是的史书和史学论著。

在“文革”时期及更早一些,某些研究者(一般是违心地)曾经在“以理论为指导”的指令下,任意剪裁、歪曲史实,对由政治权威定性的“爱国、进步”人物曲意粉饰、回护,务使其形象格外高大,对同样由政治权威定性的“卖国、反动”人物,则务必深文周纳,丑化、鬼化。此种“研究方法”,可称为脸谱化与公式化,这样的史学著作,读起来黑白分明,却不免黑白颠倒,而且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强词夺理,令人生厌,更严重的是以错误的结论来指导现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加于史学工作

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已解除了,但这一套“研究方法”却仍死而不僵。试举数例。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与官府为敌的民间变乱几乎从未停止过,旧史书一律记为“盗贼”,建国后则一律彻底翻案,称为“农民起义”。其实实际情况很复杂,如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等,纪律严明、政治目标明确,自然可称起义,但把多如牛毛的打家劫舍、残害良民的土匪队伍也称之为“农民起义”,则是明显不当的。对大多数性质不明确的起事队伍,可称之为“民变”而不必定性。否则,凡对抗官府者一概加以褒扬,徒令奸宄生心,不利于今天的社会安定繁荣进步。

为了证明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总的说来是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闭关锁国有理,权威发明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说”,凡是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一律称为“萌芽”,然而,类似的工场在前代(例如西汉)也并不少见,何以又不是“萌芽”?这种“萌芽”论不仅在史实上无法自圆其说,在理论上与《共产党宣言》直接抵触,在实践上也不利于对外开放。

近代史研究中,公式化倾向尤为突出,凡是盲目主战、盲目排外者,都是爱国,凡是主和,都是卖国。如此划分,可说是违反常识。其实,战与和,都应从国家利益考虑,应战而和,损害国家利益,固然是误国,(未必是卖国),应和而战,招致惨重损失,又何尝不误国!对列强侵略,谁无义愤,然如广州反入城、大沽口之战、义和团等等,虽取快于一时,然招巨祸于日后,至少是不宜再简单地作为爱国主义典范来宣传的。“文革”时期火烧英国大使馆等愚行,恐怕就是在这类宣传的直接启迪下干出来的。今天,以正确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代替对盲目排外行动的赞颂,当是近代史研究的功能之一。

一些历史人物,过去根据“公式”所加的罪名往往不实,就应重新评价。如琦善,过去斥为卖国贼,罪名主要三条,一是反对严禁鸦片,二是拆毁防御工事,开门揖盗,三是私割香港。近年的研究表明,这三点都是不实之辞,至于他在对英交涉中,不持强

硬立场，实形势使然，但他在极不利的形势下仍未在实质问题上作重大让步，仍“故事磨难”，不宜称作“投降”。

有用与无用

桑 兵

(中山大学历史系)

史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达如西方，也未见颓势，而后起的社会科学目前正从史学中寻求动力，可见其价值的永恒。现在不断讨论史学功能，原因有二：1. 社会歧见；2. 学者动摇。史学危机，不始自今日，所争在于有用无用。对此，学术大师们早有精辟论断。顾颉刚曾经说：“学问的范围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25页）顾氏的观念来自王国维。王的视野扩及整个人文学科乃至学术整体。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写了著名的《国学丛刊序》，开宗明义道：“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日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进而解释道：“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理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记之得其实，极其全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

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对于史学，亦有专论：“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王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文中更有概括：“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以大师的先见之明验诸今日，可谓句句真理，后生小子，无庸置喙。总括而言：1. 经史在中国原为文化命脉所系，现已成专门学科，不要期望过高过当或过低。2. 研究者要“知学”，勿轻言用。3. 位于学人与社会人之上者应助史学摆脱捧杀与抹杀的轮回。史学不废，则功能永存。

市场经济对史学研究 有正面促进作用

颜广文

(华南师大历史系)

今天，历史学家提起市场经济，往往侧重于谈其对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诸如有潜质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跳槽”、粗劣作品的泛滥、青年学生不愿报考史学专业等等，似乎“史学真的危机了”，甚至认为“史学危机源于市场经济”。这里暂且不谈史学是否真的危机，而只提我们不应只看到市场经

济对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或不适当地夸大其负面影响。我认为,市场经济对史学研究有正面影响,而且应是主流。

第一,市场经济有利于扩大读者群,而这正是史学繁荣的基础。建国以后到80年代以前,正是计划经济时代,作者与读者的沟通完全依赖于行政指导的中介,群众要看些什么史著,作者不大注意,史著的出版主要由长官意志决定。这就产生了二个问题:一是没什么好书卖,尤其是一些古籍巨著,都是80年代后,根据读者需要加以重印的,过去极难找到的书,今天却容易得以翻阅了。二是没有什么钱来买书,一个月花十元八块买书都得非常节俭才行。过去没有书卖、没有钱买书我们不叫史学危机,现在大量的史著涌现,也有庞大的读者群反而喊起了史学危机,这不似乎有点颠倒了吗?

第二,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较为富裕的生活也有利于史学家专心著述。其实,这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利于做学问的时期,政治稳定宽松、经济相对优裕,各种先进的高科技工具迅速进入家庭,只要我们潜心学问,就一定能创造出超越前人的史学“精品”来。

第三,市场经济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过去,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类的说法,讨论命题十分集中,也十分热烈,至今仍有不少同志十分怀念。事实上,却是贫乏的表现,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千姿百态的,史学研究当然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企业史、乡镇史、名人史、经济管理史、社会史会得到更迅速的发展,市场经济给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第四,市场经济有利于新人及优秀史著的出现。市场经济是要讲究经济效益的、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这就把竞争机制引入到史学研究中来,进行优胜劣汰。今天,大批新刊物、新出版社的涌现,应该说是有利于新人、新史著的问世。虽然,这些作品会良莠不一,有些还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出版的,但只要不出大的问题,我们也不必一味指责这种现象。我们还是应该相信读者是有足够判断力的,哪些书有生命力、哪些书没

有生命力,完全可以让读者通过历史去检验证明。

总的来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大趋势,作为上层建筑中一部分的史学研究只能是以积极的态度、进取的精神去迎接这种挑战。而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人却习惯于“往后看”,习惯于看消极面、负面多一些,并由此产生悲观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还有,历史研究往往要有较长期的史料积累,经验积累,有成就的史学家往往年龄偏大,对接受新事物态度不如年轻人,冷静有余,激情不足。如果我们能客观地分析社会环境和我们的群体现状,努力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相信是会走出一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史学研究道路来。

历史学与中国现代化

严钟奎

(暨南大学历史系)

对于任何一个力求振兴的民族和国家,发展历史学都是十分重要的。现今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些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由落后走向先进的振兴过程,而发展历史学都是他们实现振兴的经验之谈。

我们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缓慢发展的岁月,现在才认真地实行改革开放,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口号和计划。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有两件事是必须认真做好的,一是切实了解中国国情,一是踏踏实实借鉴一切成功经验。

了解中国国情,搞清楚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这无疑正是历史学能承担和应该承担的责任。客观地总结他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从中借鉴对我有用的经验,这也无疑是历史学能够承担和应该承担的责任。这里没有必要全面谈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而是强调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对历史学提出了要求。

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的现实,需要历

史学发挥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作用,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近年来历史学界的同行们却都在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历史学完全被冷落了”。高校历史系的教师们都知道,每年高考第一志愿报历史学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做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教师年年都是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历史学被冷落了,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正如现在常听人们说的:“这年头干什么不行?干么要去学历史?!”

按理说,现代化发展需要历史学,但实际上历史学却是被真正的冷落了,这个矛盾究竟该怎样认识呢?我想,这既要从现实大背景去认识,也要从历史学自身的过去和现状去认识,任何慨叹和抱怨都是毫无意义的。

从现实大背景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整个文化不免遭到普遍的冷落,而历史学的被冷落正是文化普遍遭冷落一个缩影。现在,在一些报刊和其他传媒体的大力渲染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已经只剩下“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酒文化”、“性文化”之类的东西了。在这种大背景下,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遭到冷落,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至少历史学没法教会人们如何赚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当然,历史学的被冷落确实也有自身的原因,从过去的历史和目前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史学研究长期脱离现实,越来越成了只是史学家们的事,社会大众也就越来越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第二,几十年为政治服务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历史学的名声,在人们看来,历史学不过是一种无原则的游戏;第三,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科都努力跟上时代的脉搏,加紧自身的改革,但是历史学基本上还是固步自封,基本上还是老样子走自己的路。因此,如果历史学依然我行我素,那么即使现实大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的文化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历史学也还可能逃不脱被冷落的命运。

历史学要发挥自身的功能,要在中国现

代化事业中显示自身的作用和力量,根本的出路只有改革和改造。这决不是赶潮流,决不是借着改革的大旗装扮自己保护自己。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要不断发展不断深化,各种知识门类的各个学科也总要跟着发展变化,没有什么是可以一成不变的。历史学自身的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学的发展总是带着重重的时代烙印的,它总是和时代的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古今中外一概都是如此。

史学研究也是一个审美过程

陈春声

(中山大学历史系)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谈到他研究学问的缘由:“我对于自然之美和人为之美没有一种不爱好,我的工作跟着我的兴味走,我的兴味又跟着我所受的美感走。我所以特别受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接着他又谈到审美与学问的功用之关系:“并不是说凡是我所欣赏的都要在里边得到实效,我很知道挟了受用的心思而作的欣赏决不能成为真的欣赏。我的意思,不过要借此说明不求实效的结果自能酝酿出一些成绩来,这些成绩便不是在实效的目标之下所能得到的而已。所以我们若要有伟大精美的创造,必须任着作者随了自己的嗜欲和兴会而发展,愈不求实效愈可得着料想不到的实效。”顾先生说这番话时仅33岁,已透彻地参悟到学问、审美与实效关系的真谛。

学术功能的发生与表达,自然是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象历史学这样本身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学科,不言而喻有其存在的理由,也自然有其有益于社会之处。学科功能问题之提出,与其说是社会环境的压力,不如说是社会急速转变时期学术从业者集团自信危机的结果。问题在

于,即使我们在这里壮怀激烈地为自己的职业辩护,列举数十条、上百条历史学的“功能”,都难免落于俗套,言不及义。因为,学术的功能,其最精妙之处只是一种“美感”,而美感其实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如果能抛弃实用之心,真正把我们从事的学科视为人类审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的活动的一部分,我们的信心危机自然可以平复。愈多的史学从业者真正赋予自己的职业、自己的著作和自己的思想以富有人文精神之美,这一学科的功能也就自然能被愈多的人感受和理解。

物理学家可以耗资逾亿研究某一基本粒子的轨迹,生命学家可以毕生考察某一细小的昆虫,天文学家可以经年累月观测距我们数亿光年的河外星系,他们似乎从未因自己的课题远离日常生活而感到不安,也很少听到他们专门讨论自己的学科“有用”还是“无用”。除了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在改变人类生活方面的巨大成就给他们以足够的自信外,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更重要的是由于第一流的科学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信仰某种“科学宗教”,即他们相信已知和未知的世界都是有序的,而力求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构成万事万物的法则,并从中领略到某种“科学美”。这种境界也许亦是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所应该追求的。

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

陈华新
(广州师院历史系)

历史学是以过去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从表面看来,历史学是一门远离现实生活的学科。实际上,历史学的传统功能,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司马迁撰《史记》,一直写到汉武帝,就是贴近当时现实生活的明证。他写《史记》的目的,就是要总结过去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为当时西汉现实生活服务,即为巩固西汉中央集权的统治服务。北

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宣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读者“自择其善恶得失”,达到以史为现实生活借鉴的目的。这说明古人已懂得历史学的功能,在于为现实生活服务。

物换星移,到了清末,梁启超进一步提出历史要“为国民而作”,“为经世之用”,能“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说明梁启超更深知历史学的功能,在于为现实生活服务。

近年来在日本兴起一门叫做“帝王学”,实际上是通过总结历史上治国理政的得失,以“帝王学的智慧”,启迪“现代人领导的艺术”,成为一门《宏观管理学》的新学科。他们把“帝王学”,提高到“现代经典”的高度去研究,把“帝王的智慧”,“领导的艺术”,“管理的学问”这三个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巧妙的撮合在一起,这是史学的现代功能的新发现,也是史学与现代生活关系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世界上一些发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甚至不惜花巨资以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根据国情研究提出内政外交发展战略和不同时期的施政方针。国情分为自然国情(包括自然位置、疆域、面积、地形、气候、物产、资源等)和人文国情(包括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人文国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总结出来的。这说明历史研究在国情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世界上一些发达的国家,大都重视历史的研究;只有不发达的国家,或者发展中的国家,才不重视历史研究,或者顾不上历史研究。这种状况不改变,将使东西方的距离拉得更大。

至于历史研究对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其功能就更大了。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优秀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都离不开历史。两百多年前,英国占领印度后,不让印度人学习印度的历史。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不让台湾人学习中国史。这说明不管是西方殖民者和东方侵略者,他们也深知史学的爱国功能,深怕被占领的人民

学习本国历史,就会起来推翻他们的殖民统治。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什么特别强,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外,其在学术上有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历代王朝更替,都很重视修史。像中国这样保存《二十五史》,还有数以万计的省、市、县地方志和杂史,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

史学的学术规范与批评

贺跃夫

(中山大学历史系)

自19世纪兰克学派兴起以来,历史学已成为一门专业化的学科,历史研究者也成为专业化的职业群体。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一样,是人类认识自身与环境的知识工具之一,有其独特的学术规范与原则,历史学家也有其独立的学术人格。他们对其研究客体——以往社会的观察,是保持一定的知识学距离的审视,通常要避免个人情感与价值的介入,依据史学研究的规范与原则来言述其知识性认知。这是作为学科化的历史学区别于传统文人式清议或近代意识形态宣传的分界线。这对历史学的专业研究者本应是不成问题的常识。

然而,由于我国传统史学研究对象以政治为主(历史大体上就是昨天的政治),“资治”史学的悠久传统以及现代史学形成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与政治、历史学的言述形式与政治宣传或批判总是难舍难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国现代的史学尤如依附在政治大树上的寄生藤,既曾依赖大树的庇荫得以成长发展,同时也因国内的政治斗争纷乱而走向迷途。现代“革命史学”在30、40年代的兴起与60、70年代的影射史学或儒法斗争史的泛滥成灾,即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例证。80年代初,史学界痛定思痛,拨乱反正,“反思

史学”又一度兴盛。诸如探讨当代专制主义的历史根源之类的课题,注重于为现实的政治目标服务,试图从历史反思中来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激于义愤的社会批判精神非但不能促进历史学科的发展,而且离开了史学的基本规范与原则,以及非学术性的言述形式,往往反倒掩盖了史学的知识认知价值,并多少促长了非规范化的、急功近利以及文人式清议的轻率学风。因而一旦其现实政治功能淡化或失去,就必然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一些海外学者批评我国的史学论著,尤其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抽去其现实政治需要或意识形态宣传的支撑,便只剩下一堆空泛的议论。80年代中以来中国“史学危机”的出现,尽管有多方面的原因与背景,但历史学长久以来没有确立其独立的专业化学科地位与学术规范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优秀的史学研究成果正在涌现。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状况与水准,有待于全体从业者的共同努力。其中建立严谨的学术规范与务实的良好学风,尤有必要。借鉴海外人文学科通行的学术批评与评议制度,建立起正常的史学批评机制,相信将有助于加强同业内部的相互监督与批评,提高史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水准。在这方面,无论是发表于学术刊物的书评或辩论文章,还是学术研讨会的评议,应当提倡依据学术规范与准则的直接了当的史学批评,从而使我们史学著作的书评从广告式文字变为同行专家的认真评议;使纪念性和社交性的学术讨论会,变为真正研讨问题的学术研讨活动。

史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增进

刘汉东

(广州师院历史系)

历史学的研究,对民族和国家的兴与衰

关系极大,所谓“盛世修史”。反之,不修史则难称为盛世。这主要是史学和史学研究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增进,不仅是史学的主要功能之一,也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庸讳言,史学研究近年来为社会所冷淡,似乎经济越发展,“史学危机”的呼声便越大。产生这种现象,原因很简单。一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社会对于史学研究的需求有一个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视当时大环境、大气候、大氛围而确定;二是一段时间里史学研究的功能被人为夸大,并渗入其他因素,使史学的地位过分抬高,因而产生一种虚幻感觉,从而与社会对于史学的需求之间产生了反差;三是多年来片面培养,致使学习史学专业、从事史学工作、研究史学的各层次人员增多,社会需求量不能消化这么大的数量,一些从业人员必然会产生危机感。

不过,在正常情况下所从事的史学研究,不仅不是一种危机,而且是对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增进。

首先,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他们从文化学和人类本性的角度,都是必须牢记和加以遗传的,而弘扬更是重要的任务,绝对不能数典忘祖。史学研究就要如实地将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重现出来,使社会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今天的同时,也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

其次,几乎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过兴盛与衰落的情形,有过光荣,有过梦想,也有过耻辱,有过绝望。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强弱兴衰交替出现,特别是近现代,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入侵,给我们民族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史学研究自然会对民族文化的延续、弘扬和增进产生作用,同时又能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更为勤奋和拼搏,体现自我价值,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发光发热。

第三,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他古文明都被取代或中断,不能继续下来,中华文明却一直绵亘至今日,并且仍有发展前途,生命力十分旺盛。因而,

史学研究可以在弘扬和增进民族文化的前提下,继续认真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规律、运转机制、结构与方式、长盛不衰的原因等等,使史学研究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再上层楼。

当然,史学的功能很难一二句话就加以界定,特别是与现实的关系往往有不少中间环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民族和国家绝对不能缺少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并且一定要加以弘扬和增进。

从梁方仲教授的学术贡献看史学的功能

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系)

梁方仲先生是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在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蜚声国内外。梁方仲先生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关切。他本来学的是经济学,1952年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前,他也一直在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机构。但他选择了明代财政经济史作为研究园地,是由于他很早就认识到,要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必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入手,而田赋制度是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关键,近代田赋制度是从明代一条鞭法开始的,所以他希望能从明代一条鞭法切入,形成对中国近代经济诸问题具有历史深度的认识。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法逃避对中国社会问题及发展路向的关怀,这种关怀往往成为他们献身于各种学问的精神源泉。但许多学者都深知这种关怀必须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之上。梁方仲先生虽然是从关心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出发,投入明代赋税制度史研究,但他的研究绝不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坚持了学术研究的求实和求真的精神。他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着力最多的是广泛收集各种资料,究明赋役制度演

变的种种细节。如一条鞭法赋役合并的种种方法和不同的合并程度,如一条鞭法的名称变化和实际推行的种种差别,如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十年轮役”的具体办法……等等,他都根据大量的资料,仔细校勘考订,弄清实际执行的情形。正是这些曾被人指责为繁琐考据的研究,奠定了他的研究的坚实基础。

由于梁方仲先生是在探明明代赋役制度演变的基本环节的基础上,揭明代赋役制度改革的实际内容和基本趋势,他对明代社会经济演变的解释也就能够发人所未发。与许多只是根据一些表面的资料作出的浮泛解释不同,梁方仲先生很早就指出了一条鞭法“代表了一般社会经济状况的各个方面”,“形成了近代以至现代田赋制度的主要结构”,并且没有简单地理解赋役改革中“摊丁入地”和折银的趋势,而是将这些表象与明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结合起来,他关于“役中有赋,赋中有役”的背景,关于银子流通范围分为两个世界,关于折银对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加强的影响,关于商业经济一马当先,畸形发展等等见解,至今仍没有被许多研究同类课题的学者所注意,而这些关于历史问题的见解,对于从深层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规律,以至以于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无疑都是相当深刻的。

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显示了历史研究往往可以发掘出一些在现代发展中不易被发现的深层次问题,而这种研究又往往必须建立在纯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以及人类未来发展的关怀的角度,历史学家需要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却不应追求“经世致用”,学问就是学问,无需问研究某一问题是否有用,只需努力求得对所研究问题的真切的了解。作为一个学者,至少应该具有这样的信念:一切学问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只要是学问,只有深浅高低之分,没有有用无用之别,动摇了这一信念,也就无法理解学问之真谛!

历史学不要放弃研究现实

朱卫斌

(中山大学历史系)

这次史学功能理论研讨会的第二个问题叫做“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我觉得这种提法的隐意就是历史学不应该研究现实。因为,所谓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无非是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或是反过来探讨现实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这种关系实际上等于把现实排除在史学研究领域之外。事实上,传统史学把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时间向度上限定为过去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它不仅误解了历史一词的确切含义,也贬低了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与目的。我认为,历史学不应仅仅研究过去,还应研究现实。

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是说,人类社会在时间中的演进历程即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而言,广义的历史时间应该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部分。实际上,任何历史时间都是相对而言的。过去相对于现在而言,它才成其为过去,现在是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即是说,现在不是绝对的,它永远是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同样,未来不管它看起来多么遥远,它定将变为现在,并最终成为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应该永远把揭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任务,而不应仅局限于研究现在以前的人类历史。但是,由于每个历史时代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环节,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只能研究已经发生的事,并进而对未来作出预测。

强调历史学应该研究现实并不等于要历史学研究现在。实际上,现实与现在是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是一个在时间量度上趋于零的抽象概念,而现实则是指现存的人类社会的一切,在时间上是指现在以

前的较近的一段过去。至于它的时间跨度究竟有多长,则没有确数(当代史的研究应是史学对现实的研究),现实社会中,有些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已告一段落,完全可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有些事物、现象虽仍在发展变化中,但这一过程中已完成的部分,已发生的部分也完全可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至于这一过程中尚未完成的部分,我们应注意其发展变化,搜集有关资料,一旦它的发展变化告一段落,即可着手研究。这样,历史学将能够更全面、更完整地把握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

知识文化:史学的本质属性

林有能

(广东省社科联)

历史学发展到今天,愿学者寥寥,跳槽者纷纷,“危机说”沸沸扬扬……所有这些汇成一个巨大的问号——史学到底有用抑或无用?其功能怎样定性?这是一道任何人都无法取得100分的难题。尽管有些人对此无奈叹息,有些人则不屑一顾,但现实摆在面前,我们就应勇于面对。

这种局面的形成,无疑与我们长期以来对史学功能的认识的偏差有直接的关系。远的不说,仅从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从未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的位置,政治风云笼罩整个国度,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斗争转。这样,与现实有着更直接联系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备受冷落,而与现实联系不那么直接的历史学,则因政治的需要而雄居显学之位,史学的功能被人为地夸大和抬高。史学的繁荣蔚然可观。但这种地位和繁荣是对史学本身属性的背离,是人为造成的不正常现象。及至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一切都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上而下,人们急需的是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经济建设领域中的问题的理

论,而史学于此显然难有大的作为。于是,其昔日的显学位置只得无奈地让给经济学等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它被冷落、出现“危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实际上,这是变化了的现实把人们对史学功能的体认从偏激拉回到平常,还史学自身在整个社会中所应有的位置。所谓“危机”实为人们在时势强烈反差中造成的一种错觉。这对严谨的史学研究来说,应是好事一桩,因为起码那些肆意歪曲历史来为政治服务的不学之徒和那些朝秦暮楚的风派人物虽不会匿迹,也会有所收敛,历史研究的环境起码会净化一些。

话说回来,怎样定性史学功能才恰如其份?史学在整个社会中占什么样的地位才恰当?我的理解是:史学作为社会科学体系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专门的知识文化。明确这一点,我觉得足够了。因为既然是一种知识文化,它就自然会对社会有用。这种有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人的能力体现出来。对一般大众来说,普及历史知识显然有助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对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来说,有较深的史学功底,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他就能对事物、对某些问题乃至整个社会有较深刻的见解,对解决问题往往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领导决策者来说,有丰厚的历史知识,就会有利于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有助于提高管理能力,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无需对史学的功能和作用做过分的褒扬或贬斥,以平常的心态待之,对过去不正常的现象和今天的“危机”也就会处之坦然了。

路是人走出来的

凌峰

(广东省社科联)

史学向何处去?这是当前不少史学界同仁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就象人生会面临许多选择一样,史学,做为—门人文科学,随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它的研究内容、形式、方向与功能,也必然会面临诸多的选择。因为变化与发展是宇宙间的永恒规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它。

把变化看做一种危机,固然未尝不可。但危机是不是一定就是坏事呢?当然,既然叫危机,就是发展遇到了困难,功能受到了损害,生存受到了威胁,这当然不是好事。但我们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有危机才有转机,有转机才有突破,才有发展与更新。鲁迅先生在谈到走人生长途时最易遇到的两大难关时说过:“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象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不知道是否世上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只有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有走出一条新路的可能。我想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面对歧路与穷途,我们为何不勇敢地去走出一条新路来呢?

况且,过去几十年史学所走过的路并不那么十全十美,是不是真的那么令我们流连忘返?诚然,那段日子,史学有过十分辉煌的岁月;但我们都不会否认,在过去极左思潮的干扰下,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的“婢女”,成了打人、整人的棍子和帽子;史

学的某些研究领域,也局限在狭隘的、空泛的、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课题里,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东方的社会性质”,及一些历史分期的无休无止的争论,等等。在现今社会发生了较大的转型以后,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看得更清楚,认识得更透彻了。借这个机会,史学应该,而且可以克服以往的一些弊端,更健康地发展。

史学要历久长新,要不被现实抛弃,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其研究一定要关注国计民生,贴近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社会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史学的研究领域也是十分宽广的,根本没必要一条道走到黑。司马迁的《史记》不但写了较高深的礼、乐、律、历,诸子百家的学说,远古传说,帝王将相,三皇五帝;也写了许多处于社会下层的游侠、滑稽、货殖、刺客等各行各业的人们,向后人展示了一幅十分丰富的、多层次的社会画卷。而生活在比司马迁的时代更丰富、更多样化的今天的史学研究者,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研究领域限制在那样狭隘的范围内呢?

这样说并不否定那些为保留民族文化遗产而从事收集、整理、研究较偏孤、深邃的史学领域的人们。我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研究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每一个研究者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寻一条似乎可以走的路走下去,只要我们努力,是一定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的。

(本专栏责任编辑:凌 峰)

希特勒进攻英法的决策与张伯伦的对策

1933年在德国上台执政的民族社会党(纳粹党)党魁阿道夫·希特勒,在经过四年多的准备以后,即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目的是征服欧洲,进而征服世界。方法是打一系列闪电战,即迅速打垮一个对象,搜刮其资源以增强实力,然后攻打下一个对象。顺序是先打西面的英法,再打东面的苏联。

1937年6月24日的绝密军令已说到要准备和英法打仗,要先消除捷克斯洛伐克对后方的威胁。①

11月5日,希特勒在只有军事首脑及外交部长参加的会上说,德国必须用武力在欧洲夺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德国的战略必须考虑到两个可恨的敌国,即英国和法国,它们不会容许在欧洲的中心有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巨人。进攻英法,必先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②所谓“生存空间”,希特勒在此时以前已说过,要在“俄国及其周边的属国”夺取,要“在东方征服土地并使其无情地德意志化”。③因此,西攻英法,又是为将来的东攻苏联解除后顾之忧。在英国被逐出大陆之前,不可能有反苏的“十字军”。④

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接着就把侵略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在准备侵捷时,希特勒已下令全盘修改现行的造舰计划,要大规模扩充海军,因为他“必须把英国永远打入敌人之列”。⑤在英法德意四国逼迫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区割给德国的慕尼黑会议期间(9月29至30日),希特勒又对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说: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与英法一战,⑥德意与英法之战不可避免。⑦拿捷领土与希特勒做交易的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自吹,他换来了“我们时代的和平”,⑧但事态却是朝着与此恰恰相反的方向发展。

慕尼黑会议后才九天,希特勒就公开抨击英国,说它不该干预德国的行动,今后德国人不会再容忍这种家长式的干预。⑨11月10日,希特勒召集四百多新闻界的人训话,说他几年来不得不只谈和平,这是鼓动德国公众来追随他的唯一办法;现在却必须说服他们,有些东西是必须用武力来争取

的。^⑩他的宣传机器便转而大肆鼓吹德国需要“空间”，要把英国视为阻碍德国取得财富、权力和统治权的敌人。1939年2月10日，希特勒又告诫他的高级将领们，必须绝对服从，以身许国，因为他将带领这个国家与英法作战。^⑪进入1939年后，德国走向战争步伐加快了。

但在进攻英法之前，还得做三项准备工作：（一）吞并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二）使波兰服属于德国，（三）与意大利及日本结成军事同盟。

1938年10月21日，即德国夺得捷领土苏台德区一个多月后，希特勒就下令要摧毁捷剩余部分，倘若它的政策变为敌视德国。^⑫1939年3月15日，德国终于出兵占领了这个国家。捷政府并没有实行“敌视德国”的政策，相反，慕尼黑会议以后，捷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已处于德国的支配之下。其所以要完全吞并，显然是为了攫取军事物资和战略基地，以便侵略下一个目标。3月底英国外交部写的一份备忘录揭示了德国的这种意图，料定下一个目标就应该是波兰或罗马尼亚，并说，“一旦得逞，进攻西方的道路就铺平了。”^⑬

果然，下一个就轮到了波兰。最初希特勒还不是定要用武力征服波兰，而是想把它变成一个附庸国。早在1938年10月24日，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已向波兰驻德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提出归还但泽；^⑭允许德国修筑享有治外法权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穿过“波兰走廊”，^⑮至东普鲁士；波兰须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⑯头两条是旨在控制波兰的经济命脉，第三条则是要波兰在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听命于德国，割断波兰与法国自1922年结成的同盟关系，使波兰在德国与英法决斗时不致于为患德国的后方。波兰拒绝了这些要求。但直到1939年春初，希特勒仍未放弃通过外交压力把波兰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希望。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以后，3月21日，里宾特洛甫再向利普斯基提出上述要求，语气转硬，而且还暗示，如果波兰不屈服，德国将会与苏联合作，灭掉波兰国家，并敦促波兰外长约

瑟夫·贝克前来同希特勒深谈两国的关系。^⑰叫贝克来柏林，很可能就是要象以前对待奥、捷领导人那样，胁迫贝克在亡国条约上签字。这次的要求，波兰也拒绝了。

此时希特勒已担心波兰不会服帖，准备把它摧毁，把德国的疆界推移到波兰中部，于是下令制订入侵波兰的计划（代号为“白色计划”）；但又说，计划要到最近的将来政治条件有利时才执行。^⑱他还要看看其他国家对3月15日侵捷事件的反应，尤其是要看看英国的动向。

上述希特勒以英国为主要敌人的言行，英国情报部门都曾报告过政府，可是政府领导人均不予理睬。相反，张伯伦拿着他在慕尼黑与希特勒订的一纸协议（涉及两国的问题都应采取协商的方法来处理），^⑲以为此后正是推行他的绥靖政策——以牺牲别国为代价求得同侵略者妥协的政策的最佳时机，可以同希特勒直接谈判，促成欧洲问题的全面解决。张伯伦觉得德国的经济较弱，有希望与之建立友好的经济关系，作为政治上达成谅解的先导。他准备帮助德国缓解外汇短缺的困难，为德国货降低英国本土及殖民地的关税，考虑归还德国以前的殖民地，以换取德国取消出口补贴，放松对东南欧经济的控制，进而限制军备，甚至与英国缔结反苏同盟。1938年10月底，英国内政大臣塞缪尔·霍尔告诉德国大使：英法德意四强和解之后，共同防御苏联的进犯，是可以想象的。^⑳其实，当时英德之间，经济上、政治上的合作都是不可想象的。上述张伯伦的那些想法的大前提是，德国的政策目标不是统治欧洲，而是只求把德意志族居住的地区统一在一个国家里。^㉑但希特勒的目标却恰恰是统治欧洲，并且正在准备先攻英法。为了备战和在战时能抵制英法的封锁，德国才自1936年起实行所谓四年计划，力求自给自足，不能自给的则用补贴出口、控制东南欧经济等措施来换取必须的战争物资。这一切与张伯伦的那些设想全是背道而驰。无怪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评道：“事情发展得很快，但现在都不是朝着英德和睦的方向发展。”^㉒诚然，1938年

10月和11月,英德双方的工业联合会都在会谈,并订于次年3月15日由英国外贸部的首脑前往柏林进行正式谈判。^{②③}其所以有这些接触,只是因为德国想打开英国的市场,以满足其战备的需要。张伯伦却据此看好英德合作的前景。

这样自我陶醉只是使他对希特勒的侵略行动丧失警惕。在先有消息说德国将入侵乌克兰,他相信,而且不以为怪。后来又有消息说希特勒断定此刻是给西方国家致命打击的最好时机,他却不信。1939年3月11日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贾德干报告说,希特勒即将占领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他也置若罔闻。相反,他还建议霍尔在14日向选民发表的演说中这样说:大国间的合作,将给欧洲带来“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②④}第二天,德军开进了捷京布拉格。

英法在1938年9月逼迫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区割给德国后曾保证过捷其余领土的安全,张伯伦对德国并捷的第一个反应却是赖掉这个保证。由于德国侵捷的步骤是先胁迫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张伯伦便据此在内阁里说,捷国家既已从内部解体,英国对它的保证也就失去意义了。接着他又对议会重复这话,并宣称他在慕尼黑施行的方针是正确的,不应因侵捷事件而背离这个方针。^{②⑤}

张伯伦硬是不肯改变他的方针,可是英国的輿情大变了。希特勒曾对张伯伦表示,夺取德意志族居住的苏台德区是他最后的领土要求,^{②⑥}但现在他又侵占了新的领土,而且并不是德意志族居住之地;他曾向张伯伦承诺,涉及两国的问题要用协商的方法处理,如今却悍然出兵占领一个英国曾保证其安全的国家。英政府首席外交顾问罗伯特·范西塔特说,这是当着全世界的面“在我们尴尬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②⑦}英国举国上下无不感到羞耻和愤慨,有些原来拥护张伯伦的议员和阁僚也不再支持他。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写道:议会里许多人的看法是,张伯伦要么下台,要么就得完全改变他的政策。^{②⑧}

在这种情况下,张伯伦才不得不换一换

腔调,在3月17日的演说中谴责希特勒背信弃义,声称要联合有关国家抵抗侵略,表示关心东欧和东南欧的安危;但仍为其绥靖政策辩护,并声明不准备承担新的义务。^{②⑨}这种新老参半的调子已经预示,为了安抚輿情,他可能会采取一些新的策略,但不会放弃他的绥靖政策。

首先,为了挽救英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威信,必须做点什么来显示抵抗侵略的意愿。恰在这个时候,3月17日,罗马尼亚公使通知英国外交部,德国实际上已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控制它的经济。虽然第二天英国的秘密情报局、驻罗公使以及罗外长都否认此事,那天的内阁会议仍决定吁请一些可能会受到德国威胁的国家与英国一起发表一篇宣言,声明将抵抗德国在东南欧的侵略行动,并于20日将宣言稿送往法、波、苏三国政府,请求同意。稿中写道:鉴于威胁任何欧洲国家政治独立的行动都可能影响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四国应立即协商,共拟联合抵抗此种行动的措施。^{③⑩}只提“政治独立”,是为在领土问题上向德国让步留余地;只说“协商”,是表示不承担义务;关于“措施”的话,是接受法国大使的意见后才加上去的;内阁作决议时说的是“东南欧国家”,宣言稿中改为“欧洲国家”,是要使内容比较空泛。总之,这仅仅是一篇暂时联合起来表示意图的宣言。连外交大臣爱德华·哈里法克斯也承认,它是起不到“警告”德国的作用的。^{③⑪}对签署这个宣言,苏联的答复是,有波兰参加,它才参加;波兰则暗示,有苏联参加,它就不参加。矛盾无法解决。发宣言的事是流产了,但是,直到8月德国入侵波兰前夕,张伯伦所愿做的,始终只限于发一个实质与此相似的宣言。

罗马尼亚接到最后通牒之事被否认了,但德波关系日益紧张。3月21日,德国再逼波兰接受其要求,22日,德国占领立陶宛的梅梅尔港,23日,德国把斯洛伐克变为它的“被保护国”,同日,德国与罗马尼亚签订贸易协定。波兰陷入三面受敌的境地。接着又盛传德国将进占但泽,波兰遂实行部分动员,向但泽附近调集军队,并向英国求助。

英国公众和议会对此极为关切,对政府迄未有所动作极为不满。政府也担心德国会突袭波兰,又怕波兰会在德国的外交压力下投降,而东南欧各国也会跟着倒向德国。必须立即行动。3月27日,英国政府曾吁请波兰援助罗马尼亚并与英法互助,即是说,已向波兰提出有条件的保证。29日,英国《新闻记事报》有个记者告诉哈里法克斯,他有确凿情报,德国即将入侵波兰。哈里法克斯便抓住这个消息,提议立刻把对波兰的有条件的保证改为单方面的、无条件的保证。这样既可以制止德国进兵,也可以制止波兰投降。3月31日,张伯伦在议会宣布:若有任何“显然危及波兰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又认为必须以全国的武装力量来抵抗,英国政府就自认为有义务竭力支援波兰。并说,法国政府已授权给他声明,法国也站在与英国同样的立场。^{③②}

这个声明,算是承担了义务,但在发表声明的前后张伯伦都说过,英国保证的只是波兰的独立而不是它的领土完整;而且什么样的行动才算是“显然危及波兰的独立”,要由英国来判断。^{③③}即是说,是否履行义务,要由英国来决定;即使履行,也不保证波兰的现存疆界,“不鼓励波兰为但泽而战”。^{③④}波兰外长贝克接受了这个保证,并于4月3日访英,与英政府达成协议,把英单方保证改为英波互保,即英国受到德国进攻时波兰亦给予援助。但双方都不急于把这个协议变成正式的同盟条约,以免激怒希特勒。英国希望波兰与德国谈判解决但泽问题;波兰也只是想用此保证来加强它与德国谈判时的地位,以为这样可以导致某种妥协。总之,单保也好,互保也好,依然只是一个表示意图的声明。

这样的保证决不可能制止侵略。相反,它只是断绝了希特勒压服波兰的希望,坚定了他发动战争的决心。^{③⑤}希特勒一听到英国对波兰作出保证后,立即下令作好进攻波兰的准备,要在自9月1日起的任何时候行动。^{③⑥}他断定,仗着英法的保证,波兰今后不会在外交压力下屈服;制服波兰既是进攻英法的准备步骤,要避免两线作战,必须先

用武力灭掉这个国家。即是说,有进攻波兰的必要。他看透了英国并没有履行保证的决心和能力:英国没有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苏联是唯一能够直接援助波兰的大国,而张伯伦发表的对波兰提出保证的声明却是把苏联排斥在外。希特勒在后来的讲话中提到,他知道迟早将会与波兰冲突,但他想先打西方,然后才打东方(指波兰),为此他想与波兰建立一种他“可以接受的关系”;可是英国的干涉打乱了他的这种计划,所以他决定先打波兰;英国不可能援助波兰,英国没有真正扩军,只是宣传而已。^{③⑦}即是说,也有先拿下波兰的可能。

为了把可能变为现实,在8月底以前这段期间,希特勒用尽了一切办法来孤立波兰。4月5日,他命令外交部门断绝与波兰的一切谈判。宣传部门则大肆夸耀德军的强大和西面防线的坚固,意在使英法不敢声援波兰。又在但泽问题上大做文章,斥责波兰寸步不让。还收买英法的一些报纸叫喊不要为但泽而战。4月28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主题是宣布废除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和1935年的德英海军条约,但他却用大部分时间讲他如何向波兰提出关于但泽和走廊的要求以及交换条件,并说,所谓德国有进攻波兰之意,只不过是外国报刊在捏造。^{③⑧}他所关心的,似乎仍是但泽问题的解决。他在稍后的讲话中承认,但泽已不是争执之题。^{③⑨}其所以拿但泽来作宣传,是因为英国决策层总以为德国要解决的是民族问题,有人甚至主张干脆让但泽并入德国,强调但泽,正可以离间波兰和英法的关系。也就是在4月初,德国开始向苏联表示愿意改善关系。希特勒在4月28日的演说中一改常例,不再谩骂共产主义。自此时起,德国报刊亦停止攻击苏联。5月20日,德国大使探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可否恢复两国间曾经进行而又中断了的贸易谈判。莫洛托夫以友好的态度答道:须先建立必要的“政治基础”,谈判才能恢复。^{④①}德国方面便据此推测,似有与苏联签订经济政治协定的可能。5月22日,德国与意大利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这个

所谓“钢铁条约”规定，一旦爆发战争，双方即以其全部军事力量互相支援。德国是想用意大利的军事力量牵制英法。以上一系列措施，都是为进攻波兰创造政治条件。

得知莫洛托夫的答言和签订德意条约之后，希特勒立即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告诉他的将领们：一有机会就进攻波兰。要看机会，就是要看上述孤立波兰的措施的执行结果如何。

3月15日事件以后，针对德国将侵略对象孤立起来逐个吃掉的做法，英国的许多议员和阁员中，形成三条意见：（一）对受德国威胁的国家提供安全保证，（二）与这些国家联成足以威慑德国的阵线，（三）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张伯伦对此非常反感，但又不得不迁就，于是便在执行中把这三件事都弄成有名无实，然后找机会继续推行他的绥靖政策。

对波保证，实为空谈，已如上述。至于威慑，张伯伦也有他自己的做法。他曾承认，对波保证只是“应急措施”，^{④①}但后来他却把波兰视为“局势的关键”，^{④②}以为同波兰联合，就可以建成一条东方战线，使希特勒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就足以威逼希特勒打消从事军事冒险念头，转而与英法波谈判。当时议会里的反对党（工党和自由党）以及参谋部都认为，光靠波兰，不可能建成一条坚固、有效的东方战线。保守党内部反对绥靖政策的老将温斯顿·丘吉尔于5月4日发表文章称：没有苏联参加，就无法保持一条东线，无法防止战争。^{④③}自由党元老、一战期间的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听到张伯伦要用英法和波兰这两线威慑希特勒时，不禁哑然失笑。他告诉张伯伦，波兰在军事、经济、政治上都很虚弱，并无东线可言。^{④④}参谋部也断定，若无苏联援助，波兰在开战之初就会垮台。但是，张伯伦不是从战略来考虑，不是要建立战略上的坚实联盟来打败希特勒，而是只想拼凑外交上的暂时结合来吓退希特勒。^{④⑤}他以为，只要亮出两条战线，希特勒就会感到除付出不值得付出的重大代价而外，无法取胜，就会退而与英法谋妥协。^{④⑥}这就是张伯伦的策略。他就是想用这种新

的策略来推行旧的政策。

他这样设想，是假定德国还没有作好战备，此刻仍是在追求有限的目标，不会冒得不偿失的风险。这个判断，完全错误。意大利外长加里亚佐·齐亚诺曾问德外长里宾特洛甫：“你们要的是但泽吗？”后者答：“不，我们要的比这多得多。我们要战争。”^{④⑦}这话是在8月10日说的，但“要战争”的决策是在4、5月间就已作出了的。希特勒在5月23日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波兰问题与德国同英法的战争不可分；最好是单打波兰，但如果英法前来干涉，就同时打英法；英国总认为德国的扩张会削弱它，因此英国是必须击败的敌国；与英国之战将是生死斗争，“我们必须破釜沉舟”。^{④⑧}张伯伦估计德国的目标有限；希特勒却不仅要但泽，要波兰，而且要彻底制服英法。张伯伦料想德国不会冒得不偿失的风险；希特勒却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威慑”从何说起！张伯伦的政策焉得不以失败告终！

如上所述，主张抗德的人都把“保证”和“威慑”归结到“联苏”这一点上，看到了没有苏联参加，保证就会落空，威慑就会失效。可是，张伯伦却反对同苏联结盟。他一再解释：苏联只会借援助之名行扩张之实；即使它真想援其邻国，它的军事力量也不能作进攻战；即使能作，那些邻国也害怕苏军进入它们的国土。与苏结盟，在军事上，帮助不大；在政治上，反而会损害英国同苏联邻国的关系。^{④⑨}但这些说法都不是反对联苏的根本原因。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疑惧苏联甚于害怕德国，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只是给张伯伦提供一个反对联苏的借口。英国是可以对波兰施加影响而使其改变态度的。反对同苏联结盟的根本原因在于张伯伦不相信希特勒要打大战。3月20日，他直言不讳，他不认为当前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准备对付不可避免战争。^{⑤①}既然如此，就无须建立强固的东线，因而也就无须联合苏联。4月19日他又重申没有缔结英法苏同盟的必要。^{⑤②}这样的同盟只会加重德国的敌意，^{⑤③}也就是说，会断掉他找希特勒求得妥协之路。

英波互保以后,英国议会里要求联苏的呼声更高,同时又有消息说法国正谋求与苏结盟而把英国拖进去。为应付这种局面,英国政府便抢先一步,开始与苏联谈判。谈判不是为了英苏结盟,而是为了防止法苏结盟。4月15日,英政府建议苏联发一声明:邻国被攻击时,“假如希望”苏联援助,苏联就将给予援助,并将以被视为最适当的方式提供。这么空洞的声明,还要加上一些限制条件,无非是要由西方来掌握和与战的决定权。48小时以后,4月17日,苏联就交来答复,提议缔结正式的英法苏同盟条约,实以军事协定:一国受到攻击,或因援助波罗的海至黑海间的邻苏国家而卷入战争,其他两国即给予援助,包括军事援助。^③苏联是真想建立一条能够遏制德国的战线的。德苏一直对立,3月22日德国又占了立陶宛的梅梅尔港,有进占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之势。英国对波兰提供保证,使苏联更加怀疑:英国会不会象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在最后关头赖掉这种保证而让苏联去单独对付德国,或者引导德国从另一条路(波罗的海沿岸国)去入侵苏联?为防止战争计,为自身安全计,苏联都希望同英法订立明确而具体的盟约。可是这种希望正好与上述张伯伦的想法不相容。张伯伦只是想凑成外交上的暂时联合去“威慑”希特勒,不是建立真正的东线去打大战,更不是要去援苏抗德。过了三周,5月8日,英国才答复苏联,仍然是建议苏联发一声明,若英法因履行其对东欧某些国家的义务而卷入战争,若希望苏联援助,苏联就立即给予援助,并以大家同意的方式和条件提供。^④苏联认为,这是不平等的。这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英法判定必须为维持欧洲现状而与德国作战,苏联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拖进去;如果苏联主动为维持现状而作战,英法就不承担义务。5月14日,苏联答复,再次要求订立平等的互助条约。英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在日记中写道:“首相说,他宁愿辞职,也不愿与苏联订盟约。”^⑤但是,来自英国政府内外以及法国方面的压力太大了。法国政府不相信战争可以避免,而且认为,英法在军事上较弱,

联合苏联,乃是战略需要,因此主张接受苏联关于订立三国同盟条约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张伯伦才勉强同意订约。但他坚持,条约必须规定,三国间的互助只是履行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所定的义务(即一个成员国受到侵略,其他成员国即应对侵略者实行制裁)。张伯伦承认,这样的条约,仍然只是一篇表示“我们的意图的宣言”,而“意图”也只是暂时的,因为他相信,第十六条必将在最近被修改或取消。他还自夸,他的这种设计,“真是一个最巧妙的主意”。^⑥5月27日,英法便将这个“主意”交给苏联,作为答复。自此时起,英苏谈判便转为英法苏谈判。

苏联反对将条约与国联挂钩,并提出必须明确保证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特维亚、芬兰的安全,后来又提出,这些保证还应适用于反对“间接侵略”(被保证国内发生有利于侵略者的政变或政策改变)。在此后的折冲尊俎中,英法接受了苏联关于前两点的意见,但决不同意把保证的范围扩大到反对“间接侵略”。英法认为,苏联将会借此干涉和控制被保证国,还可以借判断是否已经发生“间接侵略”来取得和与战的决定权。

在僵局中,7月23日,苏方撇开间接侵略问题,要求进行关于军事协定的谈判。本来,没有军事协定,政治方面的条约即使订成,那也无异于一纸表示意图的宣言。但这正是张伯伦所希望的。他既然只想凑成外交上的暂时联合,当然也就不需要什么军事协定。况且英法的军事计划一直是旨在打一种防御性的战争,在防线后面逐渐增强实力,同时用封锁和轰炸消耗敌方的实力,最后打败敌人。至于如何与苏联配合作战,它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但在公众舆论和议会的催逼下,又不得不应付,于是便采取拖的办法。8月11日,即苏联提议进行军事谈判后十八天,英法的由二、三流角色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才慢腾腾地到达莫斯科。英国内阁还训令其代表团要缓慢地进行谈判。谈判开始时,苏方代表问:按英法的设想,苏方应如何参加作战?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把英法

代表们难住了。谈判第三天,8月14日,苏方代表具体地问:如果波兰被攻,它会允许苏军进入其领土去直接抗击敌人吗?这个问题是4月间英苏谈判一开始就存在的,但英法一直不肯正视这个问题,现在英法方面只能回答说,这需要同波兰政府交涉。交涉没有结果。而且为时已晚,局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了。苏联和德国之间已在准备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张伯伦的政策促成的。他在与苏联进行结盟谈判的同时,又在继续推行绥靖政策,又在与德国人秘密谈判。保守党议员利奥·阿末里在日记中写道:“尼维尔的烦难是,他正在被迫执行一种他不喜欢的政策而又不肯放弃仍可能使他得以恢复其以往政策的最后桥梁”。^{⑤7}桥梁之一是他所谓的德国“温和派”。他在5月19日的一次会上说:“温和派在德国社会中乃是重要而又有前途的成分,应该竭力鼓励他们”。^{⑤8}他把纳粹大头目空军部长兼“四年计划”总裁赫尔曼·戈林也看作“温和派”。6、7月间,他的属下同戈林的副手赫尔穆特·沃尔塔特几次密谈。他的顾问霍勒斯·威尔逊向沃尔塔特建议,两国应举行正式谈判。威尔逊还为谈判拟了一串经张伯伦批准的议题:英德订互不侵犯条约;德国不干涉英联邦的事务,英国也不干涉“大德意志国”的事务;归还德国以前的殖民地;裁减军备;英国为但泽和走廊问题的和平解决进行调解,等等。威尔逊向沃尔塔特暗示:英国不仅愿意从事广泛的经济合作,而且愿意给德国工业提供财政援助。^{⑤9}不料这些会谈被泄漏了。英国报纸揭发说,政府正想用巨额贷款贿赂纳粹德国。张伯伦否认有贷款的打算。但他仍继续派人去找德国驻英大使、参赞等密谈,甚至派人去拜见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所谈无非是表示愿意满足希特勒的领土要求,愿意奉献一些经济上的实惠,以换取妥协。所有这些活动都一无所获。8月20日,希特勒派人带信给霍勒斯·威尔逊说,会谈不能继续了,波兰问题他宁愿去找波兰解决而不愿与英国讨论。^{⑥0}

这并不奇怪。希特勒曾就贷款的事作过

明确的回答:德国并不是想要钱。^{⑥1}他也不止是要但泽和走廊。他要的是征服英法,而以征服波兰为前奏。他之所以还肯同英国谈一谈,是因为会谈本身就可以离间英波关系,破坏英苏谈判。当他觉得目的已经达到时,就不需要再谈了。

英德之间的秘密会谈,只产生两个结果。(一)证实了希特勒的判断,英国政府无心履行对波兰的保证。德国大使在会谈后向希特勒报告说,英国谋求与德国谅解,是想使对波保证失效,是想摆脱它因波兰问题而陷入的困境。(二)证实了苏联的判断,英国无心与苏联结盟。威尔逊等与沃尔塔特的会谈传出时,英国外交部里就有人把这事讥为“超级绥靖”,断定将会引起苏联的疑虑,斥之为“愚不可及”。^{⑥2}苏联确是把此事看作英国政策诡诈的铁证。^{⑥3}苏联在4月间已向英法提出缔结切实有效的同盟,英国却把谈判拖了几个月,已使英苏之间的不信任日益加深,英德会谈更使苏联肯定,英国只是想用一纸空洞的同盟条约把苏联诱入战争而它自己则守中立,隔岸观火。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在考虑与德国和解。

在英国与苏联慢慢谈,与德国谋“超级绥靖”的形势下,8月初,希特勒终于决定,在月底以前对波兰开战。他确信波兰已被孤立,可以先击破。7月底至8月初,他再三向将领们保证,英法不会干涉,张伯伦、达拉第等坐着品咖啡的人将会和上年一样按兵不动,“实施‘白色计划’决不会,决不会,决不会引起世界大战。”^{⑥4}8月12和13日,希特勒又告诉意大利外长齐亚诺:此时是攻打波兰的最佳时刻,英法终必退缩,苏联不会为英法火中取栗,波兰军力很弱,德国可以在最短期内将它打翻在地;此刻迅速摧毁波兰,亦有利同英法进行不可避免战争;德国将在8月底入侵波兰,10月初结束战斗,必须赶在秋雨之前。他还向齐亚诺透露,苏联已同意德国派人去莫斯科进行政治谈判。^{⑥5}

正因为进兵的日子已经确定,希特勒才必须与苏联谈判,而且必须立即达成谅解。前面说过,希特勒为进攻西方,要做三件准

备工作。吞并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做了;征服波兰,即将动手;与日本订军事同盟,却没有订成。由于德国坚持同盟必须既针对苏联又针对英法而日本只愿针对苏联,两国从1938年夏谈到1939春,一直没有谈妥。现在为了彻底孤立波兰,为了准备与西方作战,希特勒决定用德苏谅解来代替德日同盟。

前面说过,4月初,即英波互保以后,德国已向苏联表示愿意改善关系。6月中,希特勒对他的外长说,需要采取与苏联合作的政策。但他还没有最后确定入侵波兰的日期,苏联也还没有排除德国来犯的可能,两国间的非正式会谈时断时续。7月21日,两国才恢复关于经济和贸易的正式谈判。此时英法苏政治谈判已陷入僵局。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等总以为,只要谈判拖下去,只要英法苏结盟的可能性还没有消失,德国就不敢贸然行动,苏联也不会转到与德国和解。但实情正好相反。苏联从拖延中看到英法没有诚意;德国也由此看到有机可乘。希特勒认为,英法苏政治谈判已陷入一种“惨败的境地”,后来的军事谈判不过是为了掩饰这种状况。^⑥英国领导人总以为,苏德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绝不可能和解,英国则可以同德国妥协,握有行动的自由。实情也正好相反。从德日谈判中德方坚持矛头亦应指向英法,从德意“钢铁条约”的订立,苏联都明白了德国不是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后来又从来自各个渠道的情报得知,德国是要先攻英法,因此在1939年夏这个时候,是苏联握有行动的自由。苏联已在和德国进行经济谈判。德方代表乘英法苏正在“间接侵略”问题上久争不决之际对苏方代表说:在波罗的海至黑海这个地区,在远东,在任何地方,德苏之间都没有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两国可以根据彼此的利益作广泛的安排。8月4日,德国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正式提出,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德国都将照顾苏联的利益,暗示可以划分势力范围。12日苏方答复:可以派人来莫斯科举行政治谈判。14日德方答复:将派里宾特洛甫访苏,并准备全盘接受苏方的要求。20

日,苏德签订经济协定,苏方答应里宾特洛甫可于26或27日来访。但因希特勒亲自电请斯大林把来访的日子提前,里宾特洛甫遂于23日到达莫斯科,当晚就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这份更为重要的秘密议定书规定:芬兰、爱沙尼亚、拉特维亚和波兰东部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立陶宛和波兰西部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至于维持波兰国家的独立是否符合德苏双方的利益,这个国家的疆界又如何划法,要待政治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确定。^⑦订约的消息传来时,素来不喝酒的希特勒举杯庆祝,随后又以双拳捶墙,大叫“现在欧洲是我的了!”^⑧签约前几小时,希特勒已下令8月26日凌晨4时30分入侵波兰。

英法苏谈判不可能再继续了。张伯伦摆出两条战线的态势,然后谋求英德谅解的政策宣告破产。他花了四个多月与苏联谈判订约,没有订成,是因为他不想订成真正的盟约;这又是因为他以为战争还可以避免,还可以用新的策略求得妥协。希特勒花了十三天就订成条约,是因为他一定要订成,不惜出高价;这又是因为他要发动战争,而且开战的日期已经迫近。在他看来,无论价有多高,将来战争转到东面时,都可以收回。

英国主张抗德的人的三点希望中,“威慑”和“与苏联结盟”均已落空,只剩下“保证波兰的安全”这一点了。张伯伦会履行这个保证吗?他不敢说不履行。公众舆论、议会、内阁多数成员都主张援助波兰。他只能设法避免履行。现在还剩下来的办法就只有压波兰接受希特勒关于但泽和走廊的要求。

8月22日,得知德苏即将签约后,张伯伦便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希特勒,信中说,不管德苏条约的性质如何,都不能改变英国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英国“是决心履行这个义务的”。这样说是为了应付国内舆论,并给希特勒一个“警告”,使其愿意与波兰谈判,所以下面就说,希望德国和波兰能够直接谈判,谈判若达成协议,应由其他大国保证其实施。^⑨这封信表明,张伯伦仍以为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再搞一次“慕

尼黑”。

希特勒的答复是,他宁要战争不要谈判。^⑩但是,8月25日,他得到两个消息:一是英国与波兰正式签订了4月6日就已宣布要订的同盟条约;二是墨索里尼告诉他:5月间签订“钢铁条约”时希特勒曾答应他要到1942年才发动战争,现在如果对波兰的进攻因英法卷入而演成大战,意大利就不参加,因为它还没有准备好。这两个消息,意味着波兰得了一个盟友而德国则失掉一个伙伴。于是希特勒便在这天下午7时半下令推迟原订于次日凌晨对波兰的进攻,以便再做几天的外交工作,争取英国取消对波兰的保证。他请英国大使汉德森立即回去告诉英国政府:他一直希望与英国谅解。但泽和走廊问题必须解决。在这个问题解决后,他将向英国提出较广泛的建议。他愿意亲自担保大英帝国的继续存在,而且愿以全力去支援它。他再一次保证,他不会去改变德国西面的疆界。^⑪同时戈林又派一个名叫比尔格·达勒鲁斯的瑞典商人去英国,转达同样的信息。这两人在26日先后见到英国领导人。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闻讯喜出望外,以为张伯伦22日致希特勒的那封信已经产生了好结果,当天就请达勒鲁斯回去说:英国愿意通过谈判把但泽和走廊送给希特勒,危机一过去,就可以讨论归还德国以前的殖民地。^⑫28日,汉德森带着英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往见希特勒。复文除重申22日信里表述过的意见外,还说,英国虽将履行它对波兰的保证,但仍希望运用其影响力促成问题的解决,这又将为英德之间的全面谅解开辟道路。^⑬这次会晤之后,汉德森立即向哈里法克斯报告:“谈话是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对英国政府的意见,希特勒允于次日以书面答复。^⑭汉德森非常乐观,感到又一次“慕尼黑”已经在望。英国政府领导人也同样乐观,以为战争已被制止,虽然要以割让但泽和走廊为代价。^⑮

29日晚,汉德森去拿回信,发现希特勒的态度转为冷漠而又强硬。希特勒对他说:要直接谈判也可以,德国外交部已就但泽和走廊问题拟好了解决方案,波兰必须派全权

特使于30日(即24小时内)来到柏林,要么在方案上签字,要么表示拒绝。^⑯交给汉德森的复文也是这个意思,只是用词比较委婉而已。这是希特勒设置的圈套。他在确定进攻日期后就已决定,要把开战的责任推到波兰身上。他从25日后几天的外交活动中看到,虽不可能诱使英国公然取消对波兰的保证,但英国一再乞求德波直接谈判这一点却可以利用。他拟好了方案,知道波兰不可能立刻就派特使,即使特使按时来到,也不会接受那个方案,这就给了他进兵的借口。不料张伯伦竟把这个圈套视为谈判之门总算没有关闭。据达勒鲁斯说,张伯伦在30日请他转告戈林:英国亟盼得到一个解决办法,包括把但泽和走廊立即让给德国。^⑰同日,哈里法克斯就对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出特使。波外长贝克拒绝亲赴柏林。30日午夜,汉德森往见里宾特洛甫,请求按正常手续把方案交波兰大使转送其政府。里宾特洛甫不答,只将方案的摘要很快地念了一遍。汉德森要这个方案的文本,他也不给。31日,贝克命波大使利普斯基往告里宾特洛甫,波政府同意谈判。会见时里宾特洛甫问大使有无谈判的全权,答称没有,也不知全权特使何时到来。会晤仅十分钟。两小时后(晚9时),柏林广播电台便播出那个方案,并说,波兰特使既然没有来,这个方案就算被拒绝了。方案共十六点,包括归还但泽,走廊的归属将由全民投票决定等等。这是给国内公众听的,显示德方的要求并不苛刻,也竟然遭到拒绝。其实波兰政府甚至还没看见过这个方案。在广播以前,希特勒已经签署第一号作战令,命德军于次日(9月1日)凌晨4时45分进攻波兰。

9月1日上午7时半英国外交部才知道战争已经爆发。10时半,波兰驻英大使请求英政府派空军援助,因为德国空军已在波兰滥施轰炸。英政府不理,只送了一封照会给希特勒:德国政府若不停止对波兰的侵略行动并将军队撤出波兰领土,英国政府就要履行它对波兰的义务。^⑱什么时候一定要停战,什么时候一定要撤军,都没有说。既然

没有停战和撤军的日期,也就没有“履行义务”的日期。张伯伦还是不想履行对波兰的保证。他想的是,还有墨索里尼这根稻草可抓。

8月31日意外长齐亚诺曾告哈里法克斯:假如英国能使波兰放弃但泽,墨索里尼将劝希特勒同意召开大国会议,讨论修改《凡尔赛和约》。随后齐亚诺又对英国驻意大使说:估计希特勒不会拒绝开会。因此英国领导人觉得,还有再作交易的可能。德军攻入波兰后,9月2日,墨索里尼又致电希特勒,建议召开德意英法波五国会议,先就地停战,随即开会。电文还说,德国已经占领了但泽和波兰的一些地方,有这些抵押品在手,定能通过会议达到进兵的目的而又不至于引起大战。^⑨接电后,里宾特洛甫便对意驻德大使说:希特勒不反对墨索里尼的建议,只是不知道英国前一天送来的照会是不是最后通牒。哈里法克斯闻讯后急忙回答:照会只有警告的性质,决非最后通牒。

尽管如此,调解还是没有能够进行下去。首先,希特勒绝无罢兵言和之意。墨索里尼曾在8月25、29、31日出面斡旋,希特勒都拒绝了。他在5月23日就已经说过:他“只怕到最后一分钟还会有个坏蛋跑来调解”。^⑩如今,在攻入波兰以后,反而不反对墨索里尼的调解,乃是一种缓兵之计。他是想用调解来绊住英法,然后在最短时间内打败波兰,使英法在既成事实面前放弃干涉。显然,无论此计成功与否,他都不会停止军事行动,更不用说撤军。

其次,英国议会和内阁多数成员都坚决反对这个时候还在幻想搞“慕尼黑”。9月2日下午,当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应多给德国一点时间来考虑墨索里尼的建议时,多数阁员都反对这种意见。内阁旋即作出决议:立刻要求德国撤军,限它当天午夜前答复。会后哈里法克斯只得请齐亚诺转告德国政府:要德军撤出波兰,英国内阁才赞成开会。齐亚诺回答说:希特勒决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哈里法克斯又告诉他,张伯伦即将向议会报告开会的事,齐亚诺说,最好不要再提。墨索里尼的调解,就此

告吹。

可是,下午8时,张伯伦竟然无视内阁的决议,向议会宣称,英法正在考虑再给希特勒一点时间;竟然不顾墨索里尼的调解已经流产这个事实,仍说假如德国同意撤军,局势就会恢复到德军入侵波兰以前的状态,德波争端就有希望得到解决。波兰已遭德军蹂躏,英国这个波兰安全的保证国的首相仍在说这种梦话,一字不提如何援助波兰,议会怎能不震怒。工党议员阿瑟·格林伍德质问道:侵略发生在三十八小时前,英波条约已自动生效,值此英国、英国所维护的一切、人类文明俱已面临危险之际,“我不知道我们还要犹豫多久”?^⑪愤慨之情笼罩着全场,斥责怒吼之声不绝于耳。张伯伦被压垮了。

多数阁员亦极为不满,连财政大臣约翰·西蒙这个绥靖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也反叛了。议会散会后反叛的阁员推举西蒙去对张伯伦说,若不对德国下最后通牒,内阁就会倒台。张伯伦只得打电话给法国总理达拉第,告以英国议会和内阁中的情景,建议英法两国在次日即送最后通牒。9月3日上午9时,英国大使把最后通牒交给德国外长:除非德国政府在上午11时以前答应停止对波兰的侵略行动并将军队撤出波兰领土,德英两国之间就存在战争状态。^⑫法国大使则在12时半交最后通牒,限下午5时以前答复。两个通牒都没有得到答复,英法遂对德国宣战。

张伯伦是在他的绥靖政策彻底破产以后被英国的抗德大潮推到对德宣战的。

希特勒早已图谋发动侵略战争,还订下了侵略的步骤,但这些步骤并不等于按时实施的具体计划。他还需要机会。他也很能见机行事。张伯伦的政策正好给他提供了机会。但是,希特勒没有料到英国人民在1939年会有那么大的抗德决心,后来更没有料到苏联军民的抗德力量会那么坚强。他的各个击破的步骤虽得逞于一时,但却激起所有受到德国侵略和威胁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消灭他。

⑪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Chief of Counsel for

-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Washington, 1946. vol. VI pp, 1006—1011.
- ②⑤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⑳Ibid, vol. v Ⅲ pp. 295—305. P41. 939. pp489—492. P84. P54. P59.
- ③William Carr, "Arms, Autarky and Aggression, A Study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33—1939", New York, 1972, P10. PP. 21—22.
- ④Donald Cameron Watt, "How War Came", New York, 1989. PP317—318.
- ⑥Gerhard L.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Starting World war Ⅰ, 1937—1939, Chicago, 1978. P457.
- ⑦⑨Watt op. cit., p38.
- ⑧Telford Taylor, "Manich, 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 1979, P65.
- ⑪Weinberg, op. cit., P515.
-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⑳Ibid, vol. VI. P947—948. Vol. Ⅲ, P483.
- ⑬Roy Douglas, "The Advent of War 1939—40", London, 1978, P3.
- ⑭但泽是波兰贸易的出海口, 但其居民主要是德意志人。《凡尔赛和约》便把但泽变为“自由市”, 由国际联盟负责其行政管理, 波兰控制其经济生活和对外关系, 德意志居民则享有自治权。
- ⑮《凡尔赛和约》规定: 德国把自上西里西亚北端至波罗的海的狭长地带割给波兰, 作为波兰内陆通往海上的通路, 是为“波兰走廊”。
- ⑰Taylor. op. cit., p62.
- ⑲Simon Newman, "March 1939: The British Guarantee to Poland", Oxford, 1976, P55.
- ⑳由于 1939 年 3 月 15 日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决议没有能够执行。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㊿Newman, op. cit., P86, PP136—137, P105. PP124—125. P193.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Idid., P100, P124, PP581—586, PP438—441, P849. P426.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Vol. V Ⅲ, P378. P450. VI. P916.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Watt, op cit, P167, P186, P250, PP337—338, P401, P480.
- ㉞Williamson murray, "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1938—1939", Princeton, 1984, P294.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Newman, op cit., P203, P205.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Murray, op cit, P299, P286, P300, P305.
- ㉞Richard Lamb, "The Drift to war 1922—1939", New york, 1989, P289.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Vol. V Ⅲ, PP850—851, V Ⅲ, PP516—526.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Idid, PP286—287, P300, P215, P307, P319, P525. P331, P332.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Lamb, op. cit., p302, P301, P320, P329, P331.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Jonathan Hasla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Colletive Security in Europe, New york, 1984, PP211—212, PP217—218, PP227—228.
- ㉞Weinberg. op. cit., P622.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Watt, op. cit., P462, P579.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vol. V Ⅲ. PP453—454, PP460—463, P473, PP474—475.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Idid. vol V Ⅲ, PP455—457, PP458—460, PP463—466.
- 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Idid. vol. N, PP464—465, V Ⅲ, P855.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凌 峰

“现实主义”问题商兑

□袁良骏

在今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台湾文学史》下卷中，关于现实主义有这样一段话：

80年代台湾小说的艺术发展，显然打破了70年代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色调单一的创作格局。究其原因，除了艺术发展的内部原因外，更主要的，乃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已难适应反映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的需要，或者说，变化了的现实呼唤着新的艺术表现方式。^①据该书编者自认，他们的上述观点直接脱胎于台湾著名评论家施淑女士的以下论断：

以反映现实自居的现实主义，在反映当前台湾社会现状时〔遇到了〕潜在困难……暴露了现实主义所谓自然的、正常的、而事实上不过是习惯化了的思考和表现方式，与发展中的、被资讯狡狴地隐藏或神秘化了的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分歧与破裂，暴露了在这情况之下作者的困惑与焦灼。^②

一句话，现实主义落伍了，不够用了，无力表现“变化了的”、“被资讯狡狴地隐藏或神秘化了的的社会现实”了。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否定意见，甚至更尖刻、更绝对的否定意见，我们在大陆一些“先锋派”作家或评论家的口中或笔下，也早已接触很多了。而它们的源头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30年前香港刘以先生长篇小说《酒徒》中的这样一段话：

文学是一种创造，企图在传统中追求古老的艺术形式与理想，无论怎样热情，也不会获致显著的成就。现实主义

早已落伍，甚至福楼拜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手边有复音的合奏，丰富的调色板，各种各样的媒介……但是我们缺乏的是：（一）内在的原则；（二）事物的灵魂；（三）情节的思想。福楼拜是现实主义大师，他的话当然不会危言耸听。事实上，现实主义的单方面发展，绝对无法把握全面的生活发展，因此，连契诃夫也会感慨地说出这样的话了：我们的灵魂空虚得可以当作皮球踢！……

——现实主义应该死去了，现代小说家必须探求人类的内在真实。^④

这段话，是小说主人公“我”的一段内心独白，本不便加以认真评说。但“我”是一位处于困境的严肃作家，他的上述心理情态，很符合作家刘以的思想实际，因为在刘氏后来撰写的一些论文（特别是题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几个问题》^⑤的长篇论文）中，这些观点曾一再得到大同小异的表述。

那末，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对传统现实主义（或曰批判现实主义）的否定意见呢？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这些意见的合理因素。传统现实主义即使从19世纪算起，也已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世界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变（如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革命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大大改观，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情操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要适应和反映这种变化，文学艺术也必然要发

生相应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诸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荒诞主义等)汹涌而来,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和传统浪漫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史、文艺史上的一场巨大革命。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都不满意于传统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忠实描绘,也不满意于传统浪漫主义的空疏的反抗和英雄主义的激情,它们主张回到人们的内心世界,“探求人类的内在真实”,深入开掘人性的各个角落(心理、病态心理、性心理、变态性心理、意识、潜意识等等)。这样一种文艺思潮,恰恰弥补了传统现实主义和传统浪漫主义的薄弱环节,深受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欢迎,一时间风靡世界文坛,几取传统现实主义和传统浪漫主义的文坛统治地位而代之。这正是现代主义兴起的原因所在,也是在它较之传统现实主义和传统浪漫主义的优胜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高度评价刘以鬯先生30年前向中国文坛大力提倡现代主义的苦心。他的提倡虽在现代主义风靡欧洲半个多世纪之后,但对中国文坛来说,还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五四”以来,现代主义虽然哺育过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现代作家,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中国文坛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50、60年代之交,台湾兴起了现代主义思潮,诗歌、小说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现代主义一度取得了压倒优势。但由于海峡两岸的对垒和阻隔,台湾强劲的现代主义之风却无法登上大陆。因此,身处香港的刘以鬯先生的倡导对中国(包括台港)当代小说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意义至今没有过去,这也正是“先锋派”、施淑女士乃至闽版《台湾文学史》对现实主义的批评仍然值得重视的原因。

但是,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从刘以鬯先生到闽版《台湾文学史》,对现实主义的否定和对现代主义的倡导一样,话都说过了头,矫枉过正了。

必须承认,任何创作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不是万能的。作品的质量和水准,并不取决于作家使用何种创作方法,而取决

于他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修养,取决于他对社会、人生的把握程度。传统现实主义产生过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传统浪漫主义产生过拜伦、雪莱、普希金,现代主义则产生过乔伊斯、卡夫卡、卡缪、艾略特……但是,也产生了很多末流的、不入流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作家。传统现实主义诚然有自己的局限性,它对文学反映社会的功能的强调压倒了对探索人物内心复杂奥秘的强调。那末,现代主义就没有自己的局限吗?显然不是。单纯强调探索人物内心而不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性,结果往往使人物拘囿在狭小的视野甚至卑琐的生活圈子内,不同样是一种片面性吗?何况,现代主义所十分强调的“非理性”,本身就包含着很多谬误呢?它所导致的乱伦、倒错、嗜杀、乖僻等非人性、非人道的描写,不论从文学本身还是社会效果看,都是不值得称道的。因此,对于包括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创作方法、创作思潮,正确的态度只能是兼容并包,百花齐放,而不应该过于偏激地褒贬抑扬,甚至置某一种创作方法于死地。

比较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是各种创作方法、创作思潮相互吸收、高度融汇的结果。就以台湾6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代表作家白先勇为例,他的纯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如《月梦》、《青春》、《小阳春》等,恰恰都是比较幼稚单薄的习作,而他的代表作《台北人》和《纽约客》中的一些篇什,恰恰都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高度融合的作品。他本人所说的“融传统于现代”,既包括思想内容,也包括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他刻划的那一系列悲剧形象,诚然成功运用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诸如时空交错、意识流、象征、意象等等,也十分注意人物的心灵探索,但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却深深打上了时代和社会的烙印,这正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根本特点。香港文学方面,又何尝不是这样?仍以《酒徒》为例,它确实不愧为一部现代主义的杰作,整部小说不外是主人公“我”的连绵不断的意识流动,而“我”作为一位严肃作家的内心痛苦和尴尬处境却跃然纸上,但是严肃文学的困境不正是香

港现实的逼真反映吗?!“我”作为一位有良知、有水准的严肃作家,为什么一步步“落水”,迫不得已地去写他十分厌恶和鄙视的武侠小说、黄色小说并一步步走向颓废堕落(借酒浇愁乃至狎妓)呢?他的矛盾、痛苦,他的心路历程,不正好反映了香港社会“逼良为娼”、不给严肃文学以扶植的严酷现实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酒徒》不仅没有摆脱传统现实主义,恰恰相反,它正是手法上的现代主义而骨子里的现实主义。

就现实主义而言,也并不存在落伍甚至死亡的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主潮,各种创作方法、创作思潮总是象走马灯一般交替更迭,谁也不可能永远独霸文坛。假如说19世纪是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那末20世纪未尝不可以称为现代主义的黄金时代。21世纪究竟谁执世界文坛之牛耳,现在还很难预料。即使在现代主义风靡文坛的20世纪,现实主义也并未停止自己的发展,中国文坛的情况更是这样。

从“五四”算起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吸收了不少现代主义的营养,但其基本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潮依然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特别以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更是高张了现实主义的旗帜。成绩卓著的“乡土派”,就是现实主义在“五四”文学中的最突出的代表。50、60年代吕伦、海辛、金依、舒巷城等香港作家的小说创作,延续的也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而在70、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又有了长足发展。首先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大发展,陈映真、钟肇政、李乔、王拓、黄春明、郑清文、宋泽莱、王贞和、杨青矗……一系列雨后春笋般的乡土派作家,大大显示了现实主义并未过时的生命与活力。其次,以於梨华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以及目前正蓬勃发展的海外华文文学,现实主义仍占着压倒优势。再则,“四人帮”粉碎后大陆兴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开放文学”等,其基本的创作方法依然是现实主义。还有,就目前的香港文坛而言,现实主义文学仍在持续发展,无论描写香港社会现实或历史发展的作品,还是反映“大陆

客”(“新移民”)悲剧的作品,都足以为证。

在回顾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成败得失时,必须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另当别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写光明,强调歌颂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灿烂阳光和美好未来,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十月革命”后直至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某些号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诸如法捷耶夫的《毁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也不容一概否定。但是,由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极“左”路线的严格控制,这个创作方法逐渐变成了歌功颂德、隐恶扬善的代名词,逐渐背离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走进了死胡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曾对中国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早在30年代中后期,这一口号即以“新现实主义”的面目走俏于中国文坛,进步作家竞相效尤。但由于当时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深重的民族危机,“新现实主义”只能是一张贴上去的标签或安上去的“光明的尾巴”,影响并不大。新中国成立后,它才被钦定为最佳创作模式,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一律被冷落。结果,一、二十年中创作道路越走越狭窄,创作危机越来越深重。“十年浩劫”中,这一创作模式又被“四人帮”大肆利用,造成了“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可悲局面,文学艺术也象整个国家一样,濒临崩溃的边缘。有朋友把这个文学悲剧统统算在传统现实主义的账上,这是不符合文学史实的。“十年浩劫”中的文艺悲剧,恰恰是背离了传统现实主义原则的结果。

现实主义是否一直在原地踏步,至少停留在19世纪的阶段呢?当然不是,现实主义也一直在发展前进,吐故纳新,广收博采,不断拓宽自己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充分吸收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和有力手段,努力使自己富于现代色彩,以便适应反映飞速发展、日渐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物心态之需要。它和19世纪的现实主义相比,已经有了许多新的特点。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就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荒诞主义的有机结合,而其核心仍是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

的代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得好：“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文学的最佳模式始终是真实”，“努力以谦虚的态度和尽可能完美的形式反映现实”。⑥

最后，不能不指出的是，《酒徒》主人公“我”关于福楼拜、契诃夫两段话的理解也是值得商榷的。这两段话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创作谈，而不是专门谈创作方法问题，更不是专门谈现实主义的所谓“缺陷”。两位现实主义大师终生挚爱现实主义，为丰富和发展现实主义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他们并不把现实主义看成一种固定的模式，他们甚至拒绝接受别人加给自己的“现实主义大师”的桂冠。⑦他们执着追求的是真、善、美，是“真实”反映生活的艺术，而反对在创作方法问题上进行徒然无益的形式主义争论。“我”引的福楼拜的那段话，谈的正是“内容”——“原则”、“灵魂”、“思想”。他指出，在各种表现手段齐备的情况下，我们缺乏的正是内容，有深度的内容。这段话表现了福楼拜对创作内容亦即作品灵魂的高度重视，而根本没有埋怨“现实主义早已落伍”。至于契诃夫的那句话，也是对“灵魂空虚”的一种夸张的感慨，丝毫也没有谴责或惋惜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无法把握全面的生活发展”的意味。

①见该书第590—591页。

②《天真状况的结束》，载台北《联合文学》第五卷第10期。

③香港海滨书屋1963年初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大陆版。

④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第66页。

⑤收入《短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

⑥见《番石榴飘香》，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

⑦参看《乔治·桑和福楼拜的文学论争书信》，《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三期第189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陶原珂

从追踪鲁迅到走向周作人

——冯文炳乡土文学的创作路向

○杨剑龙

自称其创作从周作人先生的园地走来的冯文炳，他的作品大多以简洁朴讷的笔调叙写乡村翁媪儿女的生活琐事，以冲淡古朴的意境流露抱朴守真的人生理想。自登上文坛后，他的小说集、评论集均由周作人包作序，他被公认为周作人的嫡系传人，“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枝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①1934年周作人

在会见日本记者时亦自认冯文炳是他“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只两三个”中之一。冯文炳的步上文坛、形成风格固然离不开周作人的鼓励和扶植，但我们常常忽略了鲁迅对冯文炳创作的启迪和影响，或简单地将冯文炳归入鲁迅一派中，或完全否认鲁迅对冯文炳创作的影响。究竟如何看待冯文炳和鲁迅的关系？冯文炳的创作是否受到过鲁迅的影响？这还需要我们客观细致地进行分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氏兄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理论建树和创作实绩的两面旗帜，当时许多文学青年都受到他们的启迪和影响。五四时期在湖北武昌第一师范读书的冯文炳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关心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读到周作人的新诗《小河》后，他感到“眼目一新”，便开始与周作人通信。同时，他也读到了鲁迅的作品，后来他说“鲁迅君的文章，在零碎发表的时候，我都看过一遍两遍”。②1922年9月冯文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开始直接与周作人交往，仍热切地阅读鲁迅作品，他说：“《呐喊》我是预约的，如饥似渴地盼望它出版，一出版就去取书，拿在手上就看那一篇‘序’，非常受其吸引地读下去。”③冯文炳于1924年4月9日写了一篇评论鲁迅小说的短文《呐喊》，刊载于1924年4月13日的《晨报副镌》。文章中说：“在文艺上，凡是本着悲哀或同情而来表现卑者贱者的作品，我都喜欢。因此，《呐喊》里面合我的脾胃的是《孔乙己》了。”冯文炳在文章中着重评点了《孔乙己》，冯文炳的心被鲁迅笔下描写的孔乙己的悲苦命运深深地震动了。该文后被台静农收入《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1926年8月8日鲁迅还专门写信给韦素园谈及送书给冯文炳之事：“《关于鲁迅……》须送冯文炳君二本（内有他的文字），希即令人送去。但他的住址，我不大记得清楚，大概是北大东斋，否则，是西斋也。”④这说明了当时鲁迅与冯文炳之间虽亲近却不亲密的关系，这大约是由于冯与周作人关系十分密切的缘故吧。

冯文炳对鲁迅是十分崇敬的，他与鲁迅的交往主要集中在1925年至1926年间。据鲁迅日记记载，这两年间他们的交往有6次，1925年4次，1926年2次，冯文炳或上门拜访，或寄信，赠书刊。1926年6月11

日，冯文炳在一则日记中真切地记下他对鲁迅的真挚情感：

我近来本不打算出去，出去也只随便到什么游玩的地方玩玩，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得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的道上踏。又莫名其妙的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⑤

1926年6月鲁迅应刘半农之邀，为《世界日报》副刊写了“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马上寄出去”的《马上日记》，后来“因为《语丝》上须投稿”，“于是乎作支日记”。冯文炳所见的是鲁迅6月29日和7月1日的日记，前者忆写前年夏天路过S州所见“蝇群却着实使人惊心动魄”的情形，并移录古籍上与《水浒传》相关的篇章；后者以吴佩孚在宴席上发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为‘蚩’‘赤’同音”之事为楔子，讥刺针砭当时社会上种种黑暗现状。冯文炳在日记中十分真切坦率地吐露了自己的愧痛和内疚——当时冯文炳正在着力造《桥》，已发表了田园牧歌式的《无题之一》、《无题之二》。冯文炳当时终于未去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处，而转念去了八道湾的周作人处。倘若说跟着鲁迅必须忍受赤着脚在荆棘的道上踏的痛苦的话，那么随了周作人则为了追求闲坐树荫下眺望田园风光的恬适。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冯文炳还写道：“从昨天起，我不要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纪念日了罢。”⑥冯文炳蜕成了废名，他虽真诚地愿为看护鲁迅先生的尸首而献身，但这种蜕变已昭示着他将逐渐与鲁迅疏远，越来越靠近周作人了。

1929年5月15日鲁迅从上海抵达北京探望母亲，5月19日废名即去鲁迅寓所拜访。1930年5月废名在《骆驼草》周刊创刊号上，以丁武为笔名发表短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对列名于宣言上的鲁迅等人表示不满，鲁迅在1930年5月24日致章廷谦的信中对废名作了批评：“《骆驼草》已见过，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

《语丝》开给时那么活泼。”⑦相对如上批评的温和语气,1932年11月20日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中对废名的指责则愤愤然了:“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⑧透露了废名与鲁迅的疏远与对立。

1934年10月,废名在《人间世》第13期上发表《知堂先生》,文章中说:“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鲁迅随即写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批驳了废名的文学观,鲁迅说:“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这是我们已经听得耳膜起了茧了的议论。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这也是我们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写文章自以为对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⑨鲁迅针锋相对毫不留情地批驳了废名的文学观,废名离鲁迅越来越远了。

解放后,废名十分追悔与鲁迅的疏远,在《鲁迅先生给我的教育》一文中回忆说:“《彷徨》也买了一本,翻开一看,没有著者自序之类的东西,只在卷头上引了屈原《离骚》里面的几个句子,……我看了之后就很不懂了,也没有求懂的兴趣,扔了。这一扔,不但扔了鲁迅,也扔了屈原,也扔了司马迁等等。我自己的文学活动也继续了几年罢,几年之后就停止了,因为走进死胡同里面去了。”在这种悔悟的心情下,冯文炳认真研究鲁迅,给青年学生讲授鲁迅,讲鲁迅创作的伟大成就,讲如何研究鲁迅学习鲁迅。1956年他出版了《跟青年谈鲁迅》一书,对鲁迅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二

冯健男在《冯文炳选集·编后记》中指出:“鲁迅的创作启迪和滋养了我国现代的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其中包括了冯文炳——废名。”冯文炳前期的小说创作首先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是确凿无疑的。

鲁迅在《呐喊·自序》的开篇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篇使冯文炳“非常受其吸引地读下去”的序,真切阐明了鲁迅小说创作题材选择的特征——不能忘却的回忆。《呐喊》集中的作品大多是忆写作者故乡生活的,无论是描写“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的《孔乙己》,还是“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的《药》;无论是叙写剪辮引起乡村土场上的骚动的《风波》,还是忆写童年时难以忘怀的好戏的《社戏》,都缘于鲁迅记忆深处的故乡生活,《呐喊》题材的摄取具有过去时的特点。冯文炳的前期创作可分为现在时的身边小说和过去时的乡土小说两类。前者都以作者求学生涯中的所遇所见为素材,抒写了年青一代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与追求,如描写北大学生向军阀政府请愿而挨打的《讲究的信封》,描写少年阮仁逃离没有人味的世间的《少年阮仁的失踪》;描写青年学生因病归家的《病人》,描写作家北山参加三·一八周年追悼会的《追悼会》。后者却以作者故乡生活的回忆为素材,描写故乡古朴悲凉的人生,如以作者“族间的一位婶母”为原型的《浣衣母》,以作者童年生活为素材的《袖子》;描写桃园里父女间舐犊深情的《桃园》,描写河柳畔陈老爹落魄生涯的《河上柳》。在冯文炳前期的小说创作中,以后一类作品为多,它们代表了冯文炳创作的独特风格和杰出成就,这种以不能忘却的故乡生活的记忆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明显地受到了鲁迅作品的启迪和影响。然而,鲁迅的不能忘却的回忆的题材摄取,主要瞩目于社会的现实。他在世界文明的参照下反观民族的积弊,立意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冯文炳的不能忘却的回忆的题材摄取,更多地为了录下“过去的生命”,⑩他在久别故土的思恋中回忆过去的岁月,“自足于在他人的身上生活过,担受过了”。⑪因而,成为废名以后,他的以回忆故乡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刘西渭曾明确指出:“冯文炳先生徘徊在他记忆的王国,而废名先生,渐渐走出形象的沾恋,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存在,……表现他所钟情的观念。”⑫

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执意描写乡村社会中小人物的平凡人生,他不去努力建构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而在几乎无故事的生活场景的描写中揭示老中国儿女的心理和命运。这种无故事的平凡人生的叙述描写给冯文炳的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周作人在《竹林的故事·序》中评道:“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冯文炳笔下描写的是:乾顺肉店伙计四火的屠宰生涯(《四火》),火神庙和尚金喜的孤寂人生(《火神庙的和尚》),衙吏赵志祥一家的平和生活(《毛儿的爸爸》),菜农三姑娘母女的艰涩岁月(《竹林的故事》)。“这种小说以半封建半殖民地城乡自然经济衰败的社会底层小人物、农业劳动者等为主角或重要人物,……用平凡、庸俗以至鄙陋的事物材料作出别有一番风味的风俗画或‘浮世绘’。”^⑬这种描写叙述与鲁迅的小说如出一辙。冯文炳的小说《桃园》琐琐碎碎地描写了桃园主王老大和女儿阿毛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王老大黄昏的挑水浇树,阿毛病中的遐想遐思;王老大上庙烧香的计划,阿毛请尼姑吃桃的回忆;阿毛桃子好吃的自言自语,王老大以酒瓶换玻璃桃子的不幸结局,在这种无故事的平凡人生的描写中,突出了父女间的舐犊深情。小说《文公庙》絮絮叨叨地叙述文公庙的张七先生与和尚琐屑的生活细节:张先生的教学生读书、代香客读签、买眼镜的记忆、撵乞丐的举动;和尚舂米买香的忙碌、踏了粪屎的恼怒、谈天说地的逍遥、驱赶叫驴的愤懑,在这种无情节的琐碎生活的叙述中,展示了乡村生活的古朴冲淡,着力展示人物的善良质朴,企图描出古朴敦厚的美的人性。

鲁迅的《故乡》的发表,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兴盛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品撩拨起乡土作家们浓浓的乡情乡思,形成了当时文坛上“游子归乡”的叙事模式。冯文炳的小说创作明显受到了《故乡》的影响,他前期的许多作品都采用了这种叙事模式。小说《鹁鸪》的开篇写道:

醒来听不见桨声,从篷里伸头一望,原来东方已经发白,四五株杨柳包围两间茅舍的船埠立在眼前了。

这与鲁迅《故乡》开篇主人公“我”从船篷隙中望故乡的景象的描写何其相似。《鹁鸪》描写“我”归乡听见家乡鹁鸪的叫声,感到分外亲切,到家后知晓小时的玩伴柚子

正做新娘,“我”想起去冬回家见柚子备嫁妆的情景,忆及小时送粢给柚子吃、同柚子一起学鹁鸪叫的情景,在往事的回忆中流露出淡淡的悲哀。小说《去乡》描写“病里作客”的“我”归乡后又拖着憔悴的病体别母去乡的故事。作者集中叙写“我”在去乡途中与儿时玩伴萍姑娘同路同船的情景,忆及少年时与萍姑娘一起玩耍两小无猜的欢欣,想到如今挣扎人世的哀怨,儿时回忆的欢愉与面对现实的悲哀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在主人公心理波动中,在山光水色的烘托中,将去乡游子伤感悲凉的情绪十分生动细腻地抒写了出来。同样,小说《初恋》、《柚子》、《我的邻舍》均以阔别故乡的主人公“我”的视角叙写故事,或回忆温馨的初恋,或咀嚼欢欣的童年,或追忆孩提的岁月,都在今不如昔、今非昔比的感慨中,呈现出伤感的抒情色彩和悲凉的审美风格。不过与鲁迅着力剖示人物麻木灵魂,渴望打破人与人之间这层“可悲的厚障壁”,吐露出探索新路的执著追求不同,冯文炳致力于倾诉人物的伤感内心,叹惋逝去的童年时代的温馨岁月,流露出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鲁迅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每每说他的创作是缘于寂寞,他曾在致青木正儿的信中说:“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为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⑭为了冲破寂寞的鲁迅,笔下却常常描写充满了寂寞的悲哀的世界:孔乙己的被嘲弄,单四嫂的受欺侮,狂人的孤独反抗,夏瑜的不被理解,都充满了深深的寂寞的悲哀。虽然鲁迅因为“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⑮他常在创作时“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⑯但鲁迅小说中的寂寞的悲哀仍然传染给了许多文学青年,其中包括冯文炳。他谈到鲁迅的《孔乙己》时说:“我读完《孔乙己》之后,总有一种阴暗而沉重的感觉,仿佛远远望见一个人,屁股垫着蒲包,两手踏着地,在旷野当中慢慢地走。”^⑰这种阴暗沉重的感觉常常压在冯文炳的心头,这种寂寞的悲哀常常萦绕于冯文炳的笔下,使他小说中的人物“无论言行怎么滑稽,他们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⑱冯文炳自己也说“愿读者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⑲冯文炳的笔底常常描写一些充满了寂寞的悲哀的人物和故事:善良热情的浣衣母,在可畏的人言中孤寂地等

待着不知能否归来的当兵的儿子（《浣衣母》），清苦勤俭的金喜和尚，在暗黑的火神庙中孤寂地离开了人间（《火神庙的和尚》），失了业的陈老爹孤寂地蹲在柳树下，眺对面的青山（《河上柳》），病恹恹的阿毛姑娘孤寂地坐在门槛上，望桃园的暮色（《桃园》），这使冯文炳前期的小说在冲淡的外衣下，呈现出哀怨忧郁的色彩。鲁迅和冯文炳都赞同厨川白村的“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的学说，他们的小说抒写寂寞的悲哀，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厨川白村的观点，但鲁迅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他的寂寞是先驱者孤军奋战的寂寞，是面对人之间厚壁障的寂寞，是融铸了屈原和尼采精神的寂寞，这使鲁迅的作品洋溢着忧愤深广的色彩。冯文炳则寻觅寂寞，甚至赏玩寂寞，他的寂寞是士大夫式的寂寞，是“与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的寂寞，是汲取了老庄和佛家意识的寂寞，这使冯文炳的作品笼上了冲淡平和的风韵。“因此，废名的作品，虽有悲哀，却少荡气回肠的深沉；虽有不平，却无震撼灵魂的伟力，情感与道德的力量都不足以通向深广博大。纤弱终成废名风格的先天弱疾。”^{②①}

卞之琳在谈及冯文炳的小说时说：“鲁迅是大家，废名是奇才，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即便对比一下，也能发人深省。”^{②②}通过如上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冯文炳的小说创作所受到鲁迅作品的深刻影响，虽然他的创作曾受到莎士比亚、契诃夫、哈代、艾略特的启迪，并汲取了温庭筠、李商隐、庚信、陶渊明的神髓，但应该说鲁迅的小说为冯文炳前期创作的主要楷模。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论及冯文炳的创作时说：“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

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象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冯文炳创作的转变，在周作人的鼓励下，在庄禅哲学的影响下，冯文炳逐渐疏远了鲁迅的为人生的创作坦途，步入了追求隐逸晦涩的孤独小径，“不幸他逃避光怪陆离的人世，如今收获的只是绮丽的片段”，^{②③}他的长篇小说《桥》可为代表。

倘若说前期的冯文炳可归入“鲁迅风”的作家的话，那么后期的废名只能归入周作人“言志派”的作家了。准确地说，冯文炳的小说创作是从鲁迅的路上走来，而步入周作人的园地的，但我们仍不应忘记：他曾愿为看护鲁迅的尸首而献身。

①沈从文：《论冯文炳》，见《沫沫集》。

②③①⑦论冯文炳：《呐喊》。

④《鲁迅全集》第11卷477页。

⑤⑥废名：《忘了的日记》，见《语丝》128期。

⑦⑧《鲁迅全集》第12卷17页，122页。

⑨《鲁迅全集》第8卷380页。

⑩废名：《说梦》，见《语丝》133期。

⑪见冯文炳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扉页所引波特莱尔散文诗《窗》。

⑫②刘西渭：《（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

⑬②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

⑭《鲁迅全集》第13卷454页。

⑮鲁迅：《呐喊·自序》。

⑯鲁迅：《自选集·自序》。

⑰周作人：《桃园·跋》。

⑱冯文炳：《竹林的故事·自序》。

⑲凌宇：《从〈桃园〉看废名艺术风格的得失》。

作者单位：上海师大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中国古代鉴赏心理学论纲

□李建中

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的理论纲领是“心物”论。^①就创作心理而言，心与物分别指文艺创作中的主、客体；就鉴赏心理而论，则分别指接受者与文本。

一

创作发生是心感物而动，鉴赏发生亦然。不同的是，鉴赏者之心首先要识物、知物，要对艺术作品的物质媒介或形态，有内行的眼光，有识鉴的能力。否则，心就无法感物而动，鉴赏也就无法发生。

《文心雕龙》的“知音篇”，是中国文艺心理学史上的第一部“鉴赏心理”专论。刘勰对鉴赏能力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有丰富的“阅历”（即鉴赏经历），所谓：“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欣赏者在无数次的鉴赏活动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欣赏能力，从而具备“圆照之象”、“师旷之耳”。二是要对作品的“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有深入细致的了解（这六个方面，《文心雕龙》均有专篇论述），才能“披文以入情”，才谈得上对“文”的品味，所谓“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②如果说，品乐，首先得善辨乐音之“单、复、高、埤、善、恶”；^③那么，品诗，则首先应该“性别宫商，识清浊”，^④熟谙诗歌之“宫羽”、“低昂”、“浮声”、“切响”。^⑤不解音声，则无法欣赏音乐；不懂声律，便很难欣赏诗歌。刘勰辟专篇论“声律”，以及“章句”、“丽辞”、“事类”、“练字”等属于作品物质媒介或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其主要目的当然是剖析为文之用心，但同时也为鉴赏者锻炼并提高其鉴赏能力提供了准则和参考。另外，刘勰这些“专篇”也证明他自己有着很高的鉴赏才能，是嵇康《琴赋》所赞扬的那种文艺鉴赏的“良质美手”。

刘勰以肯定的方式对欣赏者的才能提出要求，又以否定的方式论述了关于欣赏者性情的问题。《文心雕龙·知音》指出了欣赏过程中鉴赏者的三大心理障碍：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前两条是沿用旧说，第三条为论者新创。我们从第三条说起。

关于“信伪迷真”，《知音篇》举了“群卿（楼护）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咨东方朔”的例子，称楼护的“轻言负诮”，并要品文论文者吸取楼护的教训，不可“妄谈”。刘勰反对“信伪迷真”，实则是主张在文学批评与鉴赏中，主体要持一种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切忌信口雌黄。欣赏者的信伪迷真，往往有“心”与“物”两个方面的原因：就“心”（鉴赏主体）而论，是缺乏认真的态度，而在“态度”的背后，又可能是缺乏鉴别真伪的能力；就“物”（鉴赏对象）而论，是文情难鉴，真伪难辨：“鲁臣以麟为麋，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同上）欲辨难鉴之文情，欣赏者就要“心敏”、“目瞭”，这样才能避免“信伪迷真”、“深废浅售”。

“崇己抑人”，实为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典论·论文》从“文气”这一文艺心理学角度，剖析“文人相轻”的谬误。“气”，相当于心理学上的个性、气质，“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这种因人而异的个性气质，表现在作品中，就形成不同的文气。文气各异，是作品的事实，欣赏者若“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心感物之后便难以产生理想的鉴赏效果。所以，曹丕主张在鉴赏批评活动中，鉴赏主体要“审己度人”。

“贵古贱今”，是一个比“文人相轻”更古老的话题。对此谈得颇多、而且颇具心理

学意味的是葛洪。他首先指出：“贵远贱今，常人之用情也”。⑥贵远贱今，乃人之常情，也是文艺欣赏活动中，带有普遍性的心理趋向。《抱朴子·钧世》分析了“贵古贱今”的心理缘由：“或曰：古之著书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隐而难晓；今人意浅力近，故露而易见。以此易见，比彼难晓，犹沟洫之方江河，螳蛸之并嵩岱矣。”心理学认为：认知主体对于自己的认识对象，常因其认知的难易程度而决定对象的高低优劣，这是一种心理定势，贵古贱今之所以成为文艺鉴赏中一种经久不衰的心理现象，其心理学根源也正在于此。一旦弄清了贵古贱今的心理根源，便不难看出其谬误之处。葛洪指出：“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同上）可见，古书的“难晓”主要是由历史的原因所造成，并非古人故作艰深。因此，“难晓”不能成为才大而足尊的理由；同样，“易见”也不能成为意浅而足贱的根据。葛洪还谈到鉴赏活动中的另一种心理定势，它与贵古贱今可谓貌异神同。《西京杂记》卷三记庆虬之“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知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太见重于世”。才秀人微之辈，欲使作品受人赏识，或假托名士之名，或求名士为其名价。而欣赏者品评作品优劣，不看作品善与不善，只看其署名（或荐者）有名无名，我们且将这种鉴赏心理称为“名士效应”，也是文艺鉴赏中一种普遍的心理偏向。

对于鉴赏品评者来说，一方面，要有“识器”、“晓声”、“善辨音律”、“妙达此旨”的欣赏才能；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信伪迷真”、“崇己抑人”、“贵远贱近”、“贵古贱今”和“名士效应”等心理障碍。才与性双优，鉴赏者才能“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⑦才能产生真正的批评与鉴赏。可见在鉴赏活动中，鉴赏主体之“心”（包括性情与才能）有着何其重要的地位和主导作用。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对鉴赏者才性的要求，既表现出对“心”的重视，同时也表现出对“物”的重视。这是因为：其一，所谓鉴赏才能，归根到底是对作品之“物”的认知、识鉴能力，是对作品物质媒介和艺术形式的把握与谙练，没有这种谙练，鉴赏便无从谈起——这实际上是从“心”的角度，说明作品之“物”在欣赏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其二，欣

赏者的诸多心理障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视或轻视“物”的客观存在，不是从“物”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囿于一己之心理偏见，或者不辨“物”之虚实真伪而“信伪迷真”，或者不晓“物”之风格差异而“崇己抑人”，或者不识“物”之历史变迁而“贵古贱今”，或者不问“物”之高低优劣而醉心于“名人效应”……

心物并重，是中国古代鉴赏心理学的基本特征，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才有了“心物同构”和“心物一体”的鉴赏心理学思想。

二

中国古代的创作心理学，有重“心”（心造）、重“物”（物感）与重“心物关系”（心物赠答）的三派；⑧鉴赏心理学亦大致有这三种趋向。前面论述的关于对鉴赏主体之“才性”的要求，既表现出重“心”（重欣赏者的才能与性情）的一面，同时也包含重“物”（重艺术作品的物质媒介与客观存在）的一面。

创作心理的“心物赠答”论，其理论兴趣在于心与物之间的双边关系；同样，鉴赏心理学的“第三派”，看重的也是心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有着“同构”与“一体”的区别。对此，我们来分别论述：先谈以嵇康为代表的“心物同构”，再谈以钟嵘为代表的“心物一体”。

嵇康主要是在其音乐鉴赏理论中表现出心物同构的心理学思想。《琴赋》有云：“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无论是作为音乐的鉴赏者和创造者，还是作为音乐的美学家和心理学家，嵇康都无愧于“至人”的称号，他的鉴赏理论，是建筑在丰富的鉴赏实践与高超的鉴赏才能之基础上的。他十分看重音乐作品的物质构成（亦即能为人心所感知的诸种音乐要素，如节奏、旋律、和声、音色，等等），《琴赋》不仅细致地分析了音乐的感觉要素，生动地描绘了音乐的听觉形象，而且追溯了乐器（琴）的物质起源及其构成。同时，嵇康又看重鉴赏主体之“心”在音乐鉴赏者中的主导作用，《琴赋》指出，同一首乐曲，在具有不同情感状态的鉴赏者中间，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心理效应。嵇康音乐鉴赏理论的主体意识（重“心”）与善辨音律（重“物”），分别体现出魏晋“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构成了他“心物同构”论的思想基础。

嵇康主张“声无哀乐”，提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⑨但他并未将“心”与“声”一刀两断，《琴赋》就谈到音乐的感觉要素如何引发鉴赏者的心理效应。《声无哀乐论》虽然不无偏颇地否认音乐之情感内容的存在，但又以知音者的眼光看到了音乐的感觉要素或形式结构与鉴赏者心理或情绪结构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这一点，可以从嵇康列举的四个例子中看出：“琵琶箏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更形而志越。……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听静而心闲也。……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少，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故欢放而欲愜。”不同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或者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乐曲，引起鉴赏者不同的心理效应。嵇康作出如下结论：“（五音）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专散为应。”^⑩上面的四个例子，实际上是讲人情的“躁、静、专、散”，分别与乐曲的“高、埤、单、复”一一对应，其中蕴藏着深刻的音乐心理学思想。完形心理学提出“整体性”与“同形论”，前者指知觉首先是整体知觉而非元素的集合；后者指客体有组织的经验事实，与对应的大脑皮层过程之间，存在着结构中的相似或同型。比如，嵇康所说的“高”，实则为听者对乐音的有组织的经验事实（亦即形式结构）的整体性把握，它具体表现为发音短促、声调高亢、旋律多变、节奏偏快，等等；同理，“躁”，则是对一种特定的大脑皮层过程（亦即情绪结构）的整体性把握，它表现为形态的躁动不安、心志的激越亢奋。作为音乐形象的“高”，与作为情绪形态的“躁”，存在着结构上的同型，正是因为这种鉴赏之“心”与艺术作品之“物”之间的“异质同构”，二者方能“对应”：音乐之“高”引发人情之“躁”，人情之“躁”呼应音乐之“高”。“埤”与“静”，“单”与“专”，“复”与“散”的一一对应，也是同样的道理。

完形心理学将对象（物）和主体（心）的形式结构及其运动，都视为“力的式样”，而所谓心物间的异质同构，也就是双方“力的式样”，在结构上达到同样复杂的水平。美国心理学家阿恩海姆曾让一组舞蹈学院的学生用动作表现“悲哀”，结果所有被试的动作都一样：缓慢、幅度小、造形呈曲线，

等等。^⑪缓慢、柔软的舞蹈动作，本身并不具有悲哀的性质，之所以能“表现”（实则为“唤起”）悲哀，是因为表演者动作之“慢”，与观赏者情感之“哀”，在“力的式样”（或形式结构）上，存在着相似或同型的关系。《声无哀乐论》所描述的“躁静专散”与“高埤单复”的一一对应，其心理学缘由正在于此。站在这样一个理论高度，再来看嵇康的“声无哀乐”，便会发现其中含有“心物同构”的心理学思想。声虽无“哀乐”，但有“自然之和”，亦即有完整的形式结构，鉴赏者的审美情感或心理效应，就源于对此“完形”（即“格式塔”）的整体性观照和把握。

嵇康的“心物同构”思想，对后世有着无形的影响。明代王廷相也谈到过“心物同构”：“喜怒哀乐，其理在物；所以喜怒哀乐，其情在我，合内外而一之道也。在物者感我之机，在我者应物之实。不可执以为物，亦不可执以为我，故内外合而言之，方为道真。”^⑫“物”之理与我之“情”有相通之处，故能“合内外而一”。物，“感我之机”；我，“应物之实”。二者是相互交流的，是平等的，我们不能执于一端，而应“合而言之”。王廷相的“心物感应观”，不仅讲心物间的双向思维，而且讲心物间的相互渗透、内外相合。袁中道有一篇《爽籁亭记》讲，他去玉泉之畔听泉声，开始，他“气浮意嚣，耳与泉不深入，风柯谷鸟，犹得而乱之”。后来，他“瞑而息焉”，收视返听，将精气神灵贯注于泉水之中，就再也听不到风啸鸟鸣，而只感受到“泉之变态百出”。再往后，那泉水已不再流淌到岩石上，而是不知不觉地“入吾耳”、“注吾心”，以致“萧然泠然，浣濯肺腑”。至此，他再也分不清哪是泉溅山涧的喧哗，哪是神返空寂的静谧……这种非我非物、物我两忘的情境，表明心与物通过相互交流和渗透，而在美学的高度上融为一体。对鉴赏者来说，这是他面对一部作品所能再造出来的最佳境界。

三

中国古代文论家欣赏自然之美的这种“心物一体”，同样表现在对文学艺术之美的欣赏中。这种“心物一体”的鉴赏心理学思想，在钟嵘《诗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整体上看，《诗品》采用的是“溯流别”、“第高下”的方法；在对具体诗作鉴赏与批评中，却时常显示出两种“心物一体”的思

想倾向：一是鉴赏过程中的“味诗法”，一是文字表述上的“意象法”。

钟嵘主张诗要“有滋味”，认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⑬作诗者，诗要作得有味，赏诗者，则要去味诗。从心物关系的角度看，味诗不同于品诗。品诗之时，心与物相对待，心是心，物是物，心有其公正态度（所谓“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物有其客观标准（所谓“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味诗之际，心与物相交融，心移情于物，物早入吾心，标准、态度退居其次，而让情绪、感悟占了上风。陶渊明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其心没有去对物作冷静、客观的评价，而是体悟诗之味，意会诗之妙。钟嵘论创作心理，反对声律、用典，主张“直寻”（所谓“即目”、“所见”）。这种直寻，表现在鉴赏心理中，便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妙悟。“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⑭只有“动心”而“味”，方能透过作品的物质外观而领会其言内之意，方能体验到作品美之精髓与真谛。与此同时，鉴赏者也在味诗之中获得极大的心理快感与情感愉悦。

味诗的过程及其结果，需要用文字来表达。《诗品》对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对一己之鉴赏心得的传达，用的大多不是概念化语言，而是意象性描述：将鉴赏者之“意”蕴于生动、具体的形象之中，使意与象会、心与物谐，以意象来记录味诗的结果。如卷中评范云、丘迟诗：“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这种意象式的评点，借用新颖别致的比喻、绮丽生动的形象，来传诗之神，尽诗之妙，表达味诗者之意。钟嵘评点文字中的意象，本身就具有美的特征，而意象之美，对于作品自身的美来说，可谓“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鉴赏活动中的“心物一体”，以“味诗”为方法，以“意象”为结果，表现出一种鉴赏过程中的心理快感，而这种快感又建立在心与物的熟谙深识、心领神会的基础之上。《文心雕龙·知音篇》这样描绘知音者的心理快感：“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知音知音，其乐无穷！

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古代鉴赏心理学的三大流派：心物并重、心物同构、心

物一体，都是在汉代“以物治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以物治心”的扬弃或否定。

班固《汉书·礼乐志》谈到音乐可以“善民心”，这是直接继承先秦《乐记》关于圣人“致乐以治心”的理论传统。欣赏文艺作品，其目的是“以物治心”，以作品之物治人之善心。“以物治心”，一方面过分夸大文艺作品的教化作用：诗或乐不仅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甚至足以导致“政和”、“政乖”、“民困”；另一方面又过分贬低鉴赏主体的能动作用：鉴赏者只需要被动地接受“拯治”就足够了。《毛诗正义》：“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读书如服药，其目的是“以物（诗）治心”。

魏晋以降，儒家诗教受到冲击，鉴赏心理之中，其政教意味日渐淡化，其美学意味日趋浓郁。比如，看重鉴赏者之“心”的能动主导作用，强调主体意识和看重被品之“物”，强调善辨音律，就分别与汉代“以物治心”论的贬低主体之“心”的能动作用和夸大作品之“物”的教化作用，一一对峙。就心物关系而论，“以物治心”是从政教伦理角度着眼，看重心与物在教化、伦理层面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多半是牵强附会、人为制造的。比如，《毛诗序》的作者，硬是从诗经的爱情篇什中找出“后妃之德”。而“心物同构”与“心物一体”，则是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出发，在深潜的心理层次找到的“心”与“物”的联结点与融汇之处，从而使鉴赏者获得“欢然内怿”、“欣然忘食”的审美愉悦和心理快感。

①参见拙文《心物——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大纲》，《学术月刊》1991年第1期。

②⑦《文心雕龙·知音篇》。

③⑨⑩嵇康《声无哀乐论》，见戴明扬《嵇康集校注》第196—2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④见《宋书·范曄传》。

⑤《宋书·谢灵运传论》。

⑥见《抱朴子·广譬》。

⑧参见拙文《从品评才性到精析文心》，《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

⑪参见〔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尧等译《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⑫《雅述上篇》。

⑬⑭见钟嵘《诗品序》。 责任编辑：陶原珂

岭南以词论名家者，陈洵是屈指可数的一个。陈字述叔，号海绉，广东新会人，生于1871年，卒于1942年。尝以词见知于朱孝藏，与朱及况周颐等人交往，后因朱氏力荐，入中山大学任词学教授，遂有名于广东。所著《海绉说词》，先后收入朱孝藏的《沧海遗音集》和唐圭璋的《词话丛编》，传于世。

《海绉说词》，如作者自言，是源于周止庵（济）《宋四家词选》的思路，根据自己学习过程中的心得，进行修正的一个结果：

“周止庵立周、辛、吴、王四家，善矣。惟师说虽具，统系未明，疑于传授家法或未洽也。吾意则以周、吴为师，余子为友，使周、吴有定尊，然后余子可取益。于师有未达则博求之友，于友有未安则还质之师。如此，则系统明，而源流分合之故亦从可识矣。”（通论：师周吴）

“吾年三十，始学为词，读周氏《四家词选》，即欲从事于美成。乃求之于美成，而美成不可见也；求之于稼轩，而美成不可见也；求之于碧山，而美成不可见也；于是专求之于梦窗，然后得之。因知学词者由梦窗以窥美成，犹学诗者由义山以窥少陵，皆涂辙之至正者也。今吾立周、吴为师，退辛、王为友，虽若与周氏小有异同，而实本周氏之意，渊源所自，不敢诬也。”（同上）

陈洵的词论，虽然是继承周济的，但从词风方面，他指出四家之中，周邦彦与吴文英才是真正互通，却是更为深入和细致的见

解。这一见解，前人本来也有提及，如宋尹焕已比吴于周，沈义父更说吴“深得清真之妙”；（《乐府指迷》）下及清代，则前有《四库提要》的“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的评论，后有冯煦的“商隐

学老杜，亦如文英之学清真也”的发挥。（《蒿庵论词》）但是，由于陈氏并未止于诸贤的片言只语、静态品评，而是通过对四家词尤其是周、吴词的独立钻研，深入一步，将自己的认识植根于具体作品的剖析和艺术手法的归纳，而显得十分坚实。这样，“推尊周吴，由吴希周”的治词途径，便成为陈洵词论的一个独特的纲领。

二

《海绉说词》分为“通论”与“说词”两部分。“通论”部分，其实就是论“推尊周吴，由吴希周”这个纲领的。但陈氏不善作论，兼短于理论思维，所以，乍看起来，除沿袭清代词论的主流（正统）观点之外，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如果从倡导词风而论，我们甚至要说，陈

氏贬退辛、王，推崇梦窗，较周济之标举四家，其堂庑更为偏隘，实不足取。不过，如上所言，陈说踏实，属于“微观研究”，与蹈虚之“宏观研究”是大异其趣的。平心言之，“通论”的价值，是在陈氏学梦窗的心得，即“贵拙”、“贵留”和“襟度”等几个要点：

“唐五代令词极有拙致，北宋犹近之。南渡以后，虽极名隽，而气质不逮矣。昔朱复古善弹琴，言：‘琴须带拙声，若太巧，即与筝、阮何异？’此意愿与声家参之。”（贵拙）

《海绉说词》研究

○刘斯翰

“词笔莫妙于留。盖能留，则不尽而有余味，离合顺逆皆可随意指挥，而沉深浑厚皆由此得。虽以稼轩之纵横而不流于悍疾，则能留故也。”（贵留）

“清真不肯附和祥瑞，梦窗不肯攀援藩邸，襟度既同，自然玄契。《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襟度）

其中“襟度”一点，是关于作者的人格。这大抵因为四家之中，稼轩之爱国著于青史而见乎篇什，固不待言；即以碧山论，其颠沛于南宋覆亡前后，词亦多有“君国之忧”（张惠言《词选》）与“感时伤世之言”（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相较之下，周、吴作品的思想内容不免要显得空泛和贫乏，所以陈洵拈出“襟度”二字，以清真之清醒与梦窗之自尊，来肯定他们的人格。

至于“贵拙”一点，陈洵之意，是用来概括（推崇）一代词风的。“拙”或称“拙致”，在这里乃是相对于“巧”而言的。不过，陈洵的“拙致”却又非质朴一路，他所指的唐五代令词，众所周知是极浓丽香艳的。这从他评吴文英《声声慢》词亦可见出。他称为“有拙致”的八字乃是——“檀栾金碧，婀娜蓬莱”。世病梦窗词藻饰过甚，陈氏“贵拙”不无为之开脱的意味。

最有价值的、内容也最丰富的是“贵留”。这是陈洵学梦窗词的主要心得所在。他在“通论”部分特别列“以留求梦窗”条，强调其意义：

“以涩求梦窗，不如以留求梦窗。见为涩者，以用事下语处求之；见为留者，以命意运笔中得之也。以涩求梦窗，即免于晦，亦不过极意研练丽密止矣，是学梦窗，适得草窗。以留求梦窗，则穷高极深，一步一境。沈伯时谓梦窗深得清真之妙，盖于此得之。”

“晦涩”被人认为是梦窗词的一大缺点。例如沈义父（伯时）在《乐府指迷》中评梦窗时就说：“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而张炎则更加指摘，谓其“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乐府指迷》）陈氏既要推崇梦窗，就不能不面对这些颇具权威性的意见。他其实是不同意沈、张的批评的，但却没有断然予以否定。（按，

陈氏之反驳，见其说吴《浣溪沙（波面铜花）》词：“西子西湖，比兴常例，浅人不察，则谓觉翁晦耳。”又说《风入松（画船帘密）》词：“断续反正，脉络井井，不得其旨，则谓为晦耳。”）首先，他把“晦”与“涩”小心地剖开，加以区别：“晦”是病，不过却与梦窗词无涉，它只是学梦窗词容易导致的毛病而已；“涩”是梦窗用事下语的特点，却与“晦”大不相同，由此入手，学得好可以收“极意研练丽密”的效果，“涩”之非病是显然的。其次，陈氏又从学习的角度，对“涩”略加贬抑。他承认，如果从用事下语方面入手来学习梦窗，容易导致“晦”的毛病，而且，也只是得到一个在词藻和用事上很精致绵丽的外表，并不能学到梦窗词那种“飞沉起伏”、“穷高极深”的“大”境界，更谈不上“由吴希周”——“由大凡化”了。

在这样“辨析精微”地回答了前人的否定之辞后，陈洵就顺理成章地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以“留”代“涩”。他解释说，“留”是梦窗命意运笔的心法，是梦窗所深得的“清真之妙”，因而又是“由吴希周”的正确途径。一句话，学习梦窗词必须从“留”入手。陈氏曰：“见为留者，以命意运笔中得之也。”其所谓“留”，是指表现作者命意的一种特殊的运笔法度。这种运笔法度，简单地说，就是不把命意直说出来，而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作暗示，让读者自去领会。这种“通体离合变幻”而“细绎之字字有脉络”（《说词：〈莺啼序（残寒政欺病酒）〉》）的运笔法度，本来是从词体发展中形成的、尤其为婉约词所习用的手法，而周邦彦乃是集其大成的人物。（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清真，集大成者也。”又云：“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未能出其范围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张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至于吴梦窗，因为独能得周词的正传，又成为周以后运用此法的主要代表。“贵留”这个要点，在“说词”部分中更有丰富的演示，因为这部

分基本上就是围绕解说“留字诀”（《说词：〈瑞龙吟（章台路）〉》）的要旨来展开的。

三

“说词”顾名思义就是《海绡说词》的主体部分。它包括了“宋吴文英梦窗词”、“宋周清真片玉词”和“宋辛弃疾稼轩词”三个分题，不过选词的数量却很歧异：梦窗词选70首，片玉词选39首，而稼轩词只选2首。选梦窗词不仅多，而且其“说”也尤其用力，又编排在最前。陈洵对梦窗词情有独钟，由此可见。

如上所说，“说词”部分是致力于“留字诀”的展示，亦即周、吴词“命意运笔”法的展示的。陈洵说：“一词有一词命意所在，不得其意，则词不可读也。”（《说词：〈瑞龙吟（黯分袖）〉》）指出把握命意具有先导的作用。他在说词的过程中，每分析一词，都是通过把握作者的命意，再以之为根据去疏说其运笔法度，直至剖析全篇的脉络结构。这实乃陈氏“说词”的大法，只要记住这点，对其“说”就不难领会了。盖周、吴词的命意虽不太复杂，但因作者往往不予点明，要把握它也并非轻而易举。例如吴与一位风尘女子（所谓“去妾”）的恋情，就是陈氏从解说多首词作中发现并钩稽出来的。另一方面，在错解命意的情况下，他也曾经陷入极为荒谬的境地。例如他认为《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宴清都（绣幄鸳鸯柱）》、《高阳台（修竹凝妆）》、《三姝媚（湖山经醉惯）》、《古香慢（怨蛾坠柳）》、《惜秋华（露罥蛛丝）》等词作具有“伤宋室之衰”的“忠爱”的命意，就大都属于捕风捉影，结果虽然割裂词意，也无法自圆其说。试举《八声甘州》为例：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膩水染花腥。时汲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天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此词前有小序云：“陪庾幕诸公游灵

岩”，可知其为陪游苏州灵岩山（今属江苏吴县）的奉呈之作。相传春秋时越献西施，吴王为之建馆娃宫于灵岩，梦窗游此山，就其事而敷演，发思古之幽情。全词“一篇神理”（按，陈洵尝用此语，见《说词：〈珍珠帘（蜜沉炉暖）〉》，陈又还用“一篇精神”、“一篇之眼”、“一篇命意”等，其义皆同。）注在一个“幻”字。词的上阕，以今昔景物的反复对比，写出虚无、幻灭的主题，而下阕则以人事对比再加勾勒：吴王以沉醉而亡国，范蠡以清醒而退隐，谁又是胜利者？其沉醉与清醒又有何意义？与永恒的大自然相比，人生世事转瞬即逝，终归虚无。“问苍天无语，华发奈山青！”可谓一语飞渡，既写出范蠡胜利后的悲慨，又写出词家此日游观的感喟。以下，正写登临游赏作结，并透露出“人生苦短，不如及时行乐”的思想。词家之意本甚明白，也不难疏理，但是，当陈氏以寄托的眼光审视时，却横生许多特殊的解悟。他说：“换头三句，不过言山容水态，如吴王范蠡之醉醒耳。”把论事解释成写“山容水态”！又说：“‘苍波’（按，陈氏所本如此，但作‘苍天’或‘苍波’均无关宏旨。）承‘五湖’，‘山青’承‘宫里’，独醒无语，沉醉奈何，是此词最沉痛处。”硬把“无语”编派给范蠡（亦谓梦窗），把“奈何”编派给吴王（亦谓宋帝），连语法都不管，这样作解实在是匪夷所思！至于下文还有“更为推演”的部分：“盖惜夫差之受欺越王也。长颈之毒，蠡知之而王不知，则王醉而蠡醒矣。女真之猾，甚于勾践；北狩之辱，奇于甬东；五国城之崩，酷于卑犹位；遗民之凭吊，异于鸥夷之逍遥；而游良岳幸樊楼者，乃荒于吴宫之沉湎。北宋已矣，南渡宴安，又将岌岌。五湖倦客，今复何人？一‘倩’字有众人皆醉意，不知当时庾幕诸公何以对此！”这更是脱离文本的任意生发了。常州派在抉发唐宋词词的“微言大义”方面，喜欢脱离“知人论世”的基本事实根据，主观主义地加以引伸发挥，闹下了不少笑话。陈氏看来也未能免于这一传统的影响。

四

陈洵的“说词”，最精彩的还是“说”运

笔法度。周、吴词的运笔法度，用他的话来概括，就是“通体离合变幻”而其实“字字有脉络”。因此，他之剖析，也就著意于揭示一篇的脉络结构。他这种做法，颇类似教人作文的古文评点（如《古文观止》）之流，而与一般词话片言举要的形式全然不同。这与陈氏一生以教书为业无疑大有关系，但却也是他治词的取径和欲度人以金针的写作目的所决定的。在分析脉络结构的过程中，陈洵使用了一批术语，诸如“留”、“复”、“伸缩”、“钩勒”、“照应”、“提煞”、“脱换”、“离合顺逆”、“空际转身”、“潜气内转”、“笔笔断笔笔续”，等等。这些术语，或者是借用来的，或者是他自己创造的，而不管怎样，它们统统成了“留字诀”的运笔法之组成部分。这里，我们拈出其中使用得较多，较有概括力的几个术语，试作说明，以见陈氏之说的大要。

（一）留。其义已如前述，作为运笔之基本大法，陈氏特于说周词《瑞龙吟（章台路）》中称“留字诀”，以表出之。试举周词为例：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暗暗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黯凝伫。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陈说云：“‘访邻寻里’今，‘同时歌舞’昔，‘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今犹昔。而秋娘已去，却不说出，乃吾所谓留字诀者。于是‘吟笺赋笔’、‘露饮’‘闲步’，与‘窥户’‘约黄’、‘障袖’‘笑语’皆如在目前矣。又吾所谓‘能留，则离合顺逆皆可随意指挥’也。”由于词家不采取直说所寻之人——“旧家秋娘”——已经离开，因此才有前前后后那些回忆与想象，而使人产生如在目前的美好的错觉。所谓虚（隐藏）其实者而实（显现）其虚者，这就是“留”的主要艺术功能。留，有时亦谓将情或事藏起，留待下

边作提点。即是于此隐藏而于彼显现，故可使前后文互相照应、映发，而有脉络可寻。如吴词《齐天乐（烟波桃叶）》之说云：“中间送客一事，留作换头点睛三句，相为起伏，最是局势精奇处。”又《莺啼序（残寒政欺病酒）》之说云：“第一段伤春起，却藏过伤别，留作第三段点睛。”皆是。

（二）钩勒。此词原出于碑刻，古时以墨迹上石，必先用朱笔摹写其轮廓，称为“钩”，然后以刀镌刻，称为“勒”。词评家所用，是其反复加工之义。例如周济言：“钩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钩勒便薄，清真愈钩勒愈浑厚。”陈氏即沿用之，而又更加以发展。其说吴词《解连环（暮檐凉薄）》云：“‘未秋’‘先觉’，加一倍写，钩勒浑厚。”此所谓“加一倍写”乃是钩勒的通常手法。其说周词《夜飞鹊（河桥送人处）》云：“换头三句，钩勒浑厚。”同此。而其说《莺啼序（残寒政欺病酒）》云：“以第三段‘水乡尚寄旅’作钩勒。”又云：“‘渔灯分影’于水乡为复笔，作两番钩勒，笔力最浑厚。”此处“钩勒”则是以“点睛”作钩勒。即以“水乡尚寄旅”点明作者此时境况，并通过变换方式来反复提点之。又说《六丑（渐新鹅映柳）》云：“上阙乃全写昔之无风雨，却以‘年光旧情尽别’作钩勒。”此“钩勒”也属点睛，却是点明作者“写昔”时实有无限感怆之意。其说周词《蓦山溪（楼前疏柳）》云：“前虚后实，钩勒无迹。”则别以“虚实”为说，启示出钩勒的更多法门了。

陈氏于《说词》中还喜用一个“复”字，其实也是钩勒，用语不同而已。例如说吴词《瑞鹤仙（晴丝牵絮乱）》云：“‘流红千浪’复上阙之花飞；‘缺月孤楼，总难留燕’复上阙之人远。为‘凄断’二字钩勒。”就是以“复”为钩勒的显例。

（三）逆。陈氏尝以“离合顺逆”来概括运笔法度，而“逆”字实为其说词中使用率最高的字眼之一。逆，是指一种以时间倒错的方式叙事写情的笔法，它可使行文打破流水账的直叙式，产生曲折、顿挫、奇变的审美效果。逆，具体又分为“逆提”、“逆挽”、“逆入”、“逆出”、“逆溯”、“倒提”、

“倒卷”、“倒应”，等等。“逆提”与“倒提”为一类，谓以时间回溯的取向（所谓“逆”、“倒”）别出头绪（所谓“提”），即按时间顺序当在后面出现者而使其提前出现。

例如吴词《莺啼序（残寒政欺病酒）》一段：
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萎，瘞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渗淡尘土。

陈氏云：“‘别后’于‘临分’为逆提。”按“临分”乃别时情事，其时间顺序在前，今却置“别后”情事于前，故陈氏说“别后”是“逆提”。其说周词《花犯（粉墙底）》、《渔家傲（几日轻阴）》之“倒提”皆同。

又“逆挽”与“倒应”为一类，谓向前面相同时间区段的叙事述情之回应。例如说周词《六丑（正单衣试酒）》：“‘断红’句逆挽‘留’字，‘何由见得’逆挽‘去’字，言外有无限意思。”说吴词《解连环（思和云结）》：“‘来时’逆挽。”等均是，其意易明，不具析。“倒卷”与“逆溯”，“逆入”与“逆出”亦各自成组。前者谓叙情事在时间上的回溯，如说吴词《声声慢（檀栾金碧）》云：“人在，凝眸，瞰妆，纯用倒卷。”说周词《木兰花令（歌时宛转）》云：“‘歌时’三句，从醒后逆溯。”均是。后者谓于叙情事段落起迄处用逆溯手法，如说吴词《莺啼序（残寒政欺病酒）》云：“‘记当时短楫桃根渡’，‘记’字逆出。”说周词《过秦楼（水浴清蟾）》云：“前起逆入。”

（四）空际。陈氏说词中，“空际”（又称“空中”）是使用率仅次于“逆”的术语。所谓“空际”，其义有三：一是指所写非眼前情事景物，如说《霜花腴（翠微路窄）》之“于空际作奇重之笔”，说《澡兰香（盘丝系腕）》之“纯是空中设景”，说《瑞龙吟（黯

分袖）》之“设景设情，皆是空际存想”，说《莺啼序（横塘棹穿艳锦）》与周词《解连环（怨怀无托）》之“空际盘旋”，这一种最多、最普遍，可以说是“空际”的基本义；二是指言在此而意在彼，亦所谓“以人事入风景，则实处皆空”，如说吴词《绛都春（情黏舞线）》之“空际取神”，说《齐天乐（烟波桃叶）》之“空际出力”《丁香结（香裊红霏）》之“置身空际，独往独来，大起大落”，即指此种，因为作者只是借所描述的情事景物来映射（隐喻）他的本意，所以其“用力”处、“取神”处、“置身”处都是在所描述者（所谓“实处”）之外（所谓“空际”），而这可说是一种引申义；三是指通过时空转换来实现的感情或意向的逆转，这一种特称为“空际转身”，如说吴词《齐天乐（谷尘犹沁）》与《高阳台（宫粉雕痕）》，便是如此。试举后一首为例：

宫粉雕痕，仙云堕影，无人野水荒湾。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半飘零，庭上黄昏，月冷阑干。（后略）

此词题为“落梅”，“宫粉”以下至“连环”是对落梅的正面描写，但接下去时，时空陡然转换，由“野水荒湾”变为“南楼”，对落梅也从正面描写转为侧面烘托了（按，“吹横笛”实隐指笛曲《梅花落》），故陈氏之说云：“‘南楼’七字，空际转身，是觉翁神力独运处。”

以上研究可以见出，陈氏虽然只是集中深入解剖了一个吴梦窗，其实已经涉及了整个婉约派词的艺术。因此，认真总结并吸取陈氏这笔遗产，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婉约派词，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也是《海绡说词》的独特词学贡献之所在。

作者单位：广东《学术研究》杂志社
责任编辑：陶原珂

小议潮汕方言的宏观研究

○詹伯慧

潮汕方言无疑是汉语方言中既古老而又很有特色的一种。对这样一种方言,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已经引起人们注意,有人为它编纂方言词典了。早期对潮汕方言感兴趣的首先是西洋传教士,1847年曼谷教会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由GODDARD JOSIAH编的《汉英潮州方言字典》,大概要算是最早的一部潮汕方言工具书了。接下来又有几本以“十五音”命名的潮汕方言著述陆续出现,如1913年张世珍编的《潮声十五音》、1915年江夏懋亭氏编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全本》、1921年蒋儒林编的《潮音十五音四卷》等,此后,以十五音为纲而编纂出来的一些潮音字(词)典接踵而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先后问世的达十多本。作为粤东“八邑”的地方方言,能有这么多供方言区人民学习、应用的工具书编出来,这在汉语方言中,是不多见的。当然,光有这类工具书出现还不能说明潮汕方言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了,用心探索潮语的内蕴、著力揭示潮语风貌的著作,到了本世纪30年代才陆续出现。尽管1926年刘声鐸就已发表了《潮州方音之研究》,但1932年陈恺发表的《潮语罗马字》,1934—1935年黄际遇发表的《潮州八声误读表说》和1936年谭平章发表的《潮音字类辨正》等才接二连三地把潮汕方言的研究逐步引向正确认识潮语、剖析潮语的轨道上来。1943年翁辉东仿效章太炎《新方言》的体例编撰的《潮汕方言》一书,对上千个潮汕方言词语进行考证探源,可说是一部有相当份量的专著,对潮汕文化的研究很有价值,只可惜翁氏此书考古稽今,属于传统“小学”研究的范畴,尚未能将潮汕方言进行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描

写和剖析,书中的考证良莠不齐,牵强附会亦在所难免。真正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剖析潮汕方言,还是在5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众所周知,为了配合新中国开展的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等重大语文建设工作,50年代中期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了汉语方言的调查,有几位潮籍的语言工作者,如黄家教、詹伯慧、李永明、李新魁等,便著力于潮汕方言的调查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几本(篇)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记录、整理潮汕方言的著述,这才打破了翁氏《潮汕方言》问世以后十多年来潮汕方言研究沉寂的局面,开始把潮汕方言的调查研究推上一个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合的新台阶。遗憾的是好景不常,起步不久的这一潮汕方言研究新局面,随着“十年动乱”的来临,在神州大地学术事业“万马齐喑”的形势下,也就无以再继了。这十来年间,倒是幸免于“动乱”干扰的香港潮籍学者林莲仙、蔡俊明等,怀著弘扬潮文化的宏旨,勤奋耕耘、潜心钻研,写出了几部很有价值的潮语著作来,多少弥补了一点潮汕方言研究中辍的损失。而真正称得上“热闹起来”的潮语研究之风,却是80年代以后这十来年的事。特别是最近五、六年,随着汕头大学的建成,在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和汕头市语言学会等学术团体的推动下和海内外汉语方言研究日趋活跃,尤其是闽方言研究蓬勃发展形势的影响下,潮汕方言才普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长年跟潮汕方言结缘的语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纷纷加入到研究潮汕方言的队伍中来,从事潮汕戏曲、民间文学研究的文艺工作者也有一部分表现出对潮汕方言研究的浓厚兴趣。他们或搜集民间俚俗词语,整

理研究潮语词汇,编纂方言词典;或记录调查潮语语音,描写分析潮汕方音特点;或溯求潮汕方言的古词本字,考证潮语源流,各抒所长,各有著述。据林伦伦《广东闽方言研究述评》一文所列举的资料,从1847年到1992年,粤东闽方言(潮汕方言)的研究成果,包括工具书、专著和单篇论文,共有156项,而其中在1979年以后发表的就115项,占了总数的75%,可见潮汕方言的研究,尽管历史很长,而真正“丰收”,还是在这十来年间。在仔细分析这些项目以后,我发现了以下几点事实:

(1) 156个项目中专著共41部,其中工具书一类近30部,而属于潮汕方言的描写、分析、考证以及对比研究等方面的只有十部左右;在单篇论文115项中,语音方面45篇,词汇语法加起来53篇,其余如论述潮汕方言的形成发展,潮汕方言与人文历史、文化、民俗、文学等方面的共有17篇。

(2) 在156项研究成果中,绝大部分以汕头话或潮州话作为调查对象,一些概述潮汕方言的论著,凡标以“潮汕方言”或“潮州方言”的,也都是拿汕头话或潮州话作代表来论述。“八邑”中其他地方的潮语,研究成果寥寥无几。除了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张盛裕深入调查研究自己家乡潮阳方言多年,连续发表多篇描写潮阳方言的论文以外,只见到过三两篇关于揭阳话和海丰话的论文(海丰话属潮语系统,但海丰不在“八邑”之列)。近期本人受家乡地方志办公室之托,对饶平方言作了一些调查,写了一篇粗略的调查报告,已在《方言》杂志上刊出,这样饶平方言也算有了一个初步的记录。此外,普宁、惠来、南澳等县(市),则迄今未见有反映当地潮语情况的论著发表。

(3) 近几年来出版、发表的潮汕方言著述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是潮汕方言词语的收集、整理和考证。蔡俊明的《潮州方言词汇》(香港中文大学1991年)、林伦伦的《汕头方言词汇》(《方言》1991—1992年刊出)和李新魁、林伦伦合著的《潮汕方言词考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三项著述对潮汕方言词汇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分别从描写、对比和探源的角度进行研究,为潮汕方言词汇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反映出潮汕方言的研究在早期只着眼于“十五音”的阐述和通俗字(词)典编纂的基础上,正转入到一个全面收集方言词语、全面进行整理分析、考证探源的阶段,研究水平无疑已经大大提高。

纵观潮汕方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明显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小面积单点研究较多而大面积区域性研究较少;个别语言现象研究较多而综合语言现象研究较少;微观研究较多而宏观研究较少。这些年来,无论是方音的研究还是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的研究,无疑都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特别是汕头、潮州两地的潮语,经过这许多年来海内外学者的努力,语音、词汇、语法的面貌和一些明显的特征,基本上都已眉目清晰了。潮阳、海丰两地潮语,由于得到几位在当地出生、长大的语言学家的努力,也已经明显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当前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多从整体上、宏观上考虑问题,例如:潮汕方言的整体面貌如何?潮汕方言内部如何分区?各地潮语如何归类?潮汕各地方言有哪些主要的异同?潮汕方言与邻近闽南地区以及其它地区的闽方言关系如何?潮汕方言的代表点和标准音如何确立?潮汕方言地图如何绘制?潮汕方言词典如何编得更好?“本字”和“俗字”问题如何处理?还有:潮汕方言与潮汕民俗、潮汕话与潮剧,如此等等,一大堆的课题,有的已有人触及过,如李永明几年前就曾通过粗略的调查写出了《潮州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1986)一文,根据语音的比较,具体设计了一套潮汕方言分区的“三分法”,引起人们的瞩目和讨论。而大多数的课题目前仍处于有待思考和解决的阶段。

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开展宏观的潮汕方言研究,宜抓紧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尽快组织一批熟谙潮语的语文工作者,对通行潮汕方言的每个县(市)进行逐一的调查。这一工作应视为当地重要的文教建设内容,应和地方志的编纂及弘扬乡土文化的工作结合起来。调查人员应能熟练运用现代方言调查方法,以语文专业人士为骨干。汕头大学、韩山师专、汕头教育学院等高等学校应是潮汕方言调查的主要力量,汕头语言学会及潮汕方言研究会应充分发挥组织、指导、协调的作用,广东省中国语言

学会也应关怀、支持潮汕方言研究工作的开展,尽可能动员、组织语言专业人员较多的广州几所大学有关学者参与此项调查工作。这一逐市逐县全面铺开的潮汕方言调查,目标是在三五年内搞清各地潮语情况,编写出每县(市)一册的《XX县(市)方言调查报告》或《XX县(市)方言概况》。

2. 在逐县逐市调查潮汕方言的基础上,组织潮语专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编写各县(市)方言字音和方言词汇对照表,并根据各县市调查结果,以各县市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异同为依据,确定潮汕方言内部的分区和归类,绘制出能科学反映潮汕方言的特点和分布的潮汕方言地图来。

3. 开展对潮州方言正音问题和用字问题的讨论和审订,通过研究,对潮汕方言的代表点和标准音求得共识,然后着手编纂有较高权威的潮汕方言规范词典,《词典》在定音、用字方面都要发挥规范的作用。要注意吸收《十五音》以来业已编就的潮语字(词)典的成果,做到有所继承,有所发展,使新编的字(词)典既能准确反映长期以来潮汕方言的丰硕成果,又能为海内外潮籍人士所乐于遵循使用。一部高质量的潮汕方言词典,无疑将为深入开展潮汕文化研究提供完美的语言依据。

作者单位: 广州暨南大学

责任编辑: 陶原珂

《诗经》“终三十里”究竟是多少

□张 剑

《诗经·周颂·噫嘻》有:“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其中的“终三十里”,等于说“终(方)三十里”,这是古汉语表示面积数时省略“方”字的一种特殊形式。

然而,郭锡良《古代汉语》(下册第912页)释道:“终,竟,指全部。三十里,指三十平方里面积私田。据郑玄笺,万夫(一万人)所耕之田共三十三平方里多,这里说‘三十里’只是举其成数。”这个解释是有偏差的。

首先,郭所引郑笺的话欠准确。郑笺的原话是:“计此万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耕言三十里者,举其成数。”(见《皇清经解续编》卷七十五下)郑笺与郭说之间,除了“三十三里少半里”与“三十三里多”的误差之外,更重要的是将“方”解释为“平方”很不妥当。古汉语中表示面积数的“方”,并不等于数学中的“平方”。在上古数学里,还没有“平方”的概念。因此,不能把古汉语表示面积的“方+数词+量词”或省略“方”字只用“数词+量词”的格式,跟现代汉语计算面积的“数词+平方+量词”的格式等同看待。古汉语中表示面积的

“方”,是指正方形的边长;现代数学中的“平方”则是指一个数自乘之积的单位,二者的含义完全不同。

其次,古汉语中的“方多少里”跟现代数学中的“多少平方里”所表示的数值也是截然不同的。譬如《墨子·公输》:“宋之地,方五百里。”“方五百里”并不等于“五百平方里”,而是说把宋国的全部国土面积,将曲取直,按正方形计算,其每边的长度为五百里。《辞海》释:“方,纵横。”那么,“方五百里”就应该是“纵横五百里”,亦即“纵五百里,横五百里”,就是25万平方里,是“五百平方里”的五倍。否则,如果释成“五百平方里”,宋国的国土面积就只有纵横不到23里那么一小块了,步行两小时就可横穿全国,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与历史图册记载中宋国国土的实际大小也不相符。同理,“终三十里”即“共方三十里”,应该解释为纵三十里乘以横三十里,等于九百平方里;合计三十三万七千五百亩,约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万亩;农夫一万人耕种,每人平均二十亩。

作者单位: 甘肃庆阳师专中文系

责任编辑: 陶原珂

试论高校专业图书馆的用户研究

□林秀玉

在发挥图书馆的功能和作用中,积极开展用户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根据我国高校图书馆工作条例,高校专业图书馆(或资料室)的职责是负责本专业书刊的保管和阅览,并着重进行专业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开展情报服务。专业图书馆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相对固定的用户群,这既使开展用户研究有其迫切性,也为对用户进行持久的跟踪研究和服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本文结合我们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图书馆的实践经验,谈谈高校专业图书馆开展用户研究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开展用户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在图书馆学中,“读者”这一概念与阅读和利用文献资源有直接联系。“用户”这一概念源于情报学领域,它指的是一般的科学情报的使用者,可以定义为:“在实践活动中获得并使用情报的个人或团体。”“用户”这一概念应用到图书馆学领域,则称作“图书馆用户”或“图书情报机构用户。”人们一直把图书馆用户作为一个综合体来进行研究。我们在进行用户研究时,必须考虑到它的情报活动、情报需求,还须考虑到它自身的特点和工作性质,因为后者将促进用户进行情报活动,产生情报需求。

开展用户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合适的图书馆和情报服务,提供更广泛、更多样化、

更适合需要的文献资料,同时更有效地使用户产生对文献资料的需求,从而使图书馆日益完善其基本职能。

实践证明,专业图书馆只有积极开展用户研究,才能有针对性地确定其服务工作的目标、效率需要;用户研究的成果,可以作为馆内发展以及物质设施申请预算的依据;图书馆通过开展用户研究,可以增进他们对自己工作的了解认识与工作能力,开阔视野,提高他们的职务资格;通过用户研究,还可以增进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联络沟通,争取用户对图书馆各方面工作的支持。在当代世界各国图书馆系统,用户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我国,这项工作也正在引起注意和重视。

二、用户研究的内容

(一) 用户素质的研究。

用户的素质,包括用户从事的专业、担任的职务、学历及技术职称状况、外语水平等,是决定情报需求的最主要因素,它决定了图书馆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和性质。对于高校专业图书馆来说,用户的类型主要是科研人员、教学人员、技术推广者、行政管理者。前三类人员代表着用户的主体。用户中相当一部分是高级职称科教人员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大多数用户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一些老教师尤其是50、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具有俄语阅读能力,而掌握日语的多数是留日或曾到日本进修归来的专家、学者。我院图书馆留意到哪些用户懂哪门外语,再根据其专业及研究课题有选择有针对性地选购他们所需要的外文书刊,较好地满足了各种用户的需求。据统计,我院图书馆的书刊满足率在70%以上。

(二) 用户需求的了解与预测。

由于信息量的剧增,越来越多的用户苦于花费过多的时间来检索、利用资料,热诚地希望图书馆员能提供有针对性的咨询。这就要求图书馆员能够预测众多用户的需求。这种要求赋予了专业图书馆员在知识的海洋中导引和调节媒介的职能,要求他们能够将特定的情报,从馆藏中提供给需求的用

户。为了使图书馆不落后于发展迅速的科学技术,并且能有效地应付社会变化及信息爆炸,专业图书馆员还必须了解本专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用户的需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研究:

1. 用户的图书情报意识。哪些用户经常利用本馆的藏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本馆的藏书,对本馆及其工作内容的了解程度如何,对本馆提供的信息及服务的反应怎样,哪些用户对本馆提过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等,都是用户情报意识的反映。美国情报学家 M·Voigt 对北欧科学家调查后,认为他们主要在三种情况下有情报(信息)意识,即:(1)当需要了解有关他们本专业和相关学科最新成果情况时;(2)日常工作中需要一些数字、方法和设计方面的事实性资料时;(3)进行研究完成撰写论文需要参考文献时。

2. 对文献内容的需求状况。科研人员研究面较为窄小,一般是一门学科的某一课题,要求资料专而深。由于他们必须随时掌握本学科的发展情况、发展趋势、探索性的活动消息等,所以资料需求特别“全”。此外,期刊是他们发表研究成果的工具,也是交流获得知识和了解情况的主要工具,因此,他们更多地需要期刊。管理干部及技术推广人员需要的情报范围广泛,涉及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环境市场以及世界上相关学科行业科研单位与企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他们更多地需要三次文献。我院图书馆对本院师生和科研人员负责的数十个课题和研究方向,包括对每个课题的负责人、课题的进展、成果等,都尽量了解,以便在选购书刊时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尤其是重点课题的需求。

3. 对文献类型的需求状况。从图书的文种来看,目前图书馆的文献类型有:中文图书、中文期刊、外文图书、外文期刊等。从图书载体来看,可以分为书本型、电子出版物等,目前很多图书馆尚未引进电子出版物或引进的不多。从文献的收集加工来看,可以分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等。

一般来说,高校本科生和低年级研究生常利用中文图书和中文期刊,高年级研究生及高级职称科研人员较多利用外文期刊。在外文书刊中,尤以利用西文书刊最多,其次是日文、俄文书刊。此外,二次文献是用户取得知识信息的重要工具,是用户常用的文献,如题录、文摘、索引等。我院图书馆收藏的《美国化学文摘》(CA)、《贝尔斯登有机化合物手册》等,是利用率极高的文献,无论经费多么紧张,我们都一直设法保持这些文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4. 对文献服务类型的选择。高校专业图书馆服务类型一般有:提供一次文献等原始信息的服务,如外借、阅览、复制等;提供二次文献服务,如回溯检索、定题服务等;提供三次文献服务,如综述、数据、建议等。三种服务类型我们都提供,不过,目前多数读者选择第一种类型。

情报需求是经常变化的,而且是发展的,因为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知识结构在变化,情报需求自然也相应地变化发展。情报需求虽在变化发展,但信息内容前后多有联系,因而又是可以研究预见的。因此,我们研究情报需求,不但要注意当前,而且更要立足于未来,立足于即将开始的事业。早在1993年,我院图书馆就获悉我院即将设立材料化学专业及精细陶瓷化学专业,并将于1994年起开始招生。从那时起,我们在藏书建设方面为这两个专业做准备,因而获得了主动。

(三) 用户情报活动的参与。

高校专业图书馆要充分了解用户的情报需求,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参与用户的情报活动,积极主动地为本专业的科学研究提供优质服务。选题是科研工作极为重要的环节,专业图书馆为科研选题提供参考依据,将会使科研工作少走许多弯路。选题确定后,专业图书馆还可以在查阅资料等整个科研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些年来,我院图书馆积极参与用户情报活动,其成果“资料情报为教学服务”、“图书资料工作为学科建设服务”分别获中山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我们开展的主要工

作有：(1) 为教师编写教材提供参考资料。(2) 指定人员亲自参加《分析化学实验》、《广东省科技志·化学章》等教材或专著的编写。(3) 介绍优秀教材，积极参加教材评价和研究以及各种学术活动，如学术报告会等。(4) 为更新教学内容服务。将现刊上与基础课教学内容有关的新观点、新知识、新方法、新材料等，制成卡片提供给有关教师。(5) 与信息人员的专长相结合，选择“人工细胞膜”课题作为定题服务对象，并协助该课题组负责人开展各项有成效的工作。该课题获 1991 年广东省重点科技研究开发项目。(6) 为专家收集、整理研究成果。

实践表明，“参与型”服务是最高层次的情报服务，专业图书馆通过情报调研和参加学术活动，既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职能，也拓宽了信息人员本身的视野，提高了图书资料基础工作的水平。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四) 正确处理专业图书馆与用户间的关系。

开展用户研究，不能忽视了图书馆与用户之间双向的信息交流。运用传播和沟通的方法协调与用户间的关系，影响用户对图书馆的舆论，塑造图书馆的良好形象，这是搞好图书馆工作的润滑剂与推进器，是无形的财富和资产。因此，要采用多种形式让用户了解图书馆的工作、经费和人员等情况。引导用户参与图书馆的管理活动，以取得用户对图书馆工作的沟通、理解、支持和配合。

在专业图书馆的用户群中，包括行政管理人员和上级领导，他们虽不是用户的主体，却直接影响到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如何提高图书馆在上级领导心目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图书馆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是十分重要的。我院图书馆多年来一直注意做这方面的工作，因而上级领导在人力配备、设备购置等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比如，在

我院教学设备费比较紧缺的情况下，仍拨出专款为图书馆购置微机、光盘以及光盘驱动器等现代化技术设备。这对图书馆建设的作用是很大的。

三、专业图书馆开展用户研究的基础

长期以来，图书馆职业的形象欠佳，这固然与社会上人们的误解有关，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与我们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服务水平有关。在不同的图书馆甚至同一个图书馆的不同个人。同样是为读者服务，但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却差别很大。比如，某个读者需要查找资料解决某个难题，如何迅速而又准确地满足这个读者的需求呢？对某些馆员来说，也许三分钟就能解决问题，而对另一些馆员来说，很可能三十分钟、三个小时甚至永远也无法解决。

为使用户的信息需求向纵深方向发展，对专业图书馆员的要求将越来越高。专业图书馆员与用户之间将不再是简单的借借还还的关系。英国一位评论员惊呼：“我们确信不疑的是，图书馆员的职业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我们可以从图书馆职业和其他职业界限的模糊中朦胧地察觉到。”当然，要求图书馆员对每一门学科都十分了解是不现实的。不过作为专业图书馆员来说，要求既具有扎实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知识，而且要对本专业以及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乃至成为日益细小的学科的专家以及人员的管理者、资金的管理者、文献的管理者、机器的管理者等等，又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目前，高校专业图书馆或资料室已越来越重视专业人员的配备。有些馆、室甚至配备了多名高层次人才。这对于开展用户研究，充分发挥专业图书馆的职能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和条件。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童 轩

良好的开端

——“岭南文库”首批图书巡礼及社会反响综述

□杨江人

由岭南文库编委会、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合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南文库”丛书（以下简称文库）首批18种图书面世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首届南国书香节期间，《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书报刊》、《岭南文化时报》、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单位，发布了文库首发式的消息，介绍了文库在书香节上受读者欢迎的情况。此后，《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经济》、《亚太经济时报》、《诗词》报、《澳门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了有关文库的书评多篇。可以说，我省这项重点文化工程的建设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本文拟就这个开端——首批18种图书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总体气势恢宏，收先声夺人之效。

既然称为“文库”，就应该有一定的规模。该丛书首批一次推出18种，可谓气势恢宏，这在省内，乃至国内图书出版方面是少见的，而且六大系列都已齐备。这18种图书当中，属“历史政治”系列的有《简明广东史》；属“经济发展”系列的有《广东改革的经济思考》、《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属“社会文化”系列的有《岭南文化》、《广东美术史》、《广东文化地理》、《岭南民间百艺》、《排瑶历史文化》、《岭南古今录》、《岭南思想史》；属“自然资源”系列的有《广东的自然灾害》；属“人物传记”系列的有《苏兆征》；属“典籍选粹”系列的有《岭南历代诗选》、《岭南历代词选》、《岭南历代文选》、《羊城古钞》、《黄节诗选》；此外，还有译著《旧中国杂记》。从系列上看，对岭南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已涵盖无遗，

使读者对文库的总体规模有了认识。可以说，作为一套地域性的百科文库，其架子已搭成，其总体形象已树立起来了，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二、以较高的学术品位，显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

作为一套地域性的百科文库，是否具有生命力，能否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与其内容是否具备科学性、权威性和稳定性这些主要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从首批18种图书来看，文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已见端倪。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有相当部分的图书填补了有关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点，其开榛辟莽之功受到学术界的赞誉。著名学者曾昭璇教授指出，《广东文化地理》（中山大学教授司徒尚纪著）“乃我国第一本区域文化地理研究著作；”“全书十章囊括文化地理学的主要内容，亦表明作者对文化地理学科体系的思想，是亦本书为文化地理学创一良好体系，使后来者有所参考也。”（见本书《序言》）陈炜恒先生在考察了国内美术史专著出版状况后，认为“《广东美术史》（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李公明著）在国内具有开创性”，“过往，地方性的美术史在内地几乎未有所见，而以行政区划的美术史，本书肯定是首种。”（见《澳门日报》1994年3月18日）而由广东资深经济学家曾牧野教授等主编的《广东改革的经济思考》，则被论者称为“挟带粤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见《亚太经济时报》1994年6月12日）此外，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梁必骥主编的《广东的自然灾害》、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锦全等编著的《岭南思想史》、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研究

人员练铭志等著的《排瑶历史文化》、中山大学研究人员仇江先生选注的《岭南历代文选》、高级工艺美术师林明体著的《岭南民间百艺》、香港大学学者谭棣华著的《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等,亦堪称草创之制或首集大成之作。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18种书当中,《广东文化地理》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简明广东史》是广东省“六五”规划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广东改革的经济学思考》是广东省“八五”规划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排瑶历史文化》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课题;《岭南文化》是广州市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大课题。

第二,以其内容的较高学术水准,受到专家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原广东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刘耀荃研究员撰文指出,《排瑶历史文化》“无论在材料和观点方面,都可以说是迄今排瑶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关于排瑶的“人口分布,历史来源,瑶老制,民族关系,地域内婚与同姓婚”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寿祺先生评价《广东文化地理》时指出:“该书从文化总体概念出发,分析广东文化;其搜集材料之丰,触及文化各种现象之广,远远超过同类所有著作;举凡土地利用、聚落、方言、风俗、宗教、地名、人才分布各种文化现象,无不加以概括,从宏观方面将之剖析,并将各种文化现象,追索出其源流,又从历史角度论证广东文化发展的层次,内容诚绚丽多彩。”曾昭璇教授认为,“出版《羊城古钞》,不但弥补了过去近两个世纪该书未有重版、新版之缺;而且因其校注之翔实,设计之精美,将成为继文禽堂藏版后的新的传世之版。”欧安年先生认为新版《羊城古钞》有三个特色:“一、注释文字能够深入浅出,而且详略得当,填补了广州区域史实研究项目的许多空白;”“二、校注者经过对原书众多条目的研究考证,从中发现了仇氏(指原书编纂者)的史实见解”,“三、校注者能够实事求是地发现并指出了原书的局限和不足”。(见《广州日报》1994年6月18日)《岭南历代诗选》则被论者称为“手眼俱高的诗歌选注本”。(见

《广州日报》1994年2月22日)著名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韦庆远先生指出,“《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一书,既能从纵的方面追本溯源,按不同历史阶段研究沙田的形成和发展,又能从社会经济关系、阶级人际关系以及乡风民约横切面论述沙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突出的问题,史料扎实,脉络分明,持论有据,我认为确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了重要的充实,有所实破,是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力作。”(见该书《序》)此外,读者对《岭南古今录》、《广东美术史》、《黄节诗选》、《广东改革的经济学思考》的学术价值,亦给予了颇高的评价。(可见《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经济》、《亚太经济时报》、《诗词》报发表的书评)

综上所述,可以说文库首批图书汇集了省内外学术界有关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这是文库能够成为有价值的文化积累的最重要因素。

三、收总结历史、服务现实之功。

作为一项大型文化建设工程,其作用不能仅囿于文化积累,而应同时注重科学研究为现实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显然文库的编纂者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首批推出的《简明广东史》、《广东改革的经济学思考》、《岭南文化》、《广东的自然灾害》、《岭南民间百艺》、《广东文化地理》、《排瑶历史文化》、《岭南思想史》等品种,均能在总结历史的同时,亦给人予把握和认识现在与将来的深刻启迪。如《广东改革的经济学思考》,比较全面、系统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广东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战略策略、重点难点、经验教训以及发展趋向,作了论述,并对广东今后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性建议。该书无疑对广东乃至全国深化改革,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又如《广东的自然灾害》一书,系统地反映了广东自然灾害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人们认识自然灾害,考察其分布和形成规律,对于人们提高防灾、减灾意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于《简明广东史》、《岭南文化》等,则能够帮助读者从总体上认识广东的昨天和前天,了

解省性、国情,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激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积极投身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事业。

四、封面设计总体性强,特色鲜明,风格明快,典雅大方;内文版式设计新颖,应予充分肯定。

当然,就首批图书而言,亦有可改进的地方,兹提三点,以就教于方家。

一、一些品种的内容、编校方面有值得改进之处,对此,已发表的书评中已有具体叙述,兹不赘。

二、首批推出,虽然六大系列齐全,但存在系列品种畸少畸多现象(如“历史政治”系列、“人物传记”系列均各一种,“社会文化”系列有7种之多)。当然,这与作

者的写作进度、推出首批图书的时机有密切关系,但总体来考虑,如能尽量做到兼顾、平衡,当更好一些。

三、个别品种的系列归属,仍值得斟酌。从封面设计看,《岭南思想史》、《岭南古今录》属“社会文化”系列,但从书名和内容来看,列入“历史政治”系列好象更为适当。

“岭南文库”是我省前所未有的文化建设工程,其“施工”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首批图书能以现在这样的面目呈现于世,实属不易。我们盼望着文库能够总结经验,克服不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作者单位: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有能**

· 学术动态 ·

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成立

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于1994年8月18日在广州珠海宾馆举行的《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改革开放研讨会》上宣告成立。

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是由广东省各个邓小平理论研究机构 and 有关的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组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的成立,有利于更好地广泛组织力量,认真开展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研究会着重强调要全面、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基本观点、战略思想、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等;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创造精神、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研究、探索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并把邓小平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起来,创造出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科研成果。

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由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黄华华同志担任名誉会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同志为会长。肖如川、张难生、梁渭雄、吴群策、李翀、颜泽贤、梁琼芳、李蒲弥、李恒瑞等同志为副会长。

研究会聘请了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社科联名誉主席任仲夷同志和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龚育之同志为高级顾问,杨应彬、陈越平、张汉青、张江明、梁钊、张磊、黄家驹、刘嵘、夏书章、赵元浩、曾牧野、张元元等同志为顾问。

研究会为团体会员制,它集中了我省有关邓小平理论研究机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及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力量,群策群力,必将更好地为推动我省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向纵深发展,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陈家义)

在科学与哲学的边缘耕耘

——访刘大椿教授

本刊记者：世木

刘大椿教授，江西于都人，1944年5月30日出生于贵州安顺。博士生导师。现任自然辩证法教育与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科学技术哲学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STS研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管理科学院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哲学社会学系教授。专攻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和STS（科学、技术、社会）研究。有十数种学术专著与译著。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问）：刘先生，据说您大学是学数学的，现在却转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您是怎么跨越数学与哲学之间的鸿沟的？

刘教授（以下简称“答”）：平心而论，我算不上哲学的专家，也未曾跨越什么数学与哲学间的鸿沟。我自认为只是个科学与哲学边缘的耕耘者而已。

我幼时好学，自期甚高，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都爱涉猎。中学时也喜欢数理化，大学又上了一个数学专业。在我眼里，最可钦佩的是科学家，他们脚踏实地，为人类做出了公认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可羡慕的是哲学家，他们心有灵犀，能够在精神领域驰骋，在别人莫明其妙的地方找到乐趣。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失掉了专心从事科学的机会；阴差阳错，加入了哲学工作者的行列，又只是半路出家，于是我就选择了一个科学与哲学的交叉处漫步耕耘。这样，虽然在科学家面前自惭形秽，却自认不那么死心眼；尽管在哲学家殿堂里自叹弗好，又窃喜还有点科学训练。反正不是非当什么家不可，反正科学与哲学的边缘也并非不毛之地，我也就在将近不惑之年心安理得地走上现在这条路了。

问：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的专

著《科学活动论》，受到学术界瞩目。《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哲学动态》、《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为此曾发表多篇书评和专访，形成相当可观的社会影响。到现在，该书中大多数观点已为学界视为当然。您能谈谈这本著作的诞生背景吗？

答：客观而言，在《科学活动论》出版之际，活动论的观点在国际上已算不得时髦论点。1954年英国学者贝尔纳在其名著《历史上的科学》英文初版中所系统表述的科学多种形相说，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可以说，后来关于科学本质的各种论述，都能从贝尔纳那里找到根据。但是在国内，当时活动论的观点还是很新鲜的，系统的论述则更是绝无仅有。

其实在当时中国刚刚走向开放的背景下，《科学活动论》一书的主旨，乃是我多年来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即应把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来系统地探讨和论述。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习惯于把科学看成既成的东西，看作精致的、完善的、可以称之为真理的知识体系。但是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科学在发达国家里成为非常重要的社会体制，用贝尔纳的话说，“有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为之而工作。”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的关键因素,再加上它对社会文化、生活诸层面的影响,仅仅把科学看作知识体系的传统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因此,我在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过程中,萌生了这一基本想法,要把科学不仅看作既成的东西,还看作活动的过程;不仅考虑到科学活动的内在方面,还考虑到它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及其在整个人类活动中的地位。

《科学活动论》共九章。第一章(科学论)具有导论性质,试图确认把科学看作活动的合理性,概要说明了科学活动的结构、特征和规范。此后的章节中我从实验、归纳、理论建立等基本科学认识活动入手,通过论述科学成果的确证和社会确认过程,实现了从认识论到社会学论的过渡,比较了科学与艺术这两种人类创造活动的特征,论述了科学活动的心理、社会特征及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功能,分析了科学增长的机制和约束因素。最后把科学活动放到整个人类发展的背景中,展示其对人类历史的价值和在人类价值体系中的地位。这样,一种活动论观点下的科学便层层展现在读者面前了。

《科学活动论》中讨论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科学。其实对社会科学也应当采用活动论的观点。不过当时为方便起见,有意回避了这个话题。

问:现在您觉得把社会科学纳入研究对象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了?

答:是的。事实上,我在参与主持方华教授牵头的一个国家七五规划社科基金项目时,已进行了这方面研究。其基本成果反映在我主编的、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走向自为——社会科学的活动与方法》一书中。

我的基本想法是:应当把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来论述,把社会科学活动及其精神产品从自在走向自为作为一个过程来刻画。这就是《走向自为》一书书名的来源。该书分为四篇:社会科学活动论,国外社会科学的历史和现状,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命运。简言之,是从活动论、世界背景论、方法论、中国特色论四个不同视角,交叉地审视社会

科学,以便探讨人类社会和精神如何通过社会科学走向自为,社会科学本身又如何日臻成熟、走向自为。在上述视角中,活动论的观点是最基本的,其它则是补充和延伸。

作为主编,我除了在全书中贯彻上述意图外,还着重从活动论方面作了具体而详细的论述。其中比较深入而有新意的论点包括:把社会科学活动的特点和性质归纳为阶级性和科学性、不确定性和统计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的辩证统一;把社会科学活动与自然科学活动之间的关系比拟为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之间的不同组合;指出当代社会科学活动有两个焦点:运作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并对它们分别进行剖析;对社会科学的活动结构 and 研究体制的现状加以分类,联系我国实际探讨对社会科学活动进行组织和管理的规律与方法。

同是科学活动,社会科学远不象自然科学那么成熟,关于它的对象、性质、方法、结构、体制等等所引起的争论也较为激烈。从活动论的观点来看社会科学,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但可以预期有价值的成果不久将会产生。无论如何,应当把社会科学活动作为对社会活动的自觉把握去理解;这种活动的主体遵循特定的社会规范,形成一个社会科学家共同体,并以自身的社会科学活动达到对一般社会活动的认识和改造。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活动明显地是一般科学活动和一般社会活动的迭加。

问:刚才您说到社会科学活动的特点是诸种性质的辩证统一,您还提到,自然科学活动与社会科学活动都是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的组合。的确,辩证统一的观点在我国思想史上和当代学术思想中一直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科学活动不是一种遵循严格规范的活动吗?科学成果不是有明确的真假值吗?请问您对辩证统一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有何高见呢?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一谈我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一些研究心得。

我一向偏爱方法论研究,因为方法论给人的不仅仅是既成产品,而是产品藉以制造出来的工具。当代科学活动的重大特点之

一,是以方法论问题作为形成各种崭新科学思想的必要条件。在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以方法论为核心的哲学反思是超越现成科学思维模式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我的方法论研究心得,除了散见在陆续发表的一些论著外,最初集中反映在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印行的《比较方法论》一书中。当时要得急,比较仓促,篇幅也不大。后来应约改写交世界知识出版社,内容增加一倍多,结构重新调整,更名为《互补方法论》。在该书中,我对先后流行的各种方法论思想和问题进行比较,提出了一种互补的理解。就是说: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活动本身一样,永远不会停留于某一水平。任何方法都有一定的作用和局限性。如果你有足够博大的胸怀,接纳一切有意义的方法论思想,又有同样的睿智,把它们放在适当的位置,让它们配合着发挥作用,就有资格欣慰地说,你真正是科学活动的主体。事实上我在《互补方法论》一书中涉猎的方法论思想不下十数种,为此我给它另外加了一个标题:《多重视角下的方法论》。

问:您能具体谈谈这些方法思想的互补性吗?

答:可以。比如“机械观和系统观”。众所周知,近代科学的伟大进步依赖于经验论和机械论的思想,科学研究遵循某种还原程序,哲学上概括为还原论。这种机械观企图以穷尽部分来把握整体,却往往忽视了对整体的融汇贯通。对此,现代科学的发展又转向某种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即系统分析方法或系统思维方式——系统观。近年来它在我国也风行一时。然而,不能认为系统观必定对还原论具有绝对的排他性,终结了还原论的作用。这不符合现代所有相对成熟学科的实际情况,也有悖于人类认识史。历史上,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是交替出现的。早期科学思维偏重于整体性,带有直观综合的特点,到近代科学的还原论是一个进步。

在我看来,甚至不能认为系统观和还原论的关系有如还原论和古代整体论的关系。

实际上,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与还原论互补的,它不排斥并且还借助谨严精细的分析手段,还原论依然是研究的基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在实际科学进程中找到还原论和系统观之间恰当的配合,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指导思想。

再比如“辩护和发现”。原则上讲,发现涉及科学理论和假说的起源、创造、发生和发明,它是主观的,与文化因素、心理构成、社会背景有关,属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课题,只适合于描述性研究。辩护则涉及科学理论和假说的评价、检验、维护、成功及确认,它具有规范性,属于科学哲学的课题。但在实际研究中,真正的区别在于猜测、或然性和可接受性之间。一个猜测如果要成为可能的发现,必定具备某些好的理由,获得或然性,有关这种或然性推理的规律也就构成所谓“发现的逻辑”,进入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而在理论的确认即辩护过程中,或然性的理由和可接受性的理由之间也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发现与辩护之间并无鸿沟。一切真正的发现都是辩护,一切真正的辩护都以发现为前提。当前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既探讨证明的逻辑,也探讨发现的逻辑。

我们再看看所谓“程式化努力”和“反对方法”。我们知道,方法愈是程式化,愈易于掌握,愈能发挥作用。方法论上的“程式化努力”,就是企图找到某种如圆规一样的思维工具,以及某种如作圆步骤一样的思维程序。对于实际科学活动来说,完全地程式化固然不现实,但人类一直在成功地把越来越多的东西纳入程式化处理轨道,以便让自己的思维从中解脱出来,专注于那些至少在现在尚不能程式化的任务。它是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为了创造性地提出和完成新的认识任务,又要求人们能自觉地摆脱某种固定方法程式的束缚,这是方法论研究的另一个基本目标。在这方面美国科学哲学界怪才费耶阿本德,强调“反对方法”,认为科学活动是一种自由的实践,一律性损害了它的批判力,也危及着个人的自由发展。所有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因此

留下的唯一规则是：“怎么都行！”

我认为费耶阿本德的思想有其合理性。完全的“怎么都行”必定导致唯一的遵循：发疯。但我相信在他那惊世骇俗的行文和十分偏颇的结论背后，隐藏着宝贵的观念。真正聪明的人是能在头脑中同时容纳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对于方法，也必须破除那种从一而终的迂腐观念。善于解决问题的人，总是能在不同的方法间为自己保留必要的选择余地，时刻重建自己的思路。应当允许互补的观点、方法、程式并存，重要的是善于比较和作具体的取舍。这就是我认为费耶阿本德合理的一面，也就是我的互补方法论的思想。

问：还有一个问题。刚才谈及《走向自为》时，您说当代社会科学活动有两个焦点：运作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您指的是世界性的趋势还是中国的现状？

答：应该说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干预社会运作和促进社会理解方面，形成了非常有力的势态。可以说，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到社会运作性研究和社会解释性研究上，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具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进展。

所谓运作性研究，就是为社会活动提供预测，评价和方案；所谓解释性研究，就是致力于对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理解，探究其中的意义。不过，这两方面的发展并不平衡，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大约集中在社会运作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家不再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一些空洞的观念和辞藻上面，转而特别重视那些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的命题，理论的可操作性成为评价理论的至关重要的指标。随着社会活动中自觉性和调控能力的增强，社会研究的技术手段也越来越成熟。我认为，对一个剧烈转型的社会，如当代中国，

运作性研究更为迫切，也更易于产生卓著成果。

问：那么，这一基本考虑是否影响到您本人进行研究时的价值取向和课题取向呢？

答：从1987年以来，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新兴哲学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和博士点建设上。理论方面先后参与主编了《科学技术哲学的前沿和进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两本书。前者结合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吸取当代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的有益成果，为科学技术哲学在理论上做了清理门户的工作。后者论述了在科技革命条件下，科学技术哲学的理论构架及其面临的崭新问题，围绕科学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部分进行探讨，丰富了自然辩证法的内容。

目前承担的课题中，有两个基本上是运作性的。一个是国家资助的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现机制研究”，另一个是与日本东京大学高科技研究中心村上阳一郎教授合作的、日本文部省资助的项目“中国的环境问题：从中日合作的观点看。”前者在设计中把重点放在我国科技活动内部的运行机制以及科技活动与生产活动的连接机制上。后者欲在世界和东亚生态圈的背景下，深入讨论中国的环境问题，为中日之间在树立先进的环境意识、克服环境危机方面寻找合作的支点。我认为，这些联系实际的、偏向运作性的研究，与我在理论上的追求是相辅相成的。

责任编辑：冯 生

《广东劳动制度改革的轨迹》评介

□张江明

读了郑永晖《广东劳动制度改革的轨迹》一书，很自然地使人回顾起广东省过去劳动体制改革的整个历程。作者郑永晖同志，担任广东省劳动局副局长三十多年，根据各个时期劳动制度和劳动体制改革的情况，以及新提出来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有针对性地写成论文，提出各种劳动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对策。现在汇集成书出版发行。书中提出的有关劳动体制改革的理论、观点、方法和对策，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今天深化劳动体制改革，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这是一本系统了解广东劳动制度和劳动体制改革历史发展过程，及其遇到的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的不可多得的参考工具书。而且这本书的论文，都是作者亲自撰写，不是别人代笔，用他的名字发表。这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本书之所以有较高的价值，是由于它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并有一定深度和新意，指导性强。作者紧紧抓住与领会党中央给予广东省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精神，紧密联系广东劳动体制改革的实际，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亲自写成各种论文或报告，提出各种改革的设想和对策，富有新意和可操作性，因而他的论文的指导性比较强，所提意见和措施，比较切合实际，并能解决当时劳动体制改革中的关键性问题。这也是此书之所以具有较大吸引力的重

要原因。

二、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上来，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作者在解放前后的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了三年，有一定理论修养和理论兴趣，加以数十年从事劳动工作，有丰富经验和深刻体会，对过去劳动体制的弊端认识较深，对改革旧的劳动体制的决心比较大；对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体制必须搞活的理解和觉悟比较早，因此对坚决实行劳动合同用工制度的信心比较足；并且提出的各种设想和对策，都是从亲身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能够做到把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现实经验两者密切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三、有的放矢地解决劳动体制改革中的思想认识问题，有助于提高劳动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作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矢，去射劳动体制改革和干部思想之的，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观察、分析、解剖在劳动体制改革中遇到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论证劳动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克服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树立新的观念和改革意识，不仅解决了劳动体制改革中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同时也提高劳动战线工作干部的思想政策、业务水平和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促进劳动体制改革的发展，因而该书对劳动和有关部门来说，是有较高参考价值的。



ACADEMIC RESEARCH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5

1994

ISSN 1000-7326



ISSN1000-7326
CN44-1070

逢双月 25 日出版

定价：2 元/册